

三联

生活

2023.3.20
2023年第12期, 总第1230期
www.lifeweek.com.cn

周刊

海岛社会

大航海时代, 边地与中心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5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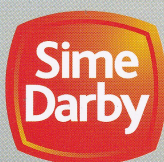


GHOST

ROLLS-ROYCE

MOTOR CARS

SHANGHAI PUXI



Motors

销售电话: +86 21 6386 0288

售后电话: +86 21 5159 6288

森那美汽车集团

劳斯莱斯汽车 上海·浦西 | 杭州 | 南京 | 香港 | 澳门

徐汇滨江精品店: 上海市徐汇区龙台路10号1-M22 (龙腾大道路口)

4S旗舰店: 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2386号5号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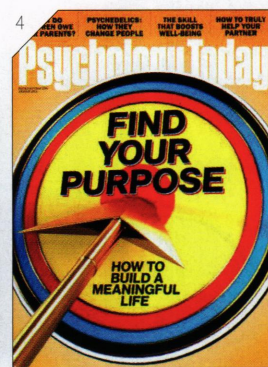




《经济学人》2023.3.4

治疗肥胖症的新药

一种由美国礼来（Eli Lilly）制药公司生产的创新型 GLP1 药物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上市，它被认为具有更好的减肥效果。世界肥胖联合会估计，到 2035 年，世界超重或肥胖的人数将达到 40 亿，占世界总人口的 50% 以上。与此同时，2031 年 GLP1 药物的市场规模预计达到 1500 亿美元，与癌症药物的市场规模相差无几。政府必须确保最需要减肥药的人得到药物，并推进预防肥胖措施，如锻炼、健康饮食和推行更全面的食品营养成分标签。



1/ 《国家》2023.3.6

流血的海洋

印尼的特尔纳特岛和周围的马鲁古群岛的土壤下蕴含着丰富的金属层，这些金属层是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组成部分：镍和钴。随着各国试图通过逐步淘汰汽油动力汽车来应对气候变化，镍的需求量可能会从 2022 年的 6% 上升到 2030 年的 36% 以上；同一时期，钴的需求量将增加一倍。但开采镍和钴的过程造成了严重的水体污染，海洋已经变成了暗褐色。因为兴建燃煤发电厂为开采提供动力，不少当地居民已被迫离开。

3/ 《自然》2023.3.2

藻华“涨潮”

这张封面图是 2017 年阿拉斯加海岸的藻华。藻华是水中微小的浮游生物大量聚集而使水体变色的一种现象。虽然它可以为其他生物提供食物和营养，但也会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研究人员评估了美国航空航天局 Aqua 卫星在 2003 年至 2020 年间拍摄的 76 万张图片，发现在 153 个海岸中有 126 个海岸出现了藻华，受藻华影响的水域面积扩大了 13.6%。藻华的增加与海洋环流的变化和海面温度的上升有关。

2/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2023.3

设计的社会责任

设计不是一个中立的、没有价值判断的过程。如今，人们开始认识到设计中所蕴含的社会责任：这是给谁设计的？谁从中受益？谁可能受到伤害？解决问题了吗？科学家研究了人工智能自动化在新药中的应用，这种方法可能在更快的时间内交付更便宜的药物；假肢设计师创造出一种装置，帮助使用者重新树立自身形象，同时消除残疾和肢体差异带来的耻辱。

4/ 《今日心理学》2023.1

寻找目标

人们通常认为，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遇到太多的障碍会影响我们的积极性。然而，一项研究推翻了这一逻辑。实际上，我们的动机决定了我们面临障碍的数量和难度。不同的人对障碍及其困难程度有不同的感知，人们试图实现的目标类型和愿望程度，都影响着人们对障碍的感知，以及与障碍的关系。尝试将不得不做的事转化成想要做的事，就可以真正愉快地体验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

三联也做短视频了？

去瞅瞅

扫码关注



B站三联编辑部



三联生活周刊视频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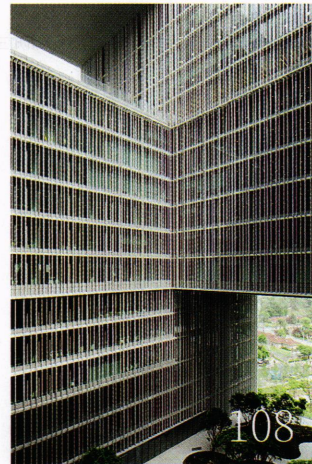
28

封面故事

大航海时代，边地与中心

海岛社会

| | |
|--------------------|----|
| “边城”从未真正“边缘” | 32 |
| 双屿港，存在于讲述中的海岛 | 34 |
| 南澳：孤岛中转站 | 48 |
| 月港：“漳州时代”开启 | 56 |
| 寻找玉环厅：从洞头岛开始的回溯 | 66 |
| 古海图，中心、边缘与“海洋空间表现” | 82 |
| 欧洲航海扩张的动力和速度 | 87 |



经济 市场分析：房地产复苏了吗？

90

社会 调查：绥中货车司机涉疫案再审进行中

92

调查：云南双胞胎失联身亡

100

文化 专访：2023 普利兹克奖得主大卫·奇普菲尔德：

108

关心建筑的生成过程

文史：校勘与修订

116

专栏 邢海洋：燃油车大崩盘

16

袁越：组织特异性免疫

114

张斌：足球 1 比 0 胜 BBC

118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

119

环球要刊速览

2

消费·理财

18

读者来信

8

健康

20

天下

10

声音

21

生活圆桌

22

好东西

24

个人问题

120

封面摄影：张雷

2023年第12期，总第1230期，2023年3月20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肖启明 Xiao Qimi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何奎 He Kui

主编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陈赛 Chen Sai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编辑 Senior Editor

陈晓 Chen Xiao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谢先凯 Xie Xiankai 袁越 Yuan Yue

蒲实 Pu Shi 杨璐 Yang Lu 徐菁菁 Xu Jingjing

薛巍 Xue Wei

主笔 Editor

丘谦 Qiu Lian 苗千 Miao Qian 黑麦 Hei Mai

王海燕 Wang Haiyan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王珊 Wang Shan

黄子懿 Huang Ziyi 钟和晏 Zhong Heyan 张从志 Zhang Congzhi

薛芃 Xue Peng

资深摄影 Senior Photography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张雷 Zhang Lei 黄宇 Huang Yu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吴丽玮 Wu Liwei 孙璐璐 Sun Lulu 杨丹 Yang Dan

孙若茜 Sun Ruoxi 艾江涛 Ai Jiangtao 刘畅 Liu Chang

董莹洁 Dong Yingjie 陈璐 Chen Lu 吴淑斌 Wu Shubin

于楚众 Yu Chuzhong

记者 Reporter

李秀莉 Li Xiuli 李晓洁 Li Xiaojie 冯化雨 Feng Huayu

魏倩 Wei Qian 印柏同 Yin Baitong 肖楚舟 Xiao Chuzhou

张宇琦 Zhang Yuqi

专栏作家 Columnist

朱伟 Zhu Wei 张斌 Zhang Bin 宋晓军 Song Xiaojun

朱德庸 Zhu Deyong 卜键 Bu Jian 唐克扬 Tang Keyang

特约插画师 Special Illustrator

范薇 Fan Wei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菲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图片副总监 Deputy Photo Director

覃柳 Qin Liu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Sanlian Life Media Co., Ltd.

总经理 General manager

李鸿谷 Li Honggu

副总经理 Deputy General manager

李伟 Li Wei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总经理助理 Associate General manager

贾冬婷 Jia Dongting

经营拓展部 Business Development Department

总经理 General manager

李伟 Li Wei

广告部 Advertising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连华伟 Lian Huawei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孟蕾 Meng Lei 施进 Shi Jin

生活市集事业部 LIFE Market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李晔 Li Ye

生活实验室事业部 LIFELAB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刘刚 Liu Gang

定制内容部 Branded Content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沈艺超 Shen Yichao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张弛 Zhang Chi

原生内容部 Original Content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樊月姣 Fan Yuejiao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张婷婷 Zhang Tingting

中读+人文城市 ZHONG Read & City for Humanity

执行总编辑 Executive Publisher

贾冬婷 Jia Dongting

内容总监 Content Director

俞力莎 Yu Lisha

行政总监 Administrative Director

钦峥 Qin Zheng

运营总监 Operating Director

李琳 Li Lin

技术副总监 Deputy Technical Director

卢威澎 Lu Weipeng

产品副总监 Deputy Product Director

林思好 Lin Sihao

松果生活总监 LIFE+ Director

蔡华 Cai Hua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庄山 Zhuang Shan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袁玉兰 Yuan Yulan

法务总监 Legal Director

陈茂云 Chen Maoy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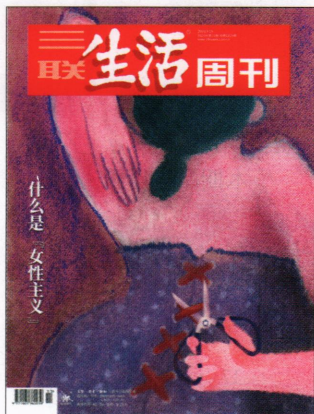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总监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总监助理 Associate Director

潘海艳 Pan Haiyan



2023年第11期，总第1229期

什么是“女性主义”

不是成为女强人才有资格说女性主义，女性的权益和手里的权力无关，不然的话我们又掉入了父权主义、男权主义的权力陷阱之中。（@李CL）

其实感觉号召男性也要敢于“做女性”，和女性一起迈出“恐弱”的怪圈，用“关爱、温和、平等、尊重”的日常实践代替对“强势、绝对、等级、权威”的执念，也是一种努力方向。（@明日又逢春）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微信平台（lifeweek），回复您对封面故事的评论，精彩留言将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中。

班费

前些年，单位掀起了一阵读MBA热。受其影响，我也报考了，最终于2021年顺利上岸，就读于省城的邮电大学。一同入学的，还有同事颖和媛。

开学伊始，有同学便自发组建了微信群。全班共72人，其中一半是外省学生，本市的只占三分之一。因为疫情，刚开始一直采取线上授课，只在线下组织开展过两次活动，由于多半外地同学没能到校参加，许多同学至今未曾谋面。

根据学校安排，班里成立了班委，分别设置了班长、副班长、学委，负责管理班级日常事务以及和学院老师的对接沟通。

2022年初，班里响应学校号召，组织了一场同学聚会活动，地址选在省城近郊某户外营地，甚至邀请了院系领导出席，气氛很热烈。活动前，群里就发过通知，一切费用由学校承担。那次活动我因故未能参加，同事颖参加完回来告诉我，说班长通知她交班费，1人200元，她已经交过了。我当时还纳闷，怎么没见群里有交费通知？后来事情一忙，就没把这茬儿放在心上。

去年6月，随着本市疫情形势趋缓，班里又组织了一次线下活动，到本地几家知名企业参观走访，活动安排及费用仍由学校承担，这次我全程参加。午饭间隙，班长特意过来跟我耳语了几句，大意是提醒我交班费。

活动结束后，我问了同事媛，她却没听说要交班费。不放心之下，我又翻了群消息，也没见有关班费的任何通知，这又让我添了一层疑惑：既然这几次活动都是以学校名义进行，费用也由学校承担，那班费一事从何而来？即便要收，在群里通知岂不更合适？又何故私下对部分同学开这个口？思虑再三，我选择看看再说。

11月，班级群里有人招呼着聚餐，发起了活动报名接龙，那次我和同事都没能去。当晚10点多，有同学在群里发了照片，十几人围坐一桌，各人面前一个小火锅，比画着手势，脸上笑容洋溢。

转眼到了2023年，随着疫情政策放开，新学期开始后，学校通知线下授课。第一个周末，40多个同学汇聚一堂，参加了入学以来的第一次线下课。

周六上午课间休息，班长站了出来，口头通知让大家交班费。到了晚上，副班长在微信群里撂下一句：“请还未

交班费的同学抓紧时间交费了，每人200元。”

事已至此，我不好再计较班费的合理与否，翻出副班长的微信把钱转了过去。

周日上午，又是课间休息，副班长先在群里发了班费收缴情况表，表中列明了未缴费的同学姓名，随后又简要公布了班费收缴数额和使用情况，大意是已收到班费1万元出头，已使用3000多元，其中包括年前同学聚餐花去1900元、年前给老师送礼品花掉1000元以及本次上课期间购买饮料、水果、零食的200元。一席话说完，教室里一片寂静。见状，副班长自顾自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午饭时间，同事媛招呼我和颖去外面吃火锅。席间说起班费的事，媛忍不住爆了粗口：“去年底，那帮人吃饭也用班费结算，这算什么事？交班费不是让少数人吃吃喝喝的呀！这钱交得真让人窝火。”“也不想想那些外地同学怎么看？一次都没来过学校，也没见过面，倒稀里糊涂地花了钱，这不成班委的提款机？”同事媛也愤愤不平。一顿饭的工夫，三人有一半时间在吐槽班费和班费。

（读者 张云洁）

阅读之美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天猫旗舰店



微信书店

在这里，有杂志有书籍
还有各种美好的趣味

印尼 | 活跃的火山

3月11日，日惹的默拉皮火山在下午喷发出浓烟，位于火山口方圆3到7公里范围内都是潜在危险区域。图为政府工作人员给被火山灰覆盖地区的村民分发口罩。

火山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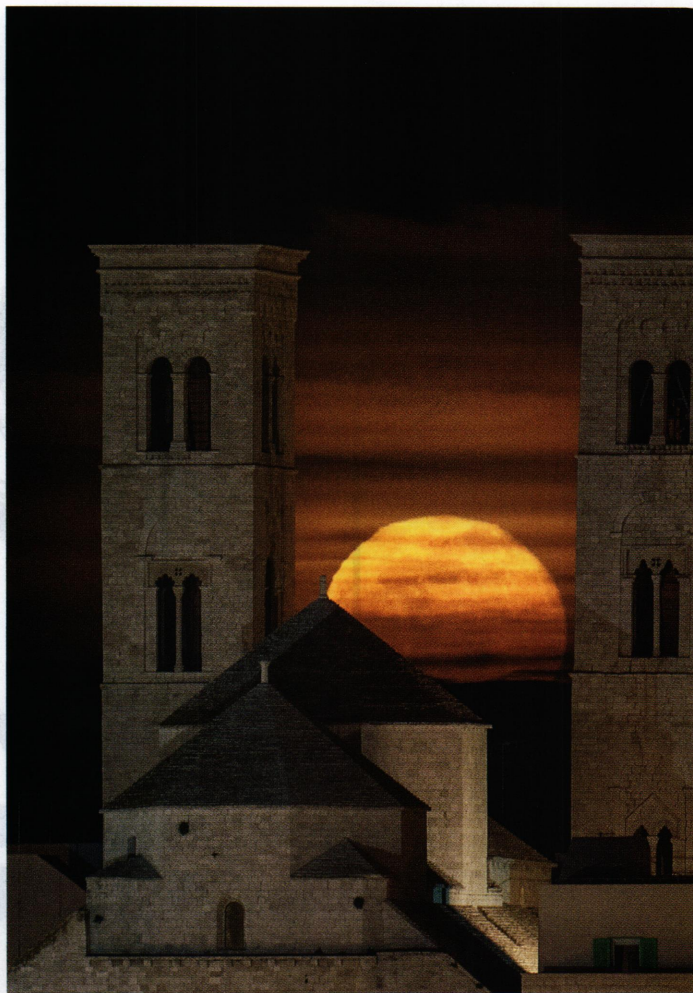
火山灰覆盖地区
村民分发口罩





意大利 | “虫月”

(右图) 3月8日，满月从在莫尔费塔大教堂后升起的样子。三月的满月也被称为“虫月”，因为它与每年蚯蚓开始从解冻的土壤中出现的时间相吻合。



法国 | 养老金改革抗议

(左页上图) 3月7日，身着防暴装备的法国宪兵在示威活动现场执行任务。这是2023年以来抗议养老金改革的全国集会第6天，总统颁发的改革措施包括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2岁推迟到64岁。

美国 | 奥斯卡

(左页下图) 3月13日，杨紫琼(左)以电影《瞬息全宇宙》摘得第95届奥斯卡奖最佳女主角，成为史上首位华裔奥斯卡影后。

盘踞大辛由燃

毛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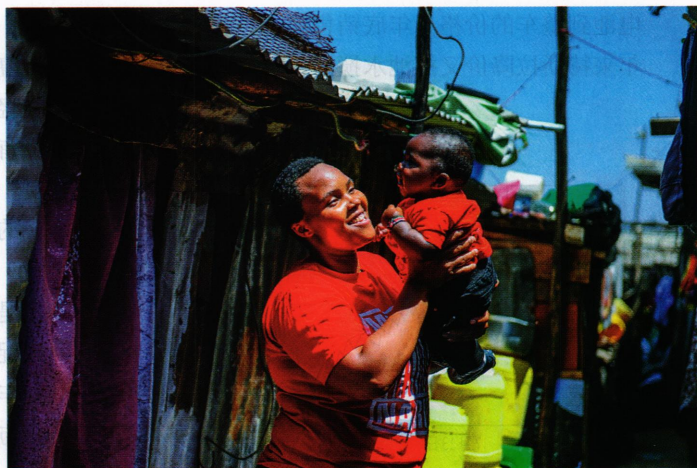


瑞士 | 拍卖“霸王龙”

(左图) 一具可追溯到6700万年前的霸王龙骨架将于4月18日在瑞士拍卖,这是欧洲首次进行此类拍卖。根据拍卖目录,这具高3.9米的恐龙骨架估价在650万到870万美元之间。

肯尼亚 | 贫民生活

(下图)3月8日,内罗毕 Mathare 贫民窟内,一名抱着孩子的妇女。



燃油车大崩盘

文·邢海洋

汽车市场出了大消息，湖北对燃油车政府出补贴，厂商大降价，标志性的一款雪铁龙 C6 几乎打了对折，从 21 万元降到 12 万元，这显然已经不是正常的降价促销了。电动车热销，燃油车崩盘，而汽车产业与地方财政和就业息息相关。

中部城市武汉的崛起，除了有九省通衢的基础，汽车业功不可没。去年湖北汽车产量排在全国第五，为 189 万辆。但从趋势上看，湖北的汽车业却在走下坡路，189 万辆还不及排在第一名的广东的一半，就在 5 年前，湖北还年产 266 万辆汽车。这些年武汉向着更尖端的科技芯片制造产业升级，可惜长江存储遭到美国的打压，号称投资 1200 亿元的武汉弘芯事后被揭穿是个骗局。产业和人才聚集，地区 GDP 乃至房价都是一根链条上的环节，今年的武汉房价就没有起色，政府拍地也就没底气了。当然了，长江两岸的灯光秀仍然是美轮美奂，但当地人渴望的是更强大的产业、更优质的就业前景。

中国的消费主要靠三大件拉动：住房、汽车和电子产品。时至今日，这三件都有点儿不堪重负，唯有汽车里的新能源一枝独秀。2022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达 1031 万辆，同比增长 62.6%，主要来源于规模快速增长的亚洲，且以中国为主。中国销售了 689 万辆，增长了九成多，市场渗透率也超过了 1/4。去年新能源汽车的旺销直接推升了从锂矿到电池到整车的价格，年底销售陷入一轮调整。可开年来特斯拉降价又把池水搅活，今年前两个月新能

源乘用车销售了 77 万辆，同比增长 22.8%。2 月新能源车渗透率更是达到 3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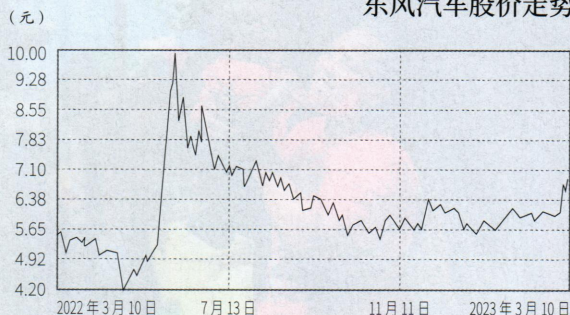
可新能源车的崛起是以传统燃油车的萎缩为代价的，2022 年燃油车市场销量为 1487 万辆，同比减少 13%。今年前两个月车市整体萎缩了两成，可新能源车销量还在涨，意味着传统燃油车跌幅达三成。传统车企中，合资品牌因为在新能源领域犹豫不决错失了产业布局，在这一轮洗牌中处于下风，比如今年 2 月自主品牌中的新能源车渗透率为 52.9%，而主流合资品牌中的新能源车渗透率仅有 4.2%。

传统车企中，以湖北为大本营的东风汽车更是劣势尽显，今年 1~2 月累计销量仅 30 万辆，同比下降 49%。如果厂商仍按照去年的销量安排生产，这两个月就会多出 30 万辆的存货。当然，生产进度会随时调整，但相信再有前瞻性的调度，也不会预料到腰斩式的暴跌。实际上，因为库存积压，东风已有好几个车型停产了，企业财务也处于崩溃的边缘。

救企业也是救当地财政和就业。这次东风集团的大促销，企业联合政府，可谓是合资品牌的一次绝望反击。企业促销常见，滞销车型促销力度通常都很大，但政府也进场却是少见的。无独有偶，湖北推出大额补贴的同时，另一汽车大省吉林也对一汽集团旗下品牌汽车给予补贴，单车补贴金额最高可达 3.7 万元，毕竟吉林财力有限，其补贴力度远小于东风的最高 9 万元。库容需要清理，产业需要提振，只有在轻装上阵的情况下，企业才能重新规划未来蓝图。所有这一切，都聚汇在了这个传统燃油车大崩盘的时刻。无论汽车大省还是合资车企，都借由一次史无前例的大降价，摆出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姿态。

东风舍命一搏，麻烦迅速抛给了同行，要利润还是要市场？反应晚了或许什么都没了。今年以来加入促销战团的企业不下 30 家。燃油车大跳水后，电动车性价比上的优势也就打了折扣。一场席卷传统车企与造车新势力的洗牌，在惨淡的市场中展开。■

东风汽车股价走势



在这里 陪你读懂 生活

L I F E W E E K



扫一扫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



栏目插图·豆角上台工作室

大学生经济

餐馆排队，网红景点人挤人，健身房里全是学生。据说，今年年初的经济复苏可以称为大学生经济——封校三年的大学生终于能出校门了，到处都是人，都是年轻的面孔。可学生的消费能力有限，旺丁不旺财。学生也没生活经验，干什么都扎堆，结果是一个个网红的景点被扫荡。而在这一消费热潮中，担心被ChatGPT取代的白领们却集体缺席了。

5%GDP 和 3% 赤字率

“两会”上两个数字引人关注：GDP 增速目标 5%，考虑到中国已经放开疫情管控，经济开始反弹，目标似乎“保守”；赤字率 3%，超过去年的 2.8%，而去年在防疫上开支不菲，今年预计会用更多的财政资金刺激经济增长。5% 的增速是 1994 年中国开始设置经济增长目标以来最低的数字。GDP 每增长 1 个百分点，可拉动 240 万新增就业。

“鸡周期”

台北夜市老字号“胜利号蚵仔煎”宣布，蚵仔煎无蛋可加，蛋花汤、煎蛋和卤蛋三种商品将停售。台北鸡蛋批发价格每台斤（600 克）上涨 3 元新台币。2023 年以来，受养殖端盈利预期向好、市场补栏需求旺盛影响，鸡苗价格不断上涨突破高位：3 月 6 日烟台地区大场报价达到 6.2 元 / 羽，同比上涨约 500%。



巨额燃油车补贴

湖北省开启的购车补贴力度之大，吸引各地人士奔赴湖北。补贴东风汽车旗下的东风风神、东风雪铁龙、东风标志、东风日产等十余款主力车型，最夸张的C6补贴9万元，从21.19万元降至12.19万元，二手车比新车都贵。汽车是湖北的支柱产业，去年燃油车大滑坡，市占率不足八成，东风日产销量89.79万辆，同比下滑20.9%。



每天成交上千套

截至2023年2月27日，成都2月二手房成交量已达1.8万套。每周15万人同时在看房，一下子涌出那么多购房人，一方面是去年以来的多轮松绑政策逐步发酵，另一方面则是前两年疫情下累积了大量需求，在疫情防控放开后开始加速释放。成都两天的成交量顶深圳一个月，足以说明成都作为价格最低的新一线城市的诱惑。



“廉航”回来了

航空史上最艰难的三年后，外资航空公司正在陆续重返中国。美联航上海至旧金山往返航班1月底已恢复直飞，卡塔尔航空2月15日起增加了广州往返多哈的航班至每周4班，达美航空3月3日起恢复了中美直飞航班。国内航司也在加快恢复国际直飞航线。廉价航空的代表亚航已重启东盟往来中国的20条航线，累计通航中国城市10个。

美元利率

3月6日，一项全球主要基准贷款利率——三个月期美元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突破5%，为逾15年来首次。美国就业和通胀数据意外强劲，受能源成本上涨影响，1月PPI环比上涨0.7%，为去年6月以来最大增幅。当“美联储开始放缓加息步伐”遇上“火热的通胀数据”，是否重新加速加息就成了外界猜测的焦点。



(视觉中国 供图)

中风患者康复新疗法

有接近四分之三的中风患者至少会部分损失上肢运动控制能力，遗憾的是，此前的康复疗法都不能显著缓解这种后遗症。匹兹堡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者近期在《自然医学》上发表文章称，利用一种名为脊髓电刺激（SCS）的新技术，可立即改善患者手臂和手部的活动能力，帮助他们更轻松地完成日常活动。在目前公布的临床试验中，两名参与者通过手术植入SCS装置后，肩肘部的屈伸力量、握力、手臂灵巧性和肌肉协同功能都得到明显改善。在移除装置后，改善效果也未消失。

好消息



只需快走 11 分钟

如果你贯彻不了流传甚广的日行万步保健法，剑桥大学的一项新研究或许是种鼓励：在分析了包含 3000 万人样本的 196 篇论文后，研究者称，每天 11 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快走）就能预防 10% 的过早死亡，将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降低 5%。



体内 3D 打印机器人

澳大利亚一个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新型手术机械臂。作为一种内窥镜，该设备灵活柔软，可将生物材料输送到器官和组织表面，进行原位 3D 打印。开发者预计，在 5 到 7 年内，医生可以利用这种技术更精确地重建伤口，比如修复胃壁或结肠损伤。

坏消息



长新冠的消化道症状

科学家一直试图了解长新冠的真面目。《自然通讯》上的一项研究在分析了 15 万名患者感染后一年的病历后发现，患者出现长期胃肠道问题的可能性比感染前高出 36%，反流性食道炎和消化道溃疡最为常见，便秘、腹痛和腹泻的发生风险也有所升高。



“嘴贴”作用尚不明确

只需睡前用胶条封住嘴，就可以告别打呼噜，改善皮肤、双下巴、消化功能，甚至减轻口臭？在网络上，用来抑制口呼吸的“嘴贴”相当流行。但专家普遍指出，这些好处目前鲜有研究证实。

阿特伍德：你的父亲说希望你成为外交官，或律师。好好利用上帝赋予你的头脑。

奥威尔：无疑，他口中上帝指的是他自己。他说我丢掉了自己的优势，是阶级优势，小势利眼们上的学校之类的。我不认为那些是优势，是以谎言为基础的偏见。

——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虚拟采访奥威尔

《瞬息全宇宙》是当一部小众电影拍的。《泰坦尼克号》则要求全世界都看它，那时好莱坞是单一的、共同拥有的宇宙的中心。文化操控的时代过去了，好莱坞漫长的20世纪结束了。好处是最佳影片竞争表现出的创造力的解放：电影被允许变得奇怪、有趣，有时近乎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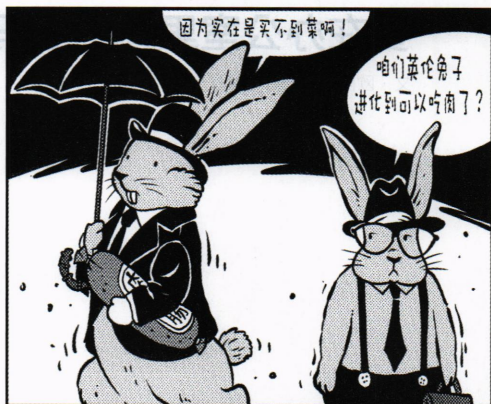
——英国作家丹尼·利，《奥斯卡电影的终结》

生命给所有人、切切实实地给每个人都提供了成名的机会。而成名的体验是唯一一种患得患失的体验，它使生活荒芜，钱财散尽，让一切水落石出。

——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外面的世界》

ChatGPT 很会瞎编。人容易犯错，教科书也会出错，但我们有合理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然而目前，我们没有任何可靠的措施来对大语言模型进行评估或纠正……你无法检查它知道什么，因为它没有任何稳定的语言表达，它的回答取决于提问的方式。

——澳大利亚科幻作家格雷格·伊根



(插图 山羊街)



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然而面对“何事栖碧山”这样的问题，他也无法回答山林之趣何在。或许，飘逸的落花、潺潺的流水，就是最好的答案。

——叶嘉莹，
《四季读诗》

数字

200.9
亿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3月8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达到200.9亿件。今年全国快递业务量第一个100亿件用时39天，第二个100亿件用时28天。当前，全国每天有1亿多件快递包裹在农村地区流动。

30
%

联合国就保护公海生物多样性达成一致，到2030年将全球海洋的30%纳入保护，多个国家承诺为保护公海生物多样性提供资金，总共涉及金额约180亿美元。全球公海水域目前只有1.2%的水域受到保护。

70
亿

每年生产70亿根的三角巧克力因为部分生产业务从瑞士转移至斯洛伐克，将失去“瑞士身份”，无法继续在包装上使用瑞士著名地标马特洪峰的图像。

要在办公室里养金鱼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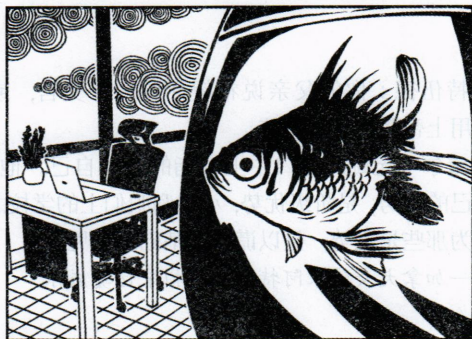
文·欧阳宇诺 图·谢驭飞



在爱德华·霍珀的画作《夜间办公室》中，静谧的空气中透露着淡漠与疏离。一个涂着红唇、梳着低发髻的女人在多层文件柜中翻找着什么，一个金发男人坐在办公桌前翻阅文件。在这个钻石房型的办公室里，一切都是必需及简约的。文件柜、伞架、雨伞贴墙而立。男人和女人各有一张桌子，男人的桌上有台灯及电话，女人的桌上有一台打字机。画面中有两把椅子，女人的椅子隐藏在画面之外。

不论你是律所的高级合伙人，还是公司的行政文员，不论你是精干利索的极简派，还是马虎邋遢的地精派，不论你是为工作鞠躬尽瘁的劳模，还是视工作为狗屁的摸鱼者，在办公室物品的取舍过程中，你都应该向《夜间办公室》学习：只保留必需品。著名战地记者、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玛莎·盖尔霍恩就是这样做的，在她那充当办公室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小桌、一把餐椅、一台打字机。

“只保留必需品”有助于工作者心无旁骛，提高专注度，盖尔霍恩只需将白纸放进打字机的滚筒，就能开始敲击一篇言辞犀利的报道。“只保留必需品”还意味着，当遭遇突然的离职或裁员时，当事人可以安静且优雅地离开。不必大动干戈地打包物品，一个公文包就能带走一切。乘坐电梯从69层下至车库，就仿佛加班后正常离开。至于办公室里的那几盆绿植，还有办公桌上的那一缸



金鱼，你根本不必担心前者干枯至死，也不必担心后者因无人投喂而最终被冲进厕所马桶，因为它们是由公司租赁而来的，定期会有租赁公司相关人员继续照顾呵护它们。你的继任者与你享有相同的室内景观与权益。

也不要办公室里摆放家人的照片。如果此刻的你比照片中更老更沧桑了，只能说明岁月对你进行了正常的摧残，而如若此刻的你比照片中更年轻更有活力了，说明你的老板过于仁慈了，他需要再心狠手辣一些。只有一种情况下家庭照片具有其现实意义：行骗。法国电视剧《百分之十》中，某位经纪人想说服他管理的演员去做整形，以此减轻脸部的皱纹痕迹，但这位颇具个性的女演员崇尚自然之美，不屑于这些刻意去除岁月痕迹的手法。经纪人为了说服她，拿出自己的家庭合照，点明他的妻子与女演员年纪相仿，之所以脸部细腻光滑，就是因为接受了毫无隐患的微整形手术。在这张全家福前，女演员的意志动摇了。当女演员离开后，经纪人迅速撤掉了相框中的假家庭照，换上了真照片。真照片中经纪人的妻子与女演员一样，脸部有着岁月留下的痕迹。

办公室内健身器材的选择需要三思，如果发生意外，责任很难认定。不过在办公桌旁放置一根棒球棍倒是可以一举两得，不仅能证明你对运动的选择独具慧眼，还能在与人对谈陷入僵持时，产生那么一丝漫不经心的威慑力。■

我心里有过你

文·李凡卓 图·谢驭飞



《一代宗师》中，宫二姑娘对叶问说：“叶先生，说句真心话，我心里有过你。喜欢人不犯法，可我也只能到喜欢为止了。”这句话好比一个解禁的咒语，任何人听到都会心中微微一颤，连带出一场普鲁斯特式的记忆雪崩：本以为人生中的过客，在某个节点毫无征兆、无声无息地一径闯进你的心里，在你猝不及防之下，兀自大刺刺地高像素驻留，期限或短或长，但此情无计可消除，你根本无法克服她（他）的存在感，所以包法利夫人服下砒霜前满眼都是在永镇初遇实习生莱昂的情景，周作人听闻初恋情人去世说“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而杜拉斯与情人告别时的夜航场面几乎深埋在她所有小说的意象里。

有一些“心里有过”，短暂而飘忽。当人们从一段感情中退场，却发现自己成了往事的污点证人，不愿意再多提及，最后他朝相忘于烟水里；而另外一些，却可能像宫二姑娘对叶问，相去日远，岁月忽晚，那个人却常驻心间。

比起最后拥有，“我心里有过你”其实完美而安全。时间蚀去了现场的重量与坚硬的质感，回忆的意象变得摇曳多姿。“心里有过”的这个人，也自带了柔光与美颜滤镜功能，形象几近完美。要是真时时相对，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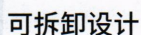
日相处，柴米油盐过起日子来，“我心里有过你”的美感十有八九轰然破灭。乔治·桑与肖邦抵死缠绵十余年，最后恋情已经淡得不能再淡，见面也是无话可说了，只有“好吗？”“好”。

所有情感都需要时空的辅助，爱情更是个娇贵的植物，要养它长大，需要适宜的温度、湿度与养料，才可能最后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倘若有任何一个环节有纰漏，“我心里有过你”就那样昙花一现，然后凋零下去，“只能到喜欢为止了”。

到“我心里有过你”这儿戛然而止，确实让人心有不甘，就像张潮在《幽梦影》中所言：“花不可见其落，月不可见其沉，美人不可见其夭。”但朱其恭反诘曰：“君言谬矣，洵如所云，则美人必见其发白齿豁而后快耶？”

在成年人的世界，爱情就像风险投资，可以倾注热情，但不值得身家性命都往上押。轻轻道一声“我心里有过你”，尔后相忘于江湖，这样虽然无缘看到险境中的奇景，但也就此避免了那些望梅止渴的焦灼、叶公好龙的狼狈、困兽犹斗的惨痛、曲散人终的哀伤，也许这就是普通人最智慧的一种选择。■

本栏目投稿邮箱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Metamorphosis by De Beers 系列融汇了雪花镶嵌、刀锋工艺和珠状装饰等镶嵌技术，嵌套式戒指中的 3.06 克拉 D 级无瑕钻石主石戒指既可以单独佩戴，也可与“嵌套”部分组成五层式的结构，“嵌套”的四节短链分别通过工艺和材质的组合演绎春夏秋冬的意象。



个性化配饰



伯爵 Polo 系列万年历超薄腕表的整体厚度仅为 8.65 毫米，1255P 超薄机芯能够准确地显示 2100 年之前的星期、日期和年份（月份、月相和闰年周期），可互换的单点触控（Single Touch）系统，便于轻松更换橡胶表带。

4MOTION 太阳眼的尼龙框架配有可伸缩镜腿和可调节脚套，全景镜片可调整至舒适角度，框架顶部的透气孔眼有助于防雾，靠近前额处的橡胶防汗带和可调节衬垫，缓解鼻梁不适感。



发烧动圈单元

HIFIMAN TWS500 真无线降噪耳机支持环境音模式切换，通话时也能有效过滤环境噪声，蓝牙 5.2 技术开机闪连，60ms 游戏低延迟，单耳仅重 4g，长时佩戴无压力，续航时间长达 26 小时。

轻型徒步

FACET 75 立体轻盈防水透气徒步鞋的鞋面采用 Navic Fit System 中足锁定系统，将脚面牢牢锁定在鞋底，结合耐磨网面及热熔材质加固，给予脚面有效的包裹性和支撑；外底 Adapt Trax 自适应防滑技术，能够更好地应对多种路面情形。



细节捕获

Revopoint RANGE 是一款可快速扫描大型物体的 3D 扫描仪，新型红外光投射技术，可实现 800mm 的扫描距离，0.1mm 级别的单帧精度，扫描速度为 12~18 帧/秒，点距为 0.3 毫米。



模块化自动浇水系统

Totam Planter 由智能花盆、控制器和水箱组成。传感器和控制技术可以监测土壤湿度、温度和光照等参数，并自动调整浇水量；紫外线防护可以抗菌；模块化设计可以轻松扩展容量。



心形设计

Alaïa Le Coeur 单肩包以心形设计为主题，搭配拉链开合与可调节肩带。光面红色小牛皮剪裁出纯粹的形状，在正中间形成一道折线。

珊瑚玫瑰

Rose Dior 耳环用红珊瑚雕刻出线条圆润的立体玫瑰，黄金耳夹一个采用树叶造型，另一个则是镶钻的蜜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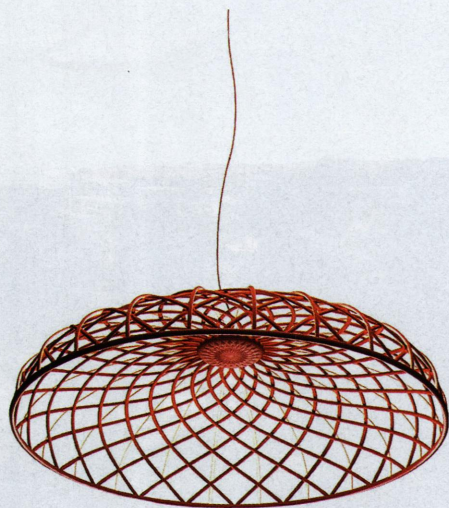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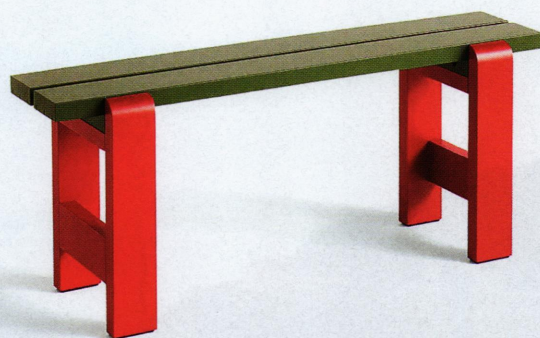
镂空交错

Jaeger-LeCoultre Reverso 腕表采用镂空交错的红色皮革表带，边缘添加醒目的金属滚边。玫瑰金表盘是典型的装饰艺术风格，上下表框点缀一排钻石。



缩小的长凳

Hay Workday 双人长凳由一块 3 米长的松木板制作，凳面宽度比传统长凳狭窄。精心切割的木板避免出现无用的边角料，实现制造过程中的零浪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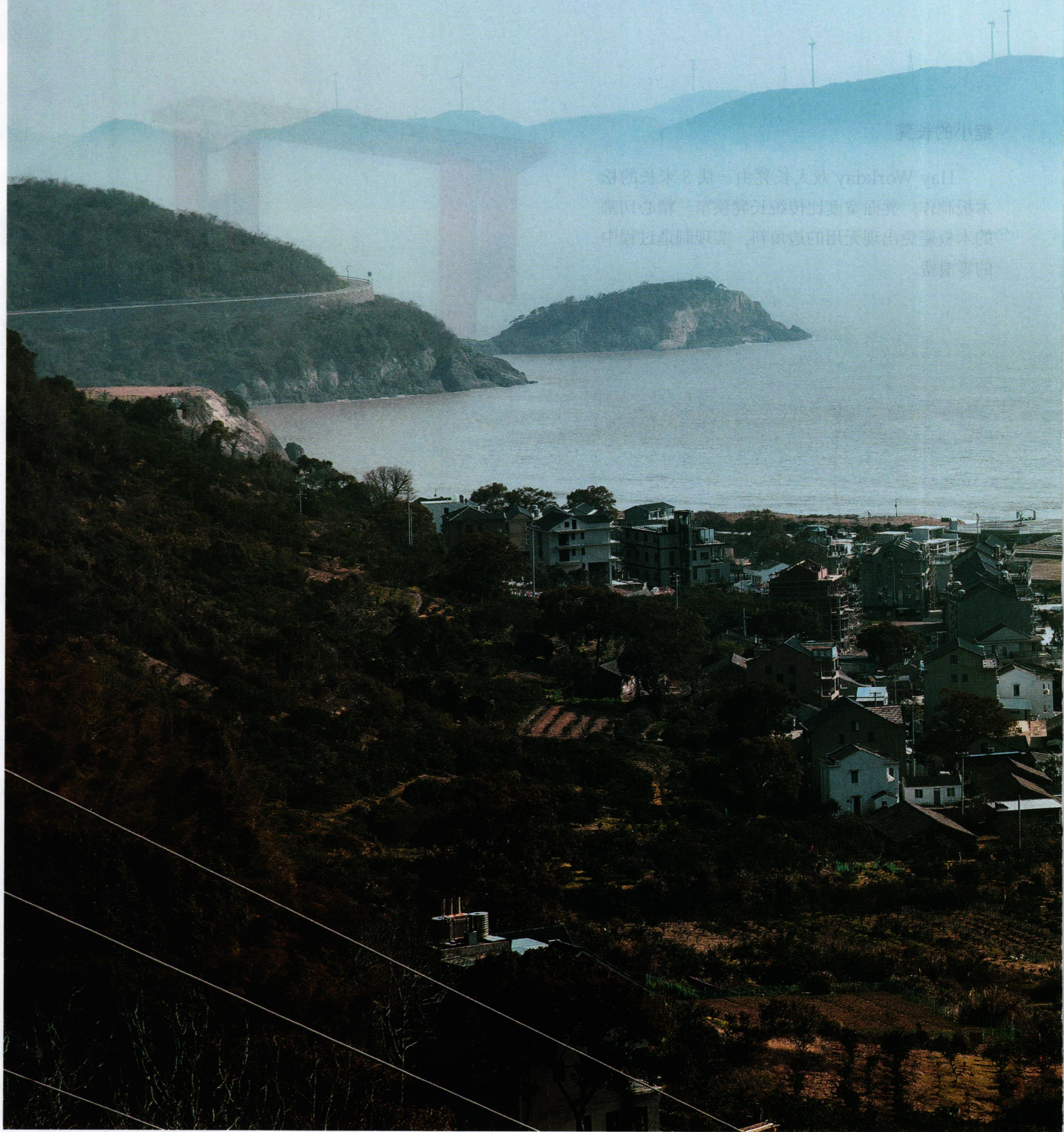
编织灯管

Flos Skynest 吊灯结合传统编织与创新技术，24 根发光灯管与不发光的织物管交叉构成圆形灯罩，让灯罩自身转变成特殊的光源。

奶油蛋糕

玻璃纤维制作的 Popus Babka 边桌，它的名称来自巴布卡奶油蛋糕。多层上漆形成桌子的亮泽外观，与坚实圆润的体积形成对比。





历史上的“双屿港”，曾经在16世纪是全球性的贸易中心

会林岛欧

主笔：张星云

象山县南田岛，是宁波市域内最大的岛屿。从岛的最北侧渡轮码头上岛坐车，需要40分钟才能纵贯到达岛的最南端。我们爬上半山腰到了当地的一座娘娘庙，庙门面对着的便是一望无际的东海。在门口不起眼的地方，竖立着一块短小粗糙的石碑，仔细看，这块碑从中间断过，又被重新接上，由于没有保护，这块长方体石碑已经快被海风侵蚀得变成圆柱体了。上面刻着几个字，被后人歪歪斜斜地描红：“金漆门一带各县，奉旨永远封禁”。

我在惊奇之余，不免将它与曾经见过的内陆界碑对比，同样是历史界碑，内陆传统边境上的界碑是高大方正，配有碑亭，保存完好，而在东南沿海，这类界碑却以一种近乎被人遗忘的方式存在着。

对于历史边城的好奇，就是我们这个专题的源起。十年前，历史地理学家葛兆光曾提出“从周边看中国”，而今，我们也希望能以记者的工作方式，再次从边地来看中国。何为边地？何为边城？在讨论这个专题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历史地理学者胡恒建议我们在更加多重的视野下来看待其界定。他说，中心与边缘一定是建立在某种参照系之上的，当参照系发生了变化，则边城所指也将随之改变。“中心与边城的角色，不仅仅是一种事实认定，它更代表了某种价值评判，当标准转换之后，中心与边缘便有易位的可能。海洋与陆地之间如此，草原与农耕均是如此，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更迭，与其说是统治秩序的没落与重建的循环，不如说是中心与边缘交替上演的连续剧”。

在这样的思考角度之下，我们第一辑关于边地的主题，首先选取以东南沿海四个海岛与古港——六横、南澳、洞头、月港——为踏访路线，来进入我们对于中心与边缘的历史行走。

与欧洲不同，中国古代历史上将大海视作外域之地，因此中国古代边城其实不止陆地一侧，在东南沿海也存在诸多海疆边地。自明初开始，政府便实施了“片板不许下海”的严格禁海令，

以“悬居海岛，易生寇盗”为由，严禁百姓从事海外贸易，东南沿海大量居民被迁徙至内陆，出现了大量荒岛。

然而历史往往存在一种反差，这些东南沿海的边地海岛虽然处于中国大陆的地理边缘，当全球大航海时代开启，却又因与世界海洋网络连接而加入过世界贸易的中心版图。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西欧国家为了寻找前往东方的新航线，开始了一系列航海探险活动。如主笔薛巍在他文章中介绍，先是葡萄牙的亨利王子指挥其船队沿着非洲西海岸探索新航路；其后，迪亚士发现了好望角；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达·伽马率领探险船队首航印度；麦哲伦横渡太平洋，完成环球航行，这些活动范围广，改变了世界局势，西方人称为大发现时代、探险时代，日本学者称之为大航海时代。由此，被封禁的东南边地海岛成了全球性自由贸易在中国的最初土壤。我们选取的四个岛屿，某种意义上，基本完整串联了这样一条时间线索——

1540年前后，葡萄牙人在史料记载中不断出现的“双屿港”建立固定居所，居住1200名葡萄牙人，双屿港成为葡萄牙与日本贸易的中转地，也成为全球性的贸易中心，很多当地中国人也参与到贸易之中。

1548年，双屿港被提督浙闽海防军务朱纨率领的军队填灭，部分海上集团、葡萄牙海商南下广东，主要转向珠江口。广东汕头南澳岛也是其目的地，私人海商聚集，直到1575年南澳岛首设总镇府。

两年后，剿灭双屿港的朱纨在福建任上下狱、自杀，这件事成为之后漳州月港开放的一个契机。1567年，“隆庆开关”，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漳州月港盛于1573年至1619年，明朝出现开放的局面。

1684年，清政府真正解除明初以来的“迁海”政策，设置粤、闽、浙、江四海关。1726年至1730年，浙江玉环岛复垦，清政府在岛上首次以经济开发为



(TPG/alamy 供图)



(TPG/alamy 供图)

《雪尔登中国地图》收藏于牛津大学，标识了明朝中叶中国帆船经常使用的6条东洋航路和12条西洋航路，又称《明代东西洋航海图》。

《雪尔登中国地图》局部，自台州而下至漳州，即为我们此次走访的东南海岸沿线一段，以4个岛屿、古港串联了明清海洋贸易由禁而开的过程。

由设置玉环海岛厅，中国东南沿海才逐步开放。

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们四位记者分头走访了这四座岛屿、古港。我去了舟山六横岛，希望从不同层面的讲述中，寻找隐没于现实世界，却曾是16世纪亚洲最大自由贸易港的“双屿港”的踪影。我的同事陈璐走访了福建漳州月港，此地，在西方世界的记载里是与双屿港齐名的国际海洋贸易中心，闽南海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在明后期的开关，是明朝正式给予私人海洋贸易以合法位置。卡生前往广东汕头南澳，南澳岛是明代的海商冲破当时政府海禁的庇护地，也是东西洋私人海商贸易的重要中转站。肖楚舟则从台州玉环到温州洞头，这片海域上的所有岛屿都曾统一归清朝玉环厅管理，在这些海岛上的开垦则成为农业开发样本，如今三百年过去了，岛屿与陆地的关系已经被现代交通彻底改变。

在全球大航海时代背景之下，中国东南沿海

私人海洋贸易的兴与灭，海岛的开与关，民间社会海商与海盗身份混杂，而致出现的“海盗商人”这种特殊群体……只有回到时间与地理空间之中，才能真正走进并理解这一段历史。这些海岛，偏远、外向、流动性强，没有被纳入“编户齐民”的人来到因迁弃、封禁而不受官府管辖之地，形成了一种海岛社会形态。岛民依赖交换和市场，由此形成了中国东部沿海长达数千公里的贸易地带。与此同时的外部世界，是从1511年葡萄牙占领满刺加开始，欧洲人逐步与中国开始了直接的经济文化交流，而这些海岛居民，也成了第一批接触到早期经济全球化的中国人。以中原视角来看海岛是边地，在海洋贸易甚而历史整体发展中却能扮演重要角色。

直至今日，踏上这些海岛，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与内陆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海岛流动的历史，体现出的是一种社会形态下内生的生机和活力。■

“边城”从未真正“边缘”

特约撰稿·胡恒

只要转换视角，所谓中心和边缘的角色便具有了逆转的可能。如东南沿海的岛屿，如以中原王朝和陆地政权视角来看，他们位居海洋，农耕不兴，是一个容易窝藏逃犯、对政权稳定带来威胁的是非之地。但如以海洋视角而言，沿海的海岛又充当了连接中国与海外贸易的重要角色，故以海洋而言，海岛上的边城是中心，而原王朝中心地带的城市则是边缘。

自从沈从文的《边城》一书出版以来，“边城”一词不胫而走。说起“边城”，辉映在多数读者脑海中的似乎便是湘西那片神秘的土地和古老的城墙，它们构成一种关于“边城”的固有印象，一如民国时期，曾经在上海多次演出过的戏剧《边城故事》中开头描写的一般：

草原，高山，森林，旷野……

成群的牧羊者，湍急的河流里的淘金人……

牛羊肉，酥油，乳酪，用青稞与土法制成的土酒……

西南边陲，重山叠嶂中留有这样一个偏僻和古老的县城，四周遍藏着金沙的山岭把这县城映衬得并不冷落。

“边城”，通常意义上指的是中国的国土边境一带，“边城”同于“边塞”，使得边境险固之意。它既是沟通中外的要道，也是偏远荒凉之地。不过这只是“边城”的一面，在中国历史上，它显然要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

我们谈“边城”，是和中心相对应的，有中心才有边缘，有边缘也才有中心，二者相伴而生。中心与边缘一定是建立在某种参照系之上的，当参照系发生了变化，则边城所指也将随之改变。随着中国历史上的疆土盈缩和首都变迁，边城所指也经常变化。今江南、江汉平原一带，《史记》中尚记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楚越之地，地广人稀”，这里尚属边陲之地，但魏晋南北朝以后，随着江南地

区的开发进程，这里自然再不是“边缘”的角色。苏东坡曾经流放于杭州，在当时，这自然是流放边城的苦难之旅，但今日自然不可视杭州如边城。再如北京的历史角色，变迁更是巨大，秦汉隋唐时代，今北京所在自然属于通常意义上的“边城”，而元代以降，当北京成为统一王朝的首都，自然便不能再将其视作“边城”，但到了1928年以后，国民政府定南京为首都，北京就成了故都。等到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及华北之际，北京在时人心目中再次具有了边城的角色，1937年第3卷第5期《文化建设》上刊登过一篇文章《寂寞的边城》，说“转眼间北京古城到现在已是几经沧桑，由首都变成故都，由全国的中心重镇变成国防最前线的边城”，这便是中心、边城不停转换的典型例子。

另一方面，我们谈中心与边城，也存在一个尺度的问题。在一个大一统王朝国家，边城往往分布在一个广袤疆土的边缘地带，但如是分裂时期，中国疆土被分割为数个分裂政权，则“边城”所指也许是原大一统王朝的中心城市，地理空间尺度的变迁带来中心、边缘的巨大变化。此外，如是就国家尺度而言，国土边境线附近的城市更符合人们对于边城的期待，而如从省区视角来看，省与省交界的地带也是边城，内地的边缘地带也是边城，像沈从文所讲的“边城”更符合后者的定义。如是采用更小的尺度，则“边城”的范围显然要扩大很多。此外，边城既可以是地理尺度上的，也可以是文化尺度上的，当历史上如川西、晋北一带的城市如康定、多伦等城市，由于处于文化圈的交界一带，在时人和后人心目中，也往往具有了“边城”的定位。

当我们谈起边城，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是我们心中有一个“中心”在，“中心”和“边城”，在人们心目当中构成了一种等级秩序。这一等级秩序背后既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政治意义的。从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籍《尚书》所记录的“五服制”开始，围绕统治核心地带，一层一层向外扩展出去，形成



大门岛的寨楼村面对玉环，把守着通往乐清湾的航道。东南沿海的岛屿，以中原王朝视角来看是边缘，在海洋贸易中却可能扮演重要角色

一种存在严密等级的统治秩序，这便成为中国“天下观”的核心。等到“戎蛮夷狄”逐渐与东西南北的方位连接起来，形成一套华夏居中，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居于四方的“华夷秩序”。由于边城在多数人的心目中处于华夷交界一带，边城便潜在地具有了在地理上较为偏远、在文化上处于末梢的位置。

可是，这样一种观察角度，毋宁说是一种带有中原王朝、中原文化中心主义的固有视角。只要转换视角，所谓中心和边缘的角色便具有了逆转的可能。如东南沿海的岛屿，如以中原王朝和陆地政权视角来看，它们位居海洋，农耕不兴，是一个容易窝藏逃犯，对政权稳定带来威胁的是非之地。但如以海洋视角而言，沿海的海岛又充当了连接中国与海外贸易的重要角色，故以海洋而言，海岛上的边城是中心，而原王朝中心地带的城市则是边缘。中心与边城的角色，不仅仅是一种事实认定，它更代表了某种价值评判，当标准转换之后，中心与边缘便有易位的可能。海洋与陆地之间如此，草原与农耕均是如此，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更迭，与其说是统治秩序的没落与重建的循环，不如说是中心与边缘交替上演的连续剧。

此外，在一个统一王朝内部，中心往往意味着

某种核心秩序的奠定，边城则因处于文化圈的交界与前沿阵地，在被王朝视作不稳定因素的同时，往往意味着变革最有可能从此发生，故而边城又代表着与某种不稳定秩序相伴而生的生机与活力，也意味着一些新的制度最有可能在这里萌生。在中国历史上，商取代夏，秦的统一，清的入关，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边缘群体进入中心的故事。学术界近年来开始关注中共革命起源的地理视角，大家常常发现中共革命往往最先由省界交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边城”一带兴起，最终在省界交界地带建立革命根据地，后来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域，最终实现了全国红色政权的建立，这就是“边城”的巨大潜力。“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一定程度上讲也是赋予了“农村”这一看似边缘的区域一种“中心”的角色，并最终在战略上达到了以边缘颠覆中心并进而成为中心的定位。

以一语言之，“边城”从未真正“边缘”，它同样是历史的主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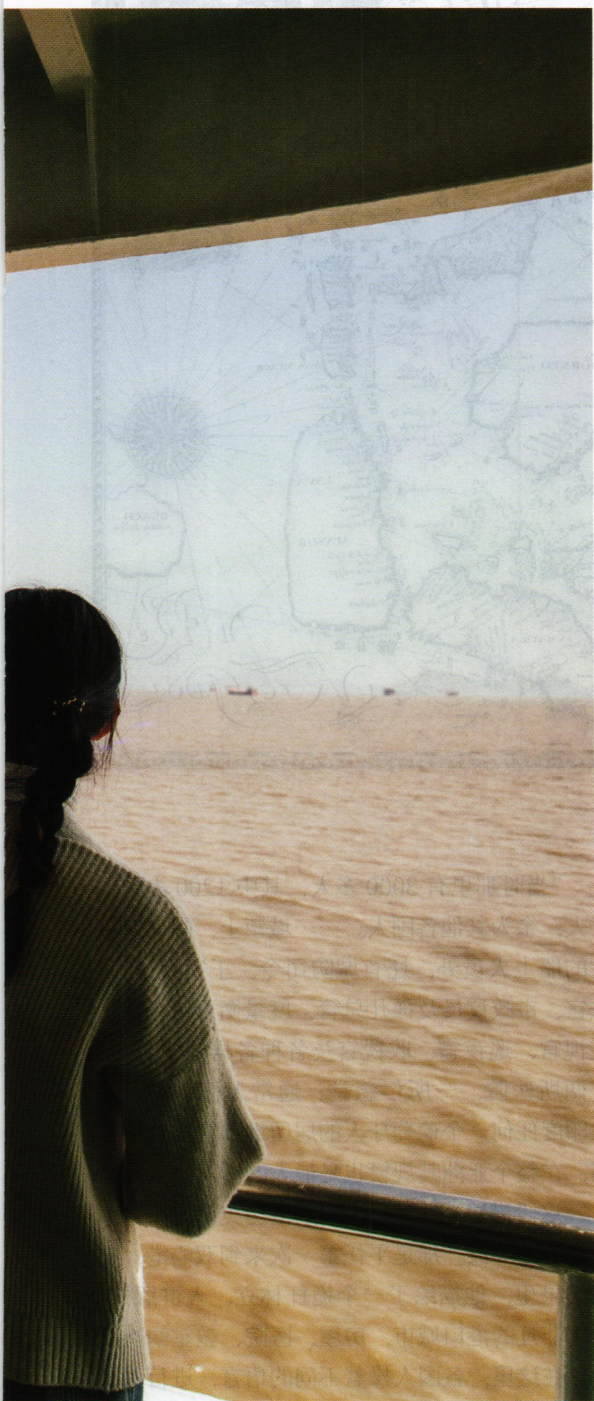
（胡恒，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是清史、历史地理，出版《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等专著）

双屿港，存在于讲述中的海岛

主笔·张星云 摄影·蔡小川



六横岛是舟山群岛第三大岛，却鲜有游客前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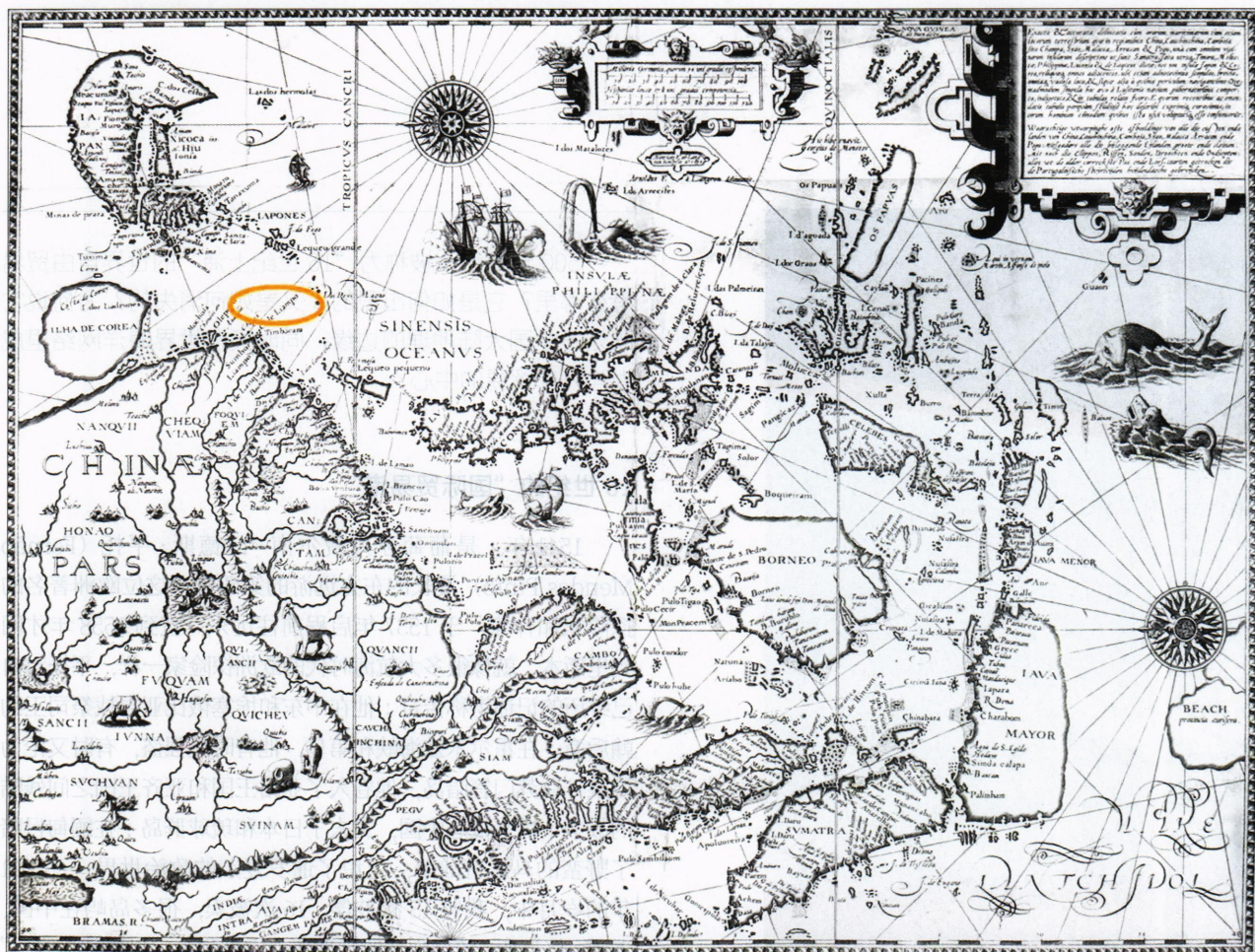
500 年前那个被称为“16 世纪上海”的世界自由贸易港在哪里？它是如何出现的，又是如何消失的？为何说它既处于中国大陆地理的边缘，同时又在世界海洋网络里成为与外部贸易的中心？

16 世纪的“国际贸易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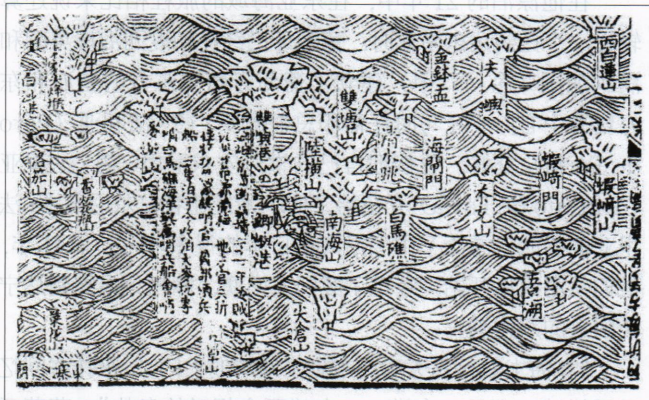
1541 年，是葡萄牙人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漫长的东方远游的第四年。这位欧洲著名的探险家和作家，于 1537 年启程前往远东，直到 1558 年才回到里斯本。就像很多大航海时代的欧洲探险家一样，平托对自己经历的记述堪称传奇：他在中东和埃塞俄比亚寻找祭司王约翰后裔；在霍尔木兹海峡和第乌，他有时是强盗，有时又沦为奴隶；在苏门答腊岛，他卷入了亚路王国和亚齐王国之间残酷的战争；后来抵达中国，又去了日本和琉球群岛；在缅甸目睹了野蛮的马达班战争，见识了暹罗复杂的政治世界……“21 年的岁月中，我曾 13 次被俘，16 次被卖，很多岛屿在中国、暹罗、格乌斯、琉球作者的地理著作中被称为‘世界的边缘’。”

在他漂泊的 21 年中，在东亚海域的旅程相比来说还算轻松。平托到达东南亚时，葡萄牙已经在印度西海岸果阿和满刺加国（今马六甲）建立了葡萄牙殖民东方的首府和东方贸易中心。平托与时任葡印总督佩罗·德·法利亚（Pero de Faria）交好，总督把自己的堂兄安东尼奥·德·法里亚（Antonio de Faria）介绍给了他。平托随着安东尼奥·德·法里亚的船队，游历了中国沿海和日本的很多地方。1541 年，他们从海南岛开始，经过了厦门、南澳、漳州，最终到达宁波附近的双屿港。

“在海上航行六天后，来到了双屿的大门。”平托在回忆录里描述，那是一个港口，有“两个相对的岛屿”，葡萄牙人在这里建立起了一处上千所房屋的城镇。他们一到双屿港，便被热情迎接，“那里的 26 艘大黑船和 80 艘容克木船以及数目更多的班康船早已按序排成两行。……港口的中国、马来亚、昌巴、暹罗、婆罗洲、琉球等国人在乐器演奏的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到达码头”。



1596年荷兰人林斯科滕所绘的东亚及东南亚海图，左上红圈处为双屿港



明万历年间的浙江沿海图，其中就有双屿港

通常人们说，双屿比印度任何一个葡萄牙人的居留地都更加壮观富裕。

“当时那里有3000多人，其中1200为葡萄牙人，余为其他各国人。……城镇上，除来来往往的船上人员外，还有城防司令、王室大法官、法官、市政议员及孤儿总管、度量衡及市场物价监视官、巡夜官、收税官及各种各样的手艺人。有两所医院，一所仁慈堂。通常人们说，双屿比印度任何一个葡萄牙人的居留地都更加壮观富裕，在整个亚洲其规模也是最大的。”

这段描述，后来是对双屿港历史研究中被引用最多的一段。那是平托第一次来到双屿港，在回忆录里，他描绘了一个桅杆林立、人群熙攘、热闹非凡的港口城市，房屋、医院、教堂鳞次栉比。在这里，各国人操着不同的语言，进行着贸易，商品涵盖了香料、丝绸、瓷器、茶叶和白银。

平托说，葡萄牙人在那里的贸易额超过 300 万葡元，无论带什么样的商品到日本，都会赚回 3~4 倍的利润。也因此，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将双屿港称为“16 世纪之上海”。

平托这本回忆录取名《远游记》，手稿成于 1576 年，后提交教廷审查，直到 1614 年才出版，一经面市便轰动一时，但此时距离平托去世已经 31 年了。这本书的中文译者，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研究员金国平告诉我，实际上该书一出版，西方学界即陷入了对其内容的真伪之争。《远游记》作为一部游记，像大航海时代欧洲的很多探险游记一样，所说常常有所夸大。金国平说，应该将该书作为纪实文学看待，与中文、日文等确认的史料重合之处，是更可信的。

如此热闹的双屿港到底真实存在过吗？实际上，除了平托的《远游记》，明朝负责闽浙海防的朱纨所写《鹭余杂集》，以及明代海防专家郑若所编《筹海图编》，都对双屿港有所记载。各路专家讨论不断，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汤开建曾对平托《远游记》中的港口开设时间、港口人数等细节都详加考证。

平托当时跟随安东尼奥·德·法里亚的船队在双屿港停留了 5 个月才离开，后来他又几次去过双屿港。不过这个在当时被称作“东亚最著名国际贸易港”的地方，却极其短命，按照中外史料记述，它前后只持续了 20 多年，于 1548 年被时任提督闽浙海防军朱纨率军捣毁，港口被填。

由于至今没有任何考古遗址被证实与双屿港有关，历史学界对双屿港的具体位置一直存在争议。平托回忆录原文中将这处海港称为“Portas de Liampó”，早在 17 世纪，欧洲传教士就开始考证它到底在哪里。20 世纪中期，中国学者方豪通过对比各种史料文献，指出“Liampó”应该是宁波，宁波东部的舟山群岛中的六横岛，很可能就是双屿港所在地。

走进六横岛

作为 500 年前曾经重要国际港口的所在地，现在人们提起舟山群岛，最先想到的是我国最大

天然渔场和旅游胜地普陀山。六横岛尽管是舟山群岛的第三大岛，面积 140 平方公里，但鲜有游客会来这里。3 月初的舟山海风依然湿冷，我和摄影同事从舟山主岛坐渡轮，一个小时就到达群岛南部的六横岛。

上岛后我一开始是抓瞎的。没有考古遗址，没有存世遗迹，岛上经历了明初、清初两次内迁，现居民多为清康熙、乾隆年间从浙江沿海各地来的移民。一处 500 年前只存在了 20 多年的港口，如何走访？

但到了岛上的第二天，我就释然了许多。双屿港似乎早已销声匿迹，但又似乎无处不在。从舟山去六横岛，我们坐的渡轮就叫双屿号。六横岛西北端的涨起港是学界对双屿古港口位置的主要推测地之一，如今涨起港村已经改叫双屿港村。岛东端的台门社区，则被改造成了双屿商港小镇，街道两旁建的是红色屋顶的仿葡萄牙式建筑。

在六横岛，舟山市双屿港博物馆筹建办工作人员刘爱雯、沈汉敏带着我们去了学界推测的几个 16 世纪葡萄牙人港口的地点。其中之一就是六横岛西北端的涨起港，它处在六横岛与西北侧佛渡岛中间几公里宽的水域上，是从古至今浙江沿海的主要航道，水最深处 90 米，可通万吨轮。史料记载，朱纨在 1548 年派兵捣毁作为葡萄牙人贸易据点的双屿港后，曾亲自来到这里视察，他在给明廷的奏章中说，“臣自霖衢所亲渡大海，入双屿港，登陆洪山”，双屿“去定海县不六十余里，虽系国家驱遣弃地，久无人烟住集，然访其形势，东西两山对峙，南北俱有水口相通，亦有小山如门障蔽，中间空阔约二十余里”。这段奏章成了日后学者们考证双屿港位置的重要线索。

如今的涨起港，是一处平静、狭窄的渔民码头，这里的渔民曾经靠拖虾致富，现在码头却隐匿在阡陌的海陆航线之中，在它的北侧，是遍布修船船坞的龙山码头，南侧是正在建设的跨海大桥。站在码头上远望，可以依次看到佛渡岛、梅山岛，远处是隐隐可见的宁波。六横岛现在隶属舟山市，但实际与宁波非常近，跨海大桥通车后，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宁波。

当地人说，除了航道上的两座小岛，实际上



上图：如今六
横岛最大的产
业是修船厂，
中午船厂工人
刚下班

下图：龙头跳
海滩现在还能
找到很多被冲
上岸的碎瓷片



涨起港码头背后还有两座小山，叫作上峙、下峙，在后人围海屯田，致地面逐渐升高之前，两座小山是孤立于海水中的。学界认为，这与朱纨所说的“两小山如门障蔽”及平托所说的有“两个相对的岛屿”相符合。此外根据朱纨的记录，他在派兵捣毁双屿港后，为了避免后患，命人用木石筑塞双屿港的口门，导致了港湾内自然淤积，这也是当地人将此称为涨起港的原因之一。

但依然，至今没有任何一件出土文物和遗迹可以印证这里就是双屿港。实际上我们去了几处可能的地点，或多或少都听到过这样的传说。现年74岁的刘爱燮世代居住在岛上的蛟头村，他说60年代村里挖井，曾挖出来很多大树的树根和旧船板，其中很多木头用料很好。像这样的村子，在六横岛有好几个。

碎瓷片更是随处可见。当地人带我们去了六横岛东南端的龙头跳海滩，这是整座岛少有的要买门票的旅游景点，因为沙滩松软。我们在沙滩上散步，五步十步就能见到随着海浪冲上来的碎青花瓷片。岛上各个港口都有可能找到这种碎瓷片，甚至拖虾船都能捞到，且年代各不相同，宋元明清皆有。作为历史上的重要航道，这倒并不稀奇。

但舟山博物馆研究员贝武权还曾在六横岛东侧的悬山岛上找到过两片红绿彩瓷片，则也可能是进一步证实双屿港存在的证据。1511年，因为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切断了景德镇窑厂制作青花瓷的钴料供应，景德镇窑工不得不生产红绿彩瓷，以满足市场需要。

如今学界比较接近的共识是，16世纪的双屿港不止一座港口，在六横岛上，起码存在着两大中心势力，除了葡萄牙商人集团，还有中国海商组成的集团。正是两个集团的相互作用，才将这一16世纪的国际贸易港口历史维持了20多年。

朝贡贸易的不断瓦解

1540年，一位徽州府歙县的年轻人决定南下广东谋生。他对同行的同伴说，不应该只盯着眼前的土地，应该将眼光望向辽阔的大海，“科第只

收酸腐儿无壮夫，吾侪孰与海外徜徉乎，何沾沾一撮土也！”于是他在广东打造海船，贩运硝磺、丝绵等到东南亚各地，他本人也“历市西洋诸国”，在暹罗的阿瑜陀耶、马六甲和中国之间往来。此人就是汪直，在历史上也被称为王直。

在这片海域，他结识了才到达东南亚不久的葡萄牙人，以及同样在这片海域做生意的徽州同乡许栋。许栋比汪直更早就开始在海上做贸易，生意的规模也更大，按照郑舜功《日本一鉴》记述，许氏兄弟集团在马六甲做生意时认识了已经殖民这里的葡萄牙人，并带葡萄牙人来江浙沿海做生意。

实际上早在唐宋时期，舟山作为长江门户、南北要冲，就已经成为浙东沿海商贸的中心，到了宋元，随着海上贸易的发达，更是将舟山推向了一个顶峰，此时舟山地处明州港东去高丽、日本的必经航道上，舟帆川流不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地。

至于入明代后，是中国人还是葡萄牙人最先将双屿港作为贸易港口的，史学界同样众说纷纭。如今研究文献中双屿港形成的最早年代，可以推到1524年，当时岛上已经“耕田筑屋”。而如果想要理解双屿港形成的原因，则要再向前倒推一两年。

1523年，两批日本朝贡使团同时来到宁波港。由于禁海令，当时明朝海外贸易唯一合法方式是“朝贡贸易”，暹罗、日本、占城、爪哇、满刺加等朝贡国的商船载贡品、土特产来华，明廷收取贡品等物后，以赏赐方式回酬外商所需中国货物，作为市舶司的宁波港专门接收来自日本的朝贡船。

不过那年两批日本朝贡使团在宁波港因贿赂市舶太监、争夺通商特权起了矛盾，进而爆发了武装冲突，并乘机烧抢了宁波城，史称“争贡事件”。事后明朝政府采取更严厉海禁政策，罢宁波市舶司，中国东南沿海开始了长达17年的全面海禁。也就是在那一时期，宁波港外，舟山群岛上这些大大小小的岛都因严厉的海禁和内迁政策变成了荒岛。

海外贸易终止，但江南各地，商品经济依旧继续繁荣发展，大量的丝绸、棉布、瓷器等商品仍需开辟新的市场，中国周边诸国曾是这些商品

左图：六横岛村子里至今流传着很多关于双屿港的民间传说

右图：龙山街是现在最像双屿港的地方，这里的餐厅很国际化，都有英文菜单和洋酒



的主要销往地。在巨大利益驱使下，明代以后，东南沿海走私贸易屡禁不绝。

1521年，广东水师奉命驱逐葡萄牙人在屯门岛地区（今深圳南头）设立的走私贸易港，史称“屯门海战”，葡萄牙失利后，被迫北逃，转到广东南澳岛、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继续从事走私贸易，舟山群岛南部的六横岛，荒无人烟、地势险要，逐渐成为海商们的中转地。

广东历史学会会长、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李庆新教授对本刊说，在近代之前，东亚世界确实存在一种处理各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国际关系体系，这种体系就是以中国为中心、几乎覆盖亚洲全境的朝贡制度，即朝贡贸易体系，是亚洲历史上，也只是亚洲历史上的独特体系。但就在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进入东亚海域后，朝贡贸易体系开始面临变化，由于欧洲人不属于朝贡体系范围内，他们的到来，对朝贡体系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事物，从朝廷层面是被动应对，但从地方层面，则是主动探索。

到了1540年，不受海禁政策管控的双屿港发展得已经初具规模。按照史料推断，当时葡萄牙海商集团和以许栋为首的中国海商集团已经都居住在岛上，只不过各有港口。一年后，平托随法利亚的船队来到了双屿港，晚年以文字记录下了这座当时国际自由贸易港的繁华。

平托上岛之后的一两年内，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在东南亚进行贸易的汪直，和三名葡萄牙人带领着上百名番商从暹罗（今泰国）乘船北航向双屿港进发，途中遭遇风暴，结果漂流到琉球国南端种子岛（今属日本鹿儿岛县）。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次奇遇漂流，让葡萄牙人“发现”了日本。

第二年南风汛发时，汪直又和葡萄牙人一起从日本返航驶抵双屿，并加入许栋集团。此时恰好遇上日本的朝贡使团，于是他们便同当时在双屿的中外商人交易。交易完后，许栋派汪直率“哨马船随贡使至日本交易”。1545年，汪直又到日本博多津，再邀日本商人来双屿港进行贸易，“泊



、澳之散、鼠、面米吵、菩另吾干窗之食
厨尝未、市改已采另虫站、常干番智荷其

客拥有徒众万余人”，或五艘十艘，或数十艘，分泊各港。自此，葡萄牙人开始跟随汪直开辟的贸易路线贩运中国货至日本，史称“南蛮贸易”，而双屿港，就成了葡日贸易最重要的中继站。

这一系列事件彻底改变了东亚海域各国的命运。陪同汪直去日本的葡萄牙人，给日本人带去了佛郎机銃火枪这一划时代的战斗工具，被日本史学界认为直接促进日本结束战国时代、达成统一。而葡萄牙人则在日本发现了大量的银矿，白银自此成为日本重要的出口商品，尤其在以学自中国的精炼技术“灰吹法”大幅提升了白银的产量后，日本一跃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白银产地之一。到16世纪末，日本白银产量已占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鼎盛时年产量高达200吨。平托在《远游记》里就曾说，葡萄牙人通过双屿港与日本的买卖超过300万葡元，其中大部分为白银。

日本大量增加的白银，为经济注入活力，也从根本上解决了日本和西欧在与中国贸易中的逆

差问题。由于拥有大量的硬通货，日本海外贸易逐渐进入全盛期，日本所产的白银，大部分用来购买中国商品，所以日本也成为东亚最重要的贸易角色。据估计，葡萄牙人每年将从中国丝绸贩卖于日本的生意中获得235万两白银，作为他们购买回欧洲的中国货物的资本。日本从外贸中获得的财富急剧增加，使得统治者有更大的能力参与国际事务。

白银带来的连锁反应还在继续。在中国白银是非常受欢迎的贵金属，金国平等学者就认为，白银的大量输入，让原本“银荒”的中国得到了积累，逐步完成白银的货币化，最终帮助张居正于1581年将“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这一新的赋税及徭役制度规定，田赋、徭役等不再以实物的方式进行征收，而是统一按亩折算征收银两，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也为私人贸易经济注入活力。

走在今天的六横岛，在某些时刻，依然能感受到双屿港作为东亚自由贸易港时期的微妙影响。



上图：宁波博物馆中复原的双屿港繁忙景象

下图：在朝贡贸易发达的时期，日本贡船停靠宁波港的景象

我们攀登山上的碎石古道，企图寻找古双屿港确切地点的更多证据，据平托《远游记》记载，双屿港附近“山头有淡水溪流，穿过茂密的树林直淌而下，林中多雪松、橡树、五针松、海松”，当地人告诉我，实际上我们所攀登的这座上以前就是布满松树的，直到上世纪80年代，六横本地人从日本走私来了一批烂木材，其中的松毛线虫在岛上大量繁殖，这片松树林后来被松毛线虫啃食光了。

可以说，汪直集团和双屿港贸易是并行成长的，而在大航海时代，随着朝贡贸易一起不断瓦解的还有明朝的海禁政策。

双屿港规模的持续扩大，使得附近的许多百姓也卷入了这场国际贸易活动之中，有的为葡萄牙人充当翻译、向导，有的为之造船、修船，有的竞相販售酒米、时鲜等食品。福建同安人林希元记述：“（葡萄牙人）与边民交易，其价尤平。其日用饮食之资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鸡之数，其价皆倍于常。故边民乐与为市，未尝侵暴我边疆，杀戮我人民，劫掠我财物。”但这些百姓“视海贼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讎”，在官府记述里就是“从番者”或者“倭寇”。

面对规模日益扩大的海上私人贸易，中国沿海曾经无人的荒芜海岛变得越来越热闹。1547年，明朝政府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和浙、闽海防军务提督，开展全面整顿沿海的工作。1548年5月份，朱纨选了一个大雾天气，命明军突袭双屿港。平托、汪直、朱纨的人生，在这一年交集在这里，又消散在这里。

双屿港覆灭：海商与海盗的界限

“双屿在片刻之内被摧毁，夷为平地，我亲身经历了这场灾难。”按照平托回忆录的记述，他当时就在岛上，明朝派出了一支由300艘大帆船和80艘双桅帆船组成的

大军前来攻打，杀死了“1.2万”人，其中葡萄牙人有800人，并焚毁了所有房子。而根据中文文献《璧余杂集》记载，当时进攻双屿港的明朝军队有2000多人，兵船30艘，死者千余人，汤开建认为，平托的1.2万死亡人数，应该是1200人的误记，因为平托之前说过双屿港总人口为3000人。

至于双屿港被消灭的直接导火索，中外文献中都有记述。岛上葡商佩雷拉借钱给华人，而对方赖账不还，于是佩雷拉带了几名葡萄牙人劫掠了双屿港附近的村庄。一次暴力事件，最终引发了双屿港的覆灭。“据说，仅在白银、胡椒、檀香、苣蔻花、核桃及其它货物上就损失了十五万金。”平托记述道，“还有一件更坏的事情。从此，我们在当地名誉扫地，根本无人愿意同我们打交道，说我们是披着人皮的魔鬼。”

明军突袭后，朱纨认为要永绝后患，必须“塞港”，即摧毁港口设施，用木材以及石头堵塞航道。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这座连通大航海时代，号称16世纪东亚最著名的国际自由贸易港，在历史舞台上落下了帷幕。历史上，明廷官员唐顺之、朱纨以及清朝诗人朱绪曾，都曾经为双屿港留下诗作，借以双屿港外的浪涛汹涌和壮丽景色，表明远大志向。如果不封禁，或者明政府没有特意剿灭，历史会发展成什么样？这是一座可以用很多“如果”作为前缀的港口，但现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按照朱纨自己的记载，明军摧毁双屿港后不久，附近海域仍有1290多艘私人商船游弋。逃走的葡萄牙人由此沿中国海南南下，最终来到澳门。1553年，葡萄牙人通过贿赂广东地方官吏，获准在澳门码头停靠船舶进行贸易，1573年，获明朝政府租借地。

而朱纨在剿灭双屿港后，继续前往福建整治当地沿海。日本历史学者田中健夫在《倭寇，海上的历史》中分析说，朱纨是位清廉刚直的官僚，在受嘉靖皇帝敕谕整治沿海时，他就非常清楚，沿海走私贸易的背后是乡绅和地方官僚，从官府立场出发，他视沿海走私的商人为“盗”，对待“盗”就必须“剿”，因此朱纨才会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滨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犹难。”结果可想而知，由于剿灭双屿港

牵动了太多地方利益，加之他前往福建后，再度引起当地不满，谗言御状一直告到了皇宫，1550年，朱纨在压力下自杀而死，后来，他的自杀事件成了福建港口开放的一个契机。

港口被捣毁，但中国沿海的百姓依然需要海外贸易来生存。在双屿港突袭中成功逃生的汪直收编了许栋集团的残部，进而发展成为新一代海上集团首领。史记，“许栋灭，王直始盛”。靠着与日本长期贸易往来的关系，汪直率众来到今日本长崎，以此作为基地，从事海上贸易。汪直雇佣了很多日本当地人人为他建造巨舰，《筹海图编》里写，这些船“联舫一百二十步，可容二千人，上可驰马”。

但汪直的梦想可不是在日本站稳脚跟这么简单，他要的是明朝取消海禁政策，彻底开放东南沿海地区，因此1552年，他多次配合明朝政府解决沿海倭寇问题，还吞并了福建海盗首领陈思盼的部队。同年，在地方官员默许“私市”的暗示下，同年他带领人马在定海主持开市，史记：“直乃绯袍玉带，金顶五檐黄伞，其头目人等，俱大帽袍带，银顶青伞，侍卫五十人，皆金甲银盔，出鞘明刀，坐定海操江亭，称净海王，居数日，如履无人之境。”自此他的“五峰旗号”大舰也成了海上的通行证，黑白两道通吃。

明朝沿海地方政府默许汪直的存在，但中央政府却不这么认为，所以派抗倭名将俞大猷在1553年的一个深夜围堵汪直部队，汪直突出重围逃至马渍潭，再被破，家属也被俞大猷拘留，于是汪直逃到日本长崎。在日本，汪直立国号“宋”，自称“徽王”，成为当时东亚最大的海盗集团，率领巨舰百余艘反击明朝。

后来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的胡宗宪，是这样记录汪直这段历史的，“分踪入寇，因求开市不得，掠浙东沿海”。至此，在明朝官方历史记录上，汪直被正式定性“入寇”。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伯重认为，依照学界较新的看法，历史上的倭寇分前期倭寇和后期倭寇，以1552年为界，后期倭寇成员不仅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并且中国人占多数，《明史》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其中“从倭者”就是中国人。由于明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大量中

国沿海居民由商、民转为寇、盗，因此在当时，海商和海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二者的角色是经常在相互转换的，正如明朝户部尚书谢杰所言：“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李庆新对本刊表示，亦商亦盗是个老话题，从前辈学者一直到现在都有讨论，大家逐渐产生一些共识，在海禁森严的情况下，很多原本合法的东西变成了非法的，对亦商亦盗的评价也更宽容了一些。特别是嘉靖年间，海盗活动猖獗，很多商船出海都要配备武器，特别像2007年发掘的广东南澳一号沉船，船上发现有火器遗存，那这条船究竟是走私船、海盗船还是一般的商船？从不同角度解读就有不同的阐释。

与明朝政府的评价不同，日本史学界对汪直的评价较为正面，因为他不仅带领葡萄牙人来到日本种子岛，为日本人带来了火枪，并且后来他在长崎平户岛长期发展，将以前在双屿港建立起来的葡萄牙海商关系都带到了长崎，长崎因此也由一个海滨小城发展成为日本的海上贸易重镇，长崎县平户市如今树立着汪直像。大约在汪直定居长崎发展的70年后，19岁的郑芝龙受其舅父委派，押运货物来到日本长崎，开启了他成为17世纪亚洲最强海上集团头目的生涯。也是在长崎的那段时间，郑芝龙与当地女子生下一子，便是郑成功。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就在汪直正式落脚长崎之后，1554年，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总督南直隶、浙、福等处军务，接管东南沿海的抗倭重任。胡宗宪遣使至日本与汪直交涉，承诺与汪直通商互市，汪直答应诏安，继而启程回国。1558年，汪直回国等候接见时，在杭州被捕。胡宗宪鉴于朝廷的压力，也没有再反驳，表示自己遣间谍诱惑汪直回国。最终明世宗给汪直定的罪是“背华勾夷，罪逆深重”。

汪直至死也不肯承认勾结倭寇入侵之罪，早先面对胡宗宪的指责，他反驳道：“总督公之听误矣！直为国家驱盗非为盗者也！”下狱时亦连声追问：“吾何罪？吾何罪？”死前，他还写下了《自明疏》：“窃臣直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历数自己剿贼的功劳后，他仍祈求皇

上开放海禁，并承诺“效犬马微劳驰驱”“愿为朝廷平定海疆”。

1560年，汪直被斩首于杭州省城官巷口。当时汪直的养子毛海峰被俞大猷率领的明军包围在岑港，久攻不下，最后俞大猷的参将戚继光指挥攻灭毛海峰，又一位抗倭名将冉冉升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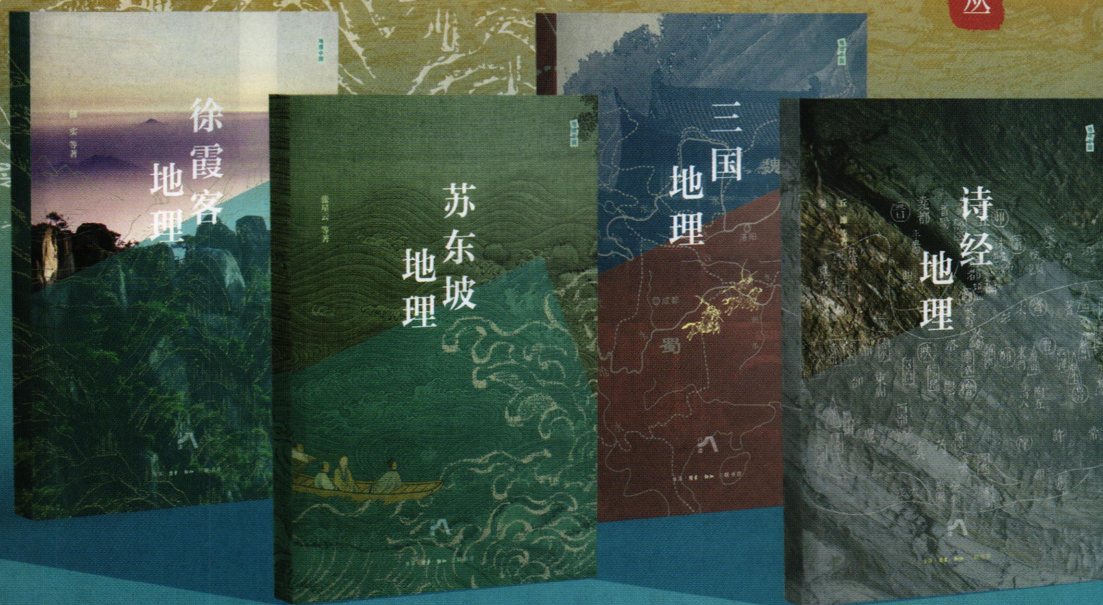
7年后，由于中国沿海倭患和走私日趋严重，明廷不得不开放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尽管大部分时候开关只是适用于福建漳州，但在这段时期里，中国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地位，中国东南沿海各地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促成晚明中国白银货币化，玉米、红薯、烟草、辣椒等美洲作物相继引进中国并得以推广，极大丰富了中国的食品结构。中国外销瓷、丝绸、茶叶等中国产品大批出口海外，并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产生影响。李庆新指出，这些情况进而带来了一系列转变，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的贸易主体也在发生着变化，私商逐渐壮大，而海外贸易，也经历了从非法到默许，再到公开的演变过程，其中涉及利益考量、制度调试和变迁。

现在回想起来，在六横岛的几天里，给我感觉最像双屿港的地方，是岛北端的龙山村。这里本身就是学界对古港的推测地之一，而今则是一处大型修船港口，船坞林立，全世界各地的大型轮船会在这座港口停靠，通常一停就是一两周。当地人告诉我，上岸的外国船员分几种，“大佬外会在这条街上喝洋酒，小老外没那么多钱，就只能打车去镇上吃肯德基”。龙山主街不到百米长，几乎每家餐馆、酒吧的招牌都是用英语写的，“圣托里尼”“雅典卫城”“马尼拉迪菲苏利亚市场”，纵横四海。每天到了晚上，就会看到一桌俄罗斯人围在一起吃东北烧烤，或者一群印度人在吃福建菜。置身在其中，会产生一种遥远的错觉。

（参考资料：《远游记》，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著；《观沧海》，林梅村著；《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李伯重著；《求知集》，龚缨晏著；《山海故人：明清浙江的海疆历史与海岛社会》，谢湜著；《双屿港史料选编》，金国平、贝武权编。感谢姜剑、袁甲、包江雁、刘恒武对本文的帮助）

地理中国

文丛



寻访历史现场

在文本与现实之间进行一场精神穿越与心灵疗愈



招募分销商及分销团长！

<<<< 扫码了解详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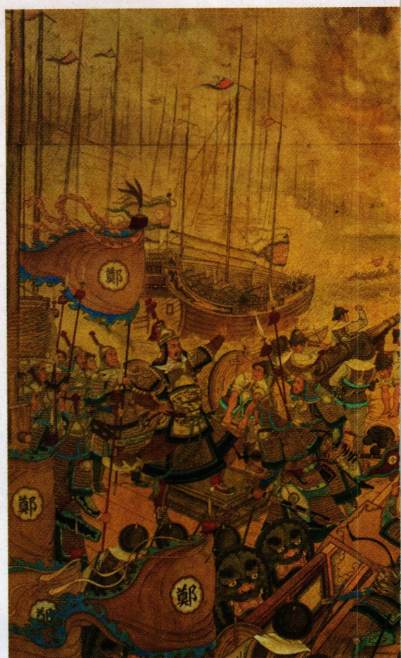
招募



天猫三联生活周刊旗舰店



三联生活周刊书店



大航海时代下，中国东南沿海贸易大事记

整理·张星云

1367年后，明初，元末农民战争中失败的张士诚、方国珍余部逃遁海上，与日本倭寇勾结，史称“倭患”，明开国不久即开始实施“片板不得入海”的海禁政策。明朝海外贸易唯一合法方式是“朝贡贸易”，勘合国分：暹罗、日本、占城、爪哇、满刺加、真腊、苏禄国东王、苏禄国西王、苏禄国峒王、柯支、淳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刺、古麻刺。

1370年，明朝在浙江、福建、广东三地设市舶司，进行朝贡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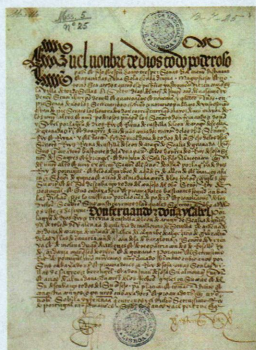
1405年至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与宋元中国海商在印度洋建立的自由市场经济贸易不同，推向极致的朝贡贸易终止了中国民间海外贸易网，郑和下西洋一结束，明朝在印度洋沿岸设立的“官厂”以及朝廷垄断的国际贸易网便顷刻瓦解。宋元时代远销埃及、威尼斯的青瓷由于失去销路，龙泉窑在明代

中期被迫停产，受伊斯兰世界喜爱的景德镇青花瓷亦外销无门，在正统、景泰、天顺三朝进入了漫长的、古陶瓷学家所称的“空白期”。

1449年明廷重申禁海令，但东南沿海走私贸易却屡禁不绝，1458年广东珠江口再次出现大规模走私贸易活动。

1494年，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与西班牙签订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西经 41° 到 45° 分界线以东发现土地属于葡萄牙，以西发现属于西班牙，史称“教皇子午线”，由此印度、马六甲、暹罗、安南、澳门、宁波、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皆属于葡萄牙殖民范围，而除巴西之外整个美洲以及亚洲的文莱、菲律宾等地则属于西班牙殖民范围。

1498年，达·伽马首航印度西海岸古里，返回里斯本后，船上丝绸、瓷器、香料的价值相当于费用的60



(TPG/alamy 供图)

《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



(海峰 摄 / FOTOE 供图)

左图：1494年，葡萄牙与西班牙签订《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

右图：1661年，郑成功率领两万余名士兵、300余艘战舰远征台湾

倍，此航也是东方新航线向里斯本运回第一批明代瓷器。

1510年、1511年，葡萄牙先后占领印度西海岸果阿和满刺加国（今马六甲），一种说法称，从1511年葡萄牙占领中国藩属国满刺加开始，中国与欧洲自此开始直接进行经济文化交流。

1513年，“屯门”“大澳”，今深圳南头，葡萄牙人欧华利首次登陆中国。

1517年，葡萄牙王首次派使团访华，试图与明朝建立贸易关系，1521年，葡萄牙使者皮莱资抵达北京，1521年明武宗病逝，明世宗对葡萄牙态度转变，不许葡萄牙人进贡和再次入境。

1521年，屯门海战，广东水师驱逐屯门地区葡萄牙人，葡萄牙失利，被迫逃离在广东沿海设立的走私贸易港屯门岛，转到广东南澳岛、福建及浙江沿海继续从事走私贸易。

1523年，宁波港因“争贡事件”发生武装冲突，明政府采取更严厉的海禁政策，罢浙江、福建、广东市舶司，全面海禁达17年，至1540年。

1540年至1548年，葡萄牙人在双屿港建立固定居所，居住1200名葡萄牙人，双屿港成为葡萄牙与日本贸易的中转地，也成为全球性的贸易中

心，很多当地中国人也参与到贸易之中。大航海时代开启后，中国海商本可以像达·伽马或哥伦布一样，但明实施严厉的海禁，中国海商躲在中国近海的一些荒岛从事走私贸易，在巨大利益驱使下，东南沿海双屿港这类走私港口逐渐形成。

1548年，双屿港被提督浙闽海防军务朱纨率领军队消灭，双屿港被填。明军随后乘胜追击至福建厦门湾一带。走马溪一役，中外海盗被歼殆尽，存活下的海上集团头目汪直前往日本长崎，继续经营海外贸易。

1550年，剿灭双屿港的朱纨去了福建，想实施严格海禁，结果引起了当地豪族和居民不满，最后在压力下自杀而死。这件事成为十几年后福建漳州月港开放的一个契机。

1553年，双屿港被消灭后，葡萄牙人南下来到澳门，贿赂广东官员换取在澳门通商权，20年后终获明朝政府租借地。

1557年，海上集团头目汪直接受诏安后从日本长崎返回，被立即逮捕，两年后被处决，继而引起更严重的东南沿海倭患。

1565年至1575年，双屿港被摧毁后，部分海上集团、葡萄牙海商南下，主要转到珠江口的游鱼洲、上川岛、浪白滘和澳门。广东汕头南澳岛也有私人海商聚集，直到1575年，南澳岛设总镇府。

1567年，“隆庆开关”，倭患和走私严重，明廷不得不开放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福建漳州月港开港，盛于1573年至1619年，明朝出现全面开放的新局面。

1621年至1627年，泉州安平港（安海港）成为郑氏大本营、国际贸易商品集散地。

1628年，郑芝龙就抚明王朝，1633年以“料罗湾大捷”击败荷兰舰队，以台湾北港为中心，建立郑氏海上帝国。

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在清王朝打击下，郑氏海上帝国覆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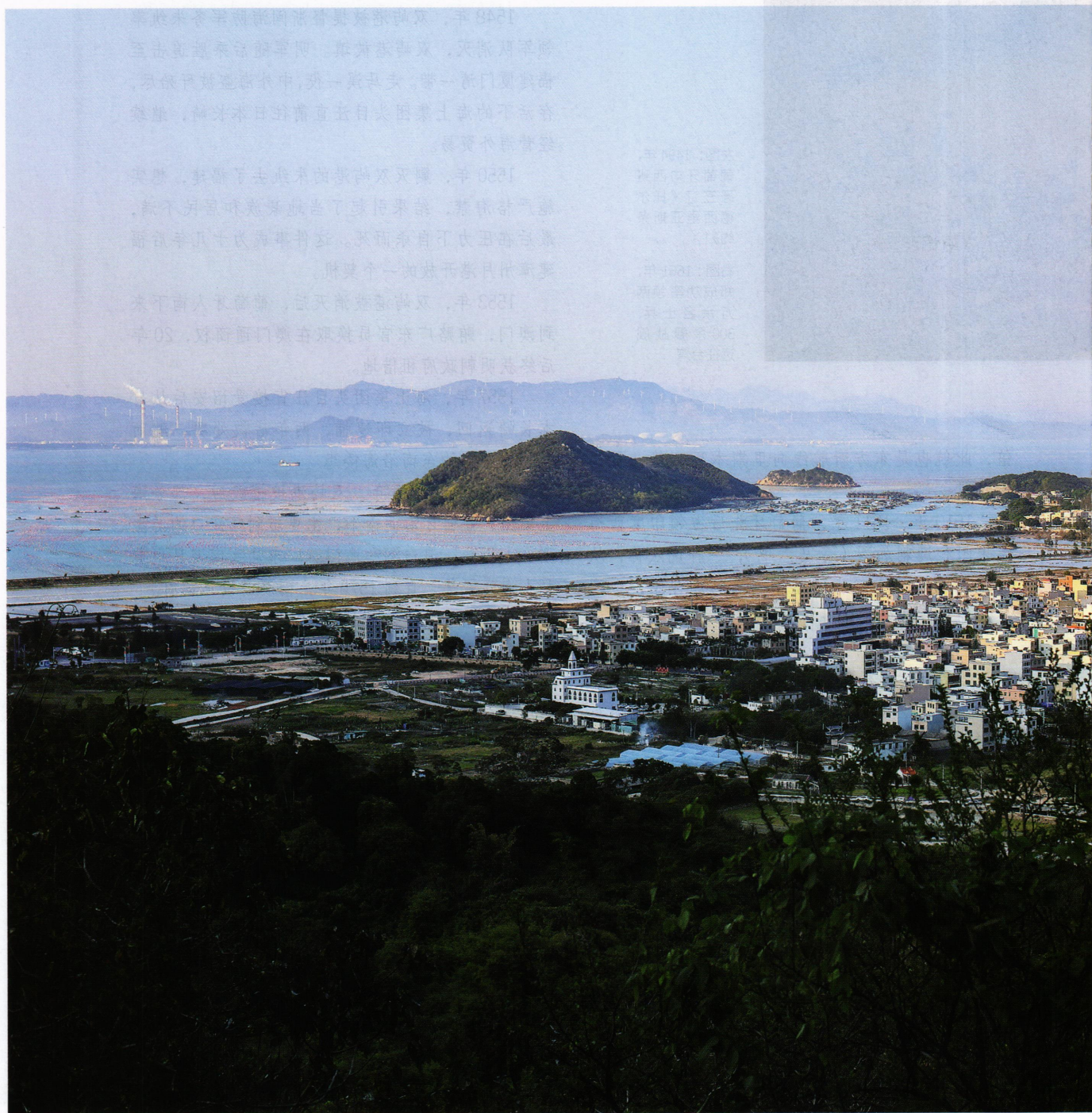
1684年，解除“迁海”，部分放开海禁，设置粤、闽、浙、江四海关。

1726年至1730年，玉环厅在玉环岛上设立，复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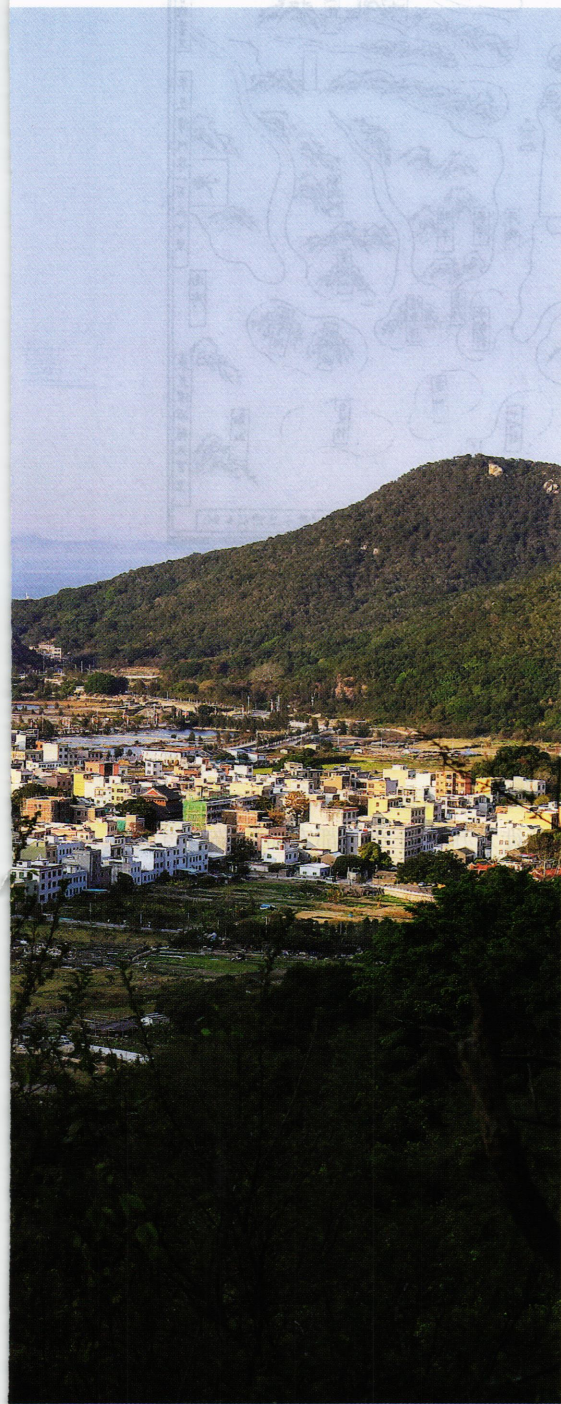
（参考资料：《明代海外贸易制度》，李庆新著；《观沧海》，林梅村著）

南澳：孤岛中转站

记者·卡生 摄影·缓山



1914年之前，深澳镇一直是南澳岛的行政中心，后县城中心搬迁至后宅镇。深澳镇一直是明清重要的货物集散港口。



南澳岛从明朝开始就是一个命途多舛的岛屿。它地处闽、粤之交的海面，远离内陆。在这里，四处流传着海盗往事，无论是走私贸易、海上互市，还是之后成为政府海防重镇，在历史的微光之中都让今人看到一种与时势密不可分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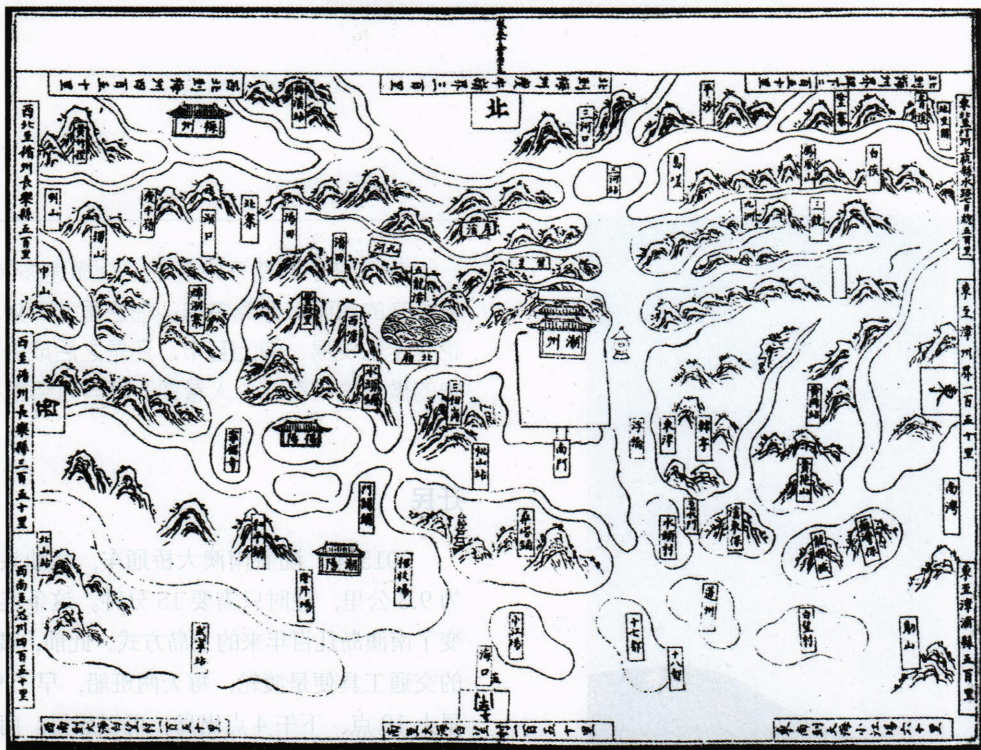
迁民

2015年，随着南澳大桥通车，从汕头到南澳岛的距离缩短为9.3公里，耗时只需要15分钟。这条连接海岛的海上大桥改变了南澳岛几百年来上岛方式。此前，要想从内陆上岛，唯一的交通工具便是渡轮，每天两班船，早上9点、下午3点进岛，早上10点、下午4点出岛。可以想见，南澳在靠帆船进出海岛的时代，是怎样隔绝于世，孤悬于海上。

南澳是广东省唯一的海岛，虽然只有114.757平方公里（由南澳岛及周边35个岛屿组成），但素来便有“漳潮屏障，闽粤咽喉”之称。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在福建、广东、台湾三省的海面交界处。“澳”在南方是指“泊船的地方”，现如今，南澳岛的公路交通非常方便，上岛后右转的公路便是南澳岛最美的一条海岛公路，途经后宅镇、云澳镇、青澳镇、深澳镇，最终再返回到码头，环岛一周有66公里。各镇之间公路互通，或是海边美景，或是险峻的盘山公路，山景与海景交替出现，无怪乎近些年这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尤其是在韩寒执导的电影《四海》播出之后，这里的灯塔、写有“四海”字样的海堤均成为热门的打卡地。

如果把时间往前推至明朝中期，这个如今游客如织的旅游小岛却是另一番景象。明朝初年，整个沿海地区实行海禁政策，“寸板不能入海”的禁令发布之后，明朝廷在南澳岛上进行了两次迁民，将岛上的渔民发回海门千户所充军。对此后少量重回南澳的渔民，大将汤和再次将其强行迁回内地，“墟其地，涉其民”，至此，南澳一度成为荒岛。

我们在这个弹丸小岛上租车绕行，想从地理上实地去感受，这个岛屿为何会成为海商、海盗往来的理想场所。南澳岛历史上最繁华的良港在现今深澳镇的位置。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中有关于深澳镇作为良港的描述，“内宽外险，腊（猎）屿、赤屿环列其外，一门通舟，中容千艘”。除此之外，这里离内陆



《永乐大典》里的潮州府图，这是南澳最早有地名记载的地图

的河道韩江口水路要津非常之近，大型船只外可北航至日本，向东南海域可抵达爪哇等南洋诸国，所以这里从古至今都是一个物资集散地，有“海上互市”的传统。

如今的深澳镇已经不再是南澳岛的行政中心，早在1914年，县城中心搬迁至后宅镇。问及原因，南澳县海防史博物馆馆长黄迎涛说，主要还是与南澳岛的地形以及深澳的衰落有关。南澳岛除了少量的冲积平原之外，多为山地、丘陵，由于岛上人口的增加，可开垦种植的平原主要集中在后宅一带，深澳已经没有多余的外扩空间，即使后来有过几次填海造田，依然无法满足其发展。

那么，如此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为何会在明朝初年经历了两次弃岛呢？弃岛对南澳之后的影响又是什么？

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在《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一书中，罗列了两次弃守南澳的地方志记载。不同地方志的记载实际上是混同了两次迁民的原

因，而《东里志》中的记载则比较详细，“洪武二十四年，以居民顽梗，尽发充海门千户所”“永乐间，倭夷越海劫掠，难于防御，将吴宗理等九十五户，徙入苏湾、下外二都安插”。陈春声认为，第一次“居民顽梗”的情况与广州府处置“疍民”的情况类似，“时疍人附海岛，无定居，或为寇盗，故籍而用之”，是属于征集军户的方法，第二次“难于防御”是出于不得已的为难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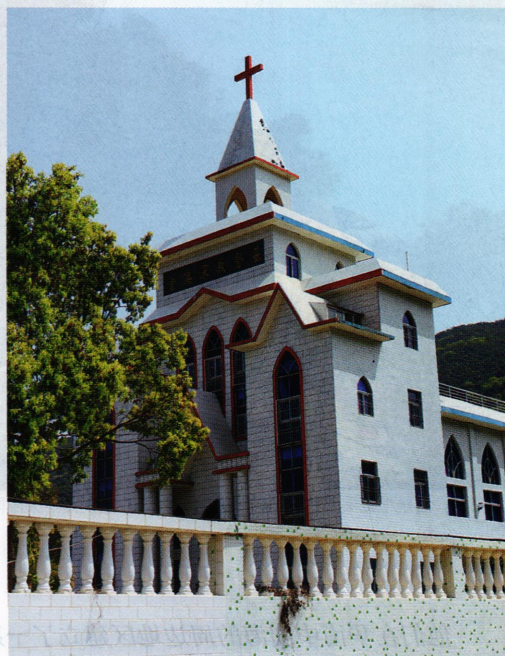
陈春声说，南澳的“迁民政策”也是明朝当时的海防政策之一，和南澳一样受到波及的还有大嶝屿、小嶝屿，情况与之类似。政府对南澳的弃守是本地区诸多海防措施里影响最大的。“弃守南澳的后果很快显现出来，这个靠近大陆又没有官府管辖的海岛，成为15世纪到16世纪100多年间，多重海上势力聚集活动的乐土。日本和东南亚各地的海商纷纷来到此地从事贸易，闽、广海商将南澳作为私市贸易的中心，以及海盗们的根据地。”



南澳岛总镇府的郑成功雕塑。据说郑成功曾在总镇府为收复台湾而招兵



深澳镇天后宫。妈祖是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信仰的海神，船工、海员、旅客、商人和渔民出海以及经商的时候都会供奉



除了闽粤本地宗教外，深澳镇还有天主教和基督教堂。明朝时期，这里是外番商船的必经中转站

“海盗乐土”与总镇府建立

整个东南沿海地区，从明朝海禁之后，海盗在海上的走私贸易和抢劫活动愈演愈烈，在明朝中期嘉靖年间达到顶峰。这段时期历史上有名有姓的海盗几乎都与南澳岛有关，许栋、林道乾、林凤曾经以南澳为据点，更有吴平、许朝光、曾一本占据南澳，并在岛上占地结寨。南澳岛为何成为地方志里所说的“海盗乐土”，他们又给南澳之后的变迁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洪武十七年后，明朝政府以‘备倭’为名在

沿海建立了卫所，但其主要的功能是利用城墙和兵力守御而不是进攻。离南澳不远的韩江上下游二三百里长的海岸线共有四个沿海守御千户所存在，那时，卫所之间相距 100 海里（相当于现在的 40~60 公里），所以卫所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其象征意义。”陈春声说。

明朝初期，南澳岛隶属海阳县，成化十四年（1478）置饶平县，南澳遂属之，只设卫所，但是裁设不定。嘉靖四十一年（1562）移柘林守备驻南澳，四年之后，复设柘林守备，统辖澄海、潮阳二县水兵。从地图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福建



金银岛。这是根据吴平的藏宝传说而设的岛屿。据说吴平大部队在南澳被剿灭，他仓惶逃离间，将十八箱金银珠宝沉海于此

他们在华南中国海的周边地区建立了一系列的贸易据点，因此，整个东南沿海商人的力量，突然因为货币的支持变得空前活跃。

诏安与广东饶平之间，两县“相聚百余里，中隔大海，偶遇风阻，县令是有鞭长莫及”，所以位于潮、漳交界的南澳就成为官府的三不管地带。茅元仪在《武备志》中记载，“广捕之急则奔闽，闽捕之急则奔广”，由于南澳成为朝廷职权互相推诿的边界地带，所以无论从北到南还是从南到北的海盗都选择将南澳作为避难所，“欲知倭寇消息，但今往南澳，饰商人与之交易，即廉得其来与不来，与来之多寡，而一年之内，事前无不知矣”。

南澳岛成为观测海上武装集团行动的“晴雨

表”。黄迎涛告诉我们：“南澳岛是明代的海商冲破当时政府海禁抵抗官军的庇护地，也成为东西洋私人海商贸易的中转站。”

此外，陈春声还从经济社会学视角，对嘉靖年间为何海盗猖獗提出了他的观点：“16世纪中期之后，欧洲人特别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到了亚洲，他们在华南中国海的周边地区建立了一系列的贸易据点，因此，整个东南沿海商人的力量，突然因为货币的支持变得空前活跃。”美国学者安乐博在《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中认为，明嘉靖年间是中国海盗真正“腾飞”之时。自嘉靖二十七年（1548）浙江巡抚朱纨摧毁浙江双屿港后，倭寇与海盗活动逐步向广东一带转移，倭寇沿海岸线南下，与本地海盗合流，壮大了声势。

如今能在南澳岛上寻得的海盗痕迹便是海盗

吴平当时从诏安梅岭逃窜到南澳之后所建立的吴平寨以及流传于海岛上的“金银岛”，前者是一处已经无法看到的遗址，后者则是南澳岛为了发展旅游经济，根据吴平藏宝传说设立的一个观光岛屿。现在的吴平寨村子距当时的残基遗址有600米左右，真正的遗址位于南澳县深澳镇吴平寨村村委会东野。据1952年陈沅《饶平县志补订》卷十九《古迹》记载，“吴平寨，周约三百丈，土垣阔约五尺”，这个寨子是全国唯一一个以海盗命名的村落。我们走遍了整个吴平寨，历史性的遗迹已经难以寻得，但从现在吴平寨村的位置，大概能搞清楚吴平的一些选址思路。寨子背山望海，中间有一块平地可以开垦种田，山中溪流穿过村庄可以很好地灌溉庄稼，可谓一块风水宝地。海中港口可以大量停泊船只，易守难攻，既可保护自身安全，还能作为进攻大陆的跳板，不得不说，吴平是真正实现了往后退能生活，往前走就能打仗。

这不由得让人想象，吴平当年逃窜到此，他建寨后，与当地发生了何种关联？该村落是否还留有吴平后人？黄迎涛说：“在历代志书中以寇或者匪为记载，不但记载多语焉不详，并且许多事件的详述带有为统治者服务的色彩。”

官府记载的剿灭吴平的功绩可在南澳岛上的碑文寻得。建于万历十二年（1584）的寿亭侯祠（即关帝庙），如今还在深澳镇总镇府东南侧，里面的碑文中有详细的记载，值得玩味的一段文字是对当年关公将攻克吴平的方略托梦于戚继光，最终使得戚继光、俞大猷大获全胜的描述，“将军破敌，只在智取，若从后攻，必然可胜”。当年俞大猷在围攻和追击吴平行动中一再受挫，最终戚俞水兵南北夹击，才将震惊朝野的海上大盗赶出南澳，实施围剿。《明世宗实录》记载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一路追到安南（今越南）才最终打败吴平集团。

从明清志书中对海盗的记载可见，明朝海盗并不完全是我们想象中的专业海盗集团。黄迎涛介绍，明朝时活跃的海盗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海商，由于不满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凭借武装力量，以民间的贸易形式从事走私活动，比如许朝光，他坐地贩卖，设卡征税，曾自立“澳长”，

往来商船必须“买水”；第二种是亦盗亦商，“用哨马为游兵，胁居民为向导”，有着明确的反海禁的意图；第三种是与倭寇合流，只盗不商。

为什么说研究南澳的历史，即是研究海盗的历史？海盗们的存在给南澳带来了什么？黄迎涛说：“吴平之乱，使得明朝政府对南澳岛有了新的认识，他们意识到弃置南澳将影响东南沿海的贸易、军事诸事的平衡。总镇府的建立实际上改变了整个明清的海防格局思路。”其实，早在嘉靖年间，就不断有官员讨论弃守南澳岛的不利影响，一度有官员建议应该在岛上设兵防守。吴平之乱成为明清两朝治理沿海海防的重要案例，每当有奏疏论东南沿海海防或岛屿的弃置，都会提到南澳，其中最为知名的便是万历十年（1582）潮州知府郭子章专门写的《南澳程乡议》，他提出澳设副总兵“为利者四”，分别为“屯田之利”“寇失其巢”“重兵守之，外贼欲泊以窃淡水，而不敢登岸，内贼欲出为之接济，则惮兵而不敢放舟”“闽粤一家，手足相掣”。



南澳县海防史博物馆馆长黄迎涛从二十多岁进入博物馆，干了快四十年。他回忆说，年轻时，他拎着录音机到岛上村庄里收集关于南澳岛的民间故事与传说



云澳镇澳前村的位置打捞过南宋沉船，证明了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和停靠补给点

潮汕海盗的探索和开拓扩大了世界贸易的商业空间，进一步促进了潮汕“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

近年来，有学者也在对海盗影响下的海防研究中指出，严重的海盗活动推动了地区海防的建设以及世界贸易发展。比如著有《明代潮州海防考述》的唐开建认为，嘉靖时期潮州严重的海盗活动促进了潮州地区的海防改造和重建；写过《潮汕海盗文化的“海丝”遗产价值研究》的郑松辉认为，潮汕海盗的探索和开拓扩大了世界贸易的商业空间，进一步促进了潮汕“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等等。

在剿灭吴平之后的第十年，即万历三年（1575），福建巡抚刘尧海同两广总督殷正茂疏请设南澳总兵，在当年九月就得到了批复，诏设“协防漳潮等处地方南澳镇”，置“协守漳潮等处地方专驻南澳副总兵”，“统领潮、漳二府沿海卫所，并驻统辖节制”。南澳副总兵“受两省（漳州、潮州）总兵节制，又制两省之兵”。从这一年开始，广东沿海的澄海、饶平、柘林、达濠、海门、靖海以至碣石水师以及福建的东山、悬钟都听任南澳副总兵调遣。南澳镇设立左营、右营，左营为福营，右营为广营，南澳岛上隆澳、深澳属广东潮州府饶平县管辖，云澳、青澳属福建漳州府诏安县管辖，两省共管成为南澳建制历史中的一大特色，南澳岛也成为了中国唯一一个设有总镇府的海岛。自此，南澳岛从一个贸易中转站变成了一个专门扼守东南门户的海防重镇。

比较可惜的是，修建于1576年的总镇府在1918年的7.25级的大地震中被摧毁，现如今能看到的只是总镇府在上世纪90年代由专家仿古建筑风格重建的，原本该建筑由主座、两厢、前座、门埕、两廊、帅旗座、钟鼓楼、东辕门、西辕门等组成，规模很大，现如今只能瞥见其主座，唯独府前两棵盘根错节的大榕树即使经历岁月，依然生机勃勃地耸立院中，它被人们称为“招兵树”，相传因明朝末年郑成功曾在树下演讲，招兵收复台湾而得名。

“海上”中转站

黄迎涛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到，南澳的海上贸易与我国内陆港口传统的贸易相比，有着显著的不同，由于南澳孤悬海上，它不是由市舶司管理的贸易港口，而是均为民间海上贸易，所以从一开始，这个地方的贸易方式便是以“走私”的形式出现的。

茅元仪在《武备志》中记载过当年走私贸易的一些情况，“定期于四月终至，五月终去，不论货之尽与不尽也。其交易乃搭棚于地，铺板而陈，所置之货，甚为清雅，刀枪之类，悉在舟中”。

所以可以想见，早期南澳的交易场所十分简陋，并且时间非常短，大概只有一个月左右。到了嘉靖末年，由于海盗从各地到此，其贸易规模有所发展，“倭自福建之浯屿，移泊南澳，建屋而居”，之后，海上武装集团在岛上建立了固定的场所以及商店，某种程度上，促使南澳的海上贸易发展更迅速。

南澳岛海运贸易历史十分悠久，据《马来西亚之发展史》说，唐时已有“巨舶海上，运载土货至广州及闽、浙，或远达南洋、日本，转贩外货输入”。在近些年的考古发掘中，在南澳海出水了大量的瓷器残片。史料方面，关于南澳商贸往来的记录几乎是空白，但在2013年第19号强台风“天兔”席卷南澳之后，在宋井景区附近发掘出大量宋代的瓷片、筒瓦、方形地板砖等建筑构件，可以想见，南澳在宋朝时贸易的繁荣。

我去了云澳澳前村，这里靠近外海的深水航道在距离建筑东南面约4公里处的“三点金”，根据2007年的“南澳I号”与2015年“南澳II号”的沉船遗址，可以确定这个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停泊点与补给站。

站在深澳镇的盘山公路上，可以从山坡上远眺到深澳，可以想象，原来成百上千的商船停靠深澳港口是何等的壮观。南澳主岛高山耸立，成为来往船只的避风港。它“地险而沃，百谷所生，百货所聚”，有“耕三渔七”的说法。与此同时，作为中转补给站，淡水来源非常重要，据说海盗许朝光当年在南澳修寨自守，就是看中了这里的淡水来源。一种方法是挖井取水，我们可以在太子楼井、国姓井等遗存得知，挖井习俗在岛上古已有之。第二种可以满足大规模需求的取水方式是修建蓄水池，在后宅镇的许公城遗址中[据考证为嘉靖三十一年(1552)潮州同知罗拱辰所筑龙眼沙城]，还有上水关与下水关的遗址残留。所以，食物丰盛、淡水自由，这让南澳完全可以脱离内陆海港补给船只。现在，这个要冲之地已经成为渔民养殖海产品的优良港口，这里是华南海域重要的渔场，据当地统计资料，该海域出产鱼、虾、贝、藻种类多达1300多种。

在齐翀的《南澳志》中有关于南澳岛在海上贸易中转站功能的一些记载，“海船最畏海蛆，必需燂洗方无穿漏之患”。又如，“虽商船之开行者，亦必泊岛火洗，不能过两月也”。可见，除了补给船只所需，这里还能提供一条龙的洗船、修船等服务。

由于远离陆地，尽管明朝实行海禁，但在总镇府建立之前，官府鞭长莫及，所以南澳的民间贸易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南澳属海洋性气候，又受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所以常年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21.5℃，陈春声说，在帆船航海时代，船只几乎是沿着海岸线一站站地做贸易，所以对季风的依赖很强，如果在南澳停靠等季风，一年里便可以做两次生意，三、四月帆船等候东南风，可以从南澳入闽到浙，最远可以抵达日本，八、九月乘着西北风，从反方向一路南下，可以从南澳入粤到东南亚。“每年东南风起，从东南亚来的船只抵达南澳之后，可以在此卸货，运往潮汕腹地卖掉，并在内陆港口采购货物，再继续向北而行，到日本朝鲜之后再以相同方法炮制，卖货买货，再行船南下，这样，就大大地提高了出船的贸易量。”

《粤海关志》里也记录了海上武装集团在南澳岛上参与的贸易，“装土产，径往东西洋而去，与海岛诸夷相贸易”，当时的盛况可谓“四方客货”，“私番船只，寒往暑来”。

在整个走访过程中，我有一个比较大的感触，这个孤悬于海上的南澳岛，四处都流传着海盗往事，无论是走私贸易、海上互市，还是之后成为政府海防重镇，在历史的微光之中都透露着一种与时势密不可分的关系。南澳岛虽小，从明朝初年到之后的清政府时期，它的繁荣与失落，起伏数次，或是沦为不毛之地，或是成为往来贸易的重要中转。唯有跳出当下，回到过去的时间与地理之中，才能理解时空与历史交织的复杂真相。

(本文参考书目：齐翀《南澳志》，茅元仪《武备志》，陈天资《东里志》；陈春声《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黄迎涛《南澳港与海上丝绸之路》)

月港：“漳州时代”开启

记者·陈璐 摄影·黄宇

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当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时，处于明朝的中国并未完全在这个浩浩荡荡的“大航海时代”里缺席。在西方世界的记载里，福建漳州（Chincheo）是与浙江宁波（Liampo，实指双屿）齐名的国际私人海洋贸易中心。

朱纨与浯屿、走马溪之战

如今的浯屿声名不显。要登上浯屿，得先抵达漳州市龙海区的斗美村。在这个沿海小渔村的码头边，热心肠的海鲜店老板招呼我们坐下喝杯刚沏好的铁观音，并看了看手表告诉我们，去浯屿的船每隔一小时整点出发，15分钟便可以上岛，再等会儿船就来了。

从斗美码头朝左前方望去，远方岛屿上的房屋鳞次栉比，沿着海岸线勾勒出了浯屿岛的大致轮廓。根据老板的介绍，浯屿岛是个大渔村，如今还有着六七千常住人口，大部分仍以渔业为生，但当地水电都很贵，因为淡水需要从陆地上运过去。“天气好的时候，从这里能看到金门。”老板补充道。大约我的表情显得不够信服，他身体力行地冲出门，极目远眺了一会儿，便招呼我仔细看浯屿岛背后隐约出现、仿若海市蜃楼般的小岛，“那就是金门”。

虽然在地理环境上，与金门岛一衣带水的浯屿岛总是令人联想起海峡两岸的历史与关联。但放在另一个历史空间里，这里与我们所要讲述的大航海时代下的中国东南沿海更为相关。在这里，并不为人注意却重要的，是一场明朝与葡萄牙人之间的战役。实际上，相较地图所显示的“浯屿”，当地人甚至更习惯以“夷屿”相称，因为历史上这里曾被葡萄牙人据为巢穴。

在“片板不许入海”、实施严格海禁政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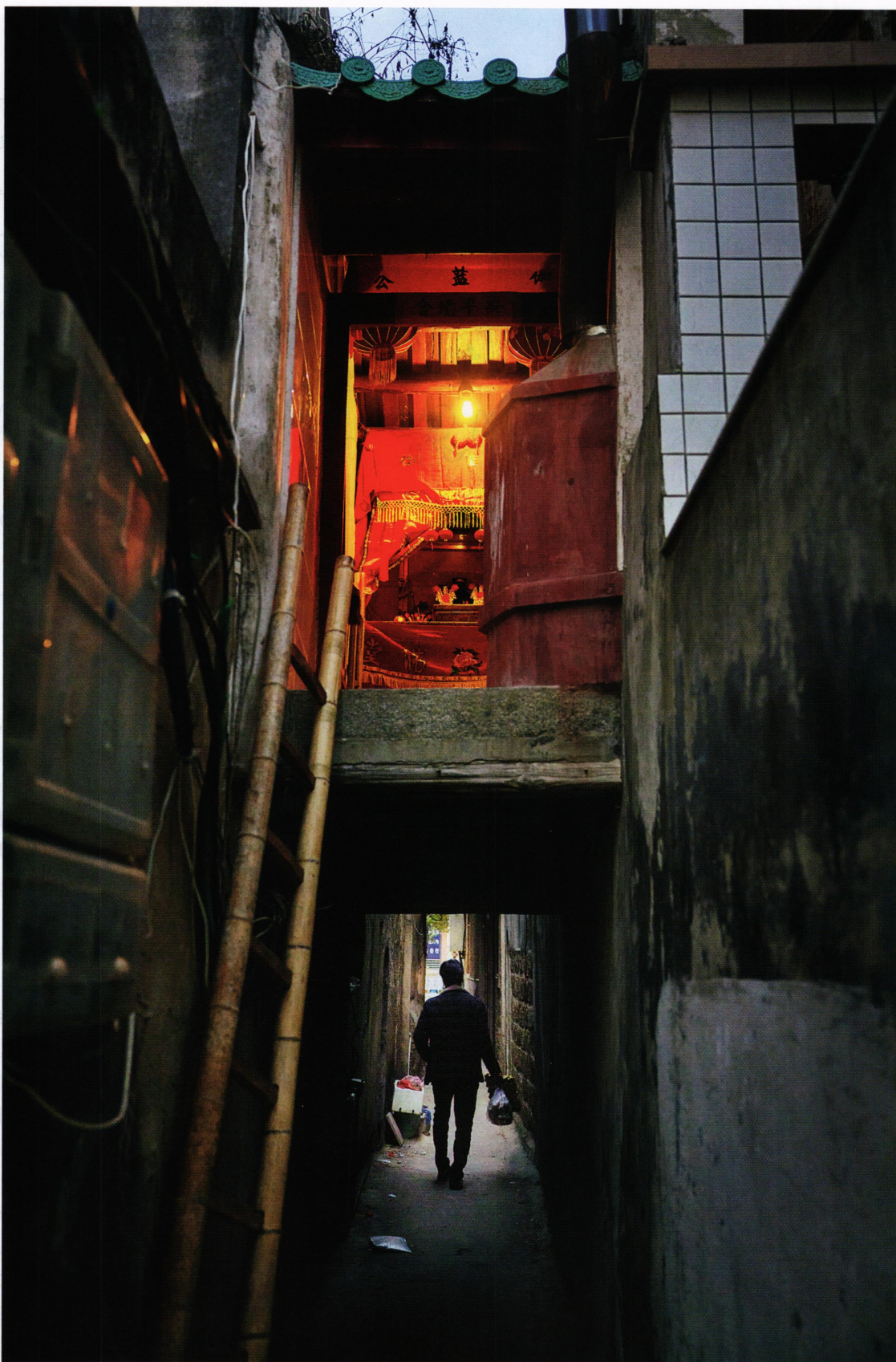
明朝，因利益驱使发展的私人航海贸易兴起并日益壮大，而在当地居民多以航海贸易为生的闽浙沿海地区，这种民间与官方的冲突表现尤为激烈。与此同时，新的海洋秩序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被重新构建，这种影响也波及了明王朝。认为与中国的贸易有利可图的葡萄牙人，在谋求合法贸易失败后，开始在东南沿海地区从事走私活动。

嘉靖二十七年（1548）九月，时任闽浙提督的朱纨在他针对双屿港的走私贸易取得军事胜利后，催令福建备倭都指挥使卢镗率明军主力回军福建。此时，被逐出宁波的葡萄牙人，“因风暴不能返回满刺加，于是来到福建沿海，与当地的葡萄牙人和中外私商会合，占据浯屿为新巢”。因此，被后世称为浯屿、走马溪之战的两场战役都是双屿之战的延续，是朱纨乘胜追击，与葡萄牙人在福建沿海一系列冲突的结果。

早在宋元时期，浯屿便是南中国重要的海港，明初为对抗倭寇对闽南沿海的侵扰，朝廷曾在福建设有五座用作水师兵船基地的防御设施“水寨”，浯屿正是其一。但后来因为浯屿地处偏远，逐渐废置不用，倭寇、海贼乘虚而入，常泊船于此，然后取道进入泉州、漳州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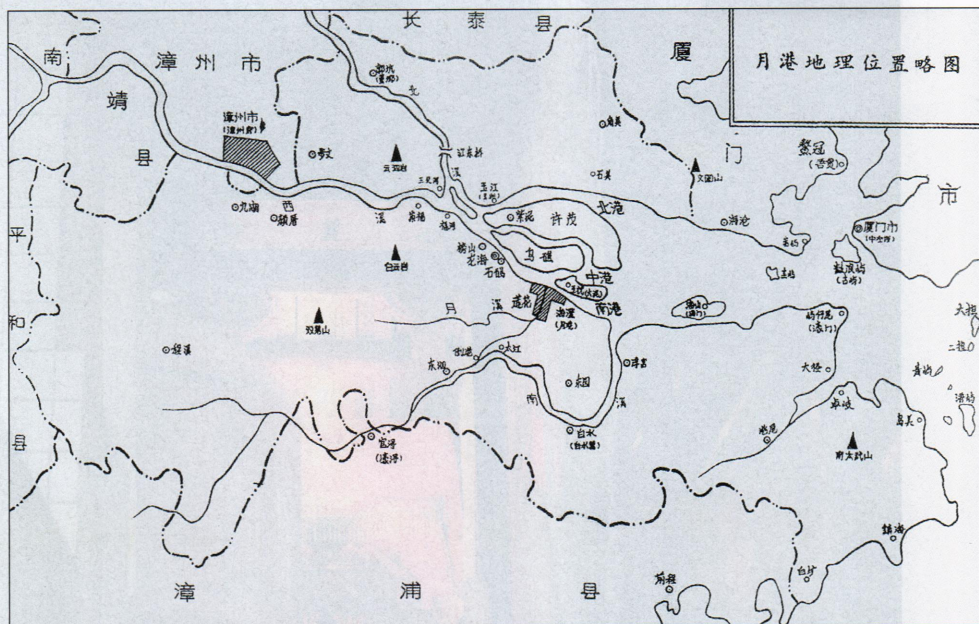
关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如今岛上村里还有一块立于清道光年间的石碑《浯屿新筑营房墩台记》，上面清晰阐述着，“浯屿之北有小担，又北有大担，并峙于港口海中，实为厦岛门户……浯屿外临大海，左望金门，右望东碇，隐隐在云雾，而江、浙、台、粤之船，皆可绕屿而入厦港，其守岂不重哉”。但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所辐射的世界贸易网络。

16世纪葡萄牙制图家族的主要成员罗浦·侯门（Lopo Homen）所绘制的古航海图显示，当时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了数个贸易据点，其中位于金门东南海岸的料罗湾被标识着“料罗交易在此进行”。临近料罗湾，通往中国内陆的浯屿港湾平稳，是天然避风港地，并且四周水深，



国各业南凉
 屏计挺要需虫
 内翔平大舜常
 的也里冬山出
 霞伏薪伙因世
 能博印个院星
 安慈乱个陌口
 育出叶册，最
 御策和找，成
 委个院数利来
 善改取”：首
 ，书其同甜。果
 请伙回替不展
 下就请书来主
 明伙致空基。
 其办个偏夷”
 未度粉前好果
 站办强
 雲翻，日六十
 潮因知，新出

漳州地区民间信仰浓厚，常能见到许多这样的小庙。在月港，每个码头也都正对着一座庙，海商们拜完庙再出海做生意



海澄旧县志图所指示的月港地理位置

上下不受潮汐限制。每年到了3、4月东南风汛时，葡萄牙商船便载着货物，自遥远的海外来到这里，将巨大的帆船停泊于此，然后驾驶着小船，前往位于九龙江入江口处的漳州月港，或引诱“漳泉之贾人往贸易焉”。

葡萄牙早期冒险家平托在其回忆录《远游记》中曾记述：“葡萄牙人欲重新在一个名叫漳州的港口建立一村，做买卖。那个地方亦在中国，位于双屿下方一百里格处。当地的商人因为可以得到许多好处，他们用重金贿赂买通了当地官员，让他们对此采取默许的态度。在大约两年半的时间内，我们在此和当地人平安无事地做着买卖。”事实上，当时的浯屿指挥丁桐和前任海道副使姚翔凤都受到了贿赂，并默认漳泉商人与浯屿的葡萄牙人相互贸易往来。

对于闽南人而言，出海贸易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必然选择。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刘婷玉告诉本刊，宋朝以后，从事中国东南亚贸易的商人里有不少就是闽南人，然而明朝时，由官方垄断的海外贸易政策是“朝贡贸易”，并且未在福建设立针对东南亚朝贡贸易的港口，仅在

福州有一个对琉球的官方贸易港口，东南亚各国的朝贡贸易需要去广州，“但闽南这边需要进行私人贸易的需求非常强烈”。相对于有着较大平原的珠江三角洲，整个闽南地区都呈现出山多地少的现实状况，因此从宋元开始，闽南地区对海外贸易的依赖度就较其他地区更高。可是到了明朝施行海禁政策后，“闽南地区土地与人口的矛盾越发明显，所以他们必须得出海进行贸易，他们也有渠道去这样做”。

作为朝廷海禁派代表人物的朱纨，此时亲临福建督战，准备对浯屿发起总攻。这实际遭到了多数地方官员的反对，部分士大夫规劝道：“须为善后之计，不然复命之后，难免身后之罪。臣问其计，不过曰开市舶耳。”这些福建地方官员不赞同对葡萄牙人大规模用兵，发起军事行动，主张让葡萄牙人贸易合法化以缓解日益紧张的局势。甚至连对他一向忠心耿耿的巡海道副使柯乔也以“夷船之攻其难有三”来劝说朱纨。不过，这些意见没能得到朱纨的支持，他坚持己见，要对浯屿发起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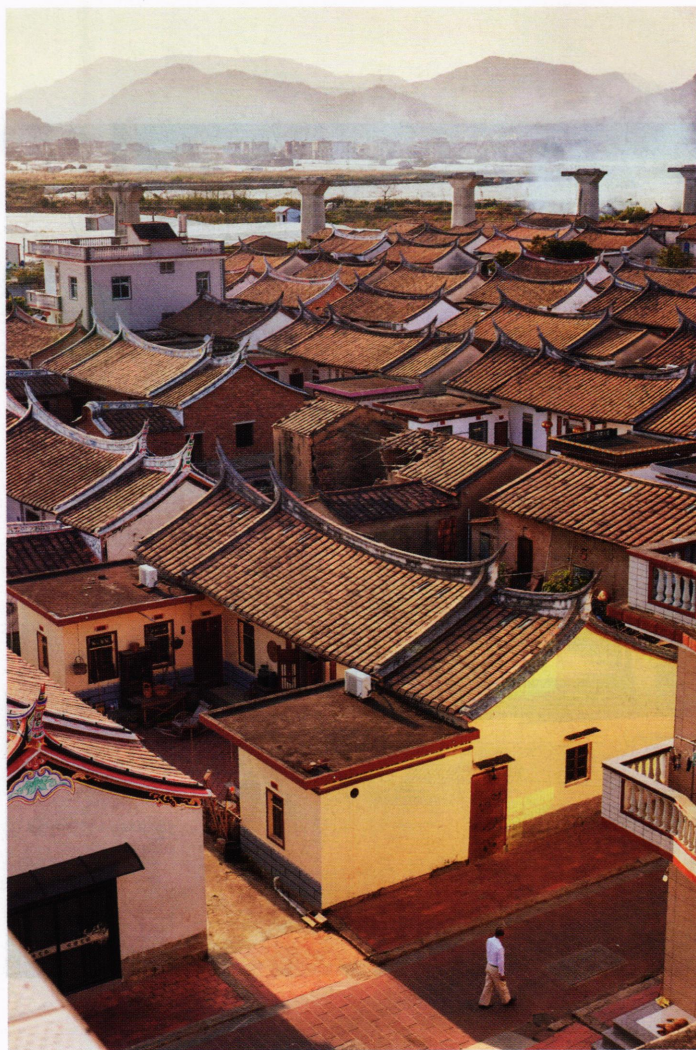
嘉靖二十七年（1548）十月二十六日，福建备倭都指挥使卢镗得令后，率领兵船出海，试图断



上图：漳州龙海区的月港正处在
新旧城市交替之中



下图：镇海卫
城墙遗址



左图：漳州埭美古村始建于明景泰年间，现存有明末清初古码头遗址一处。通过这个码头，村民们把大米、草席等农副产品运输到外地贸易，是漳州海上贸易的历史见证

右图：漳州市龙海区是明代海澄县所在地，因为月港的繁华贸易，在成化、弘治之际有“小苏杭”之称

绝浯屿与外界联系，不断截击前往接济的船只。由于对浯屿展开正面攻击非常难，对于明军来到浯屿的行动，葡萄牙人坚持不出海应战，令明军的攻击难以奏效。因此卢镗只能加强对浯屿的封锁，用来困住他们。到了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正月，被困浯屿长达三个月之久的葡萄牙人与其同伙，因为缺少粮食等物资供应，不得不放弃了浯屿。他们中的一些人乘着东北季风回到了满刺加国，但另一些人因为尚未收回商款，不愿离开闽海地区。

这些不愿离去的葡萄牙人，在二月十一日驾船返回漳州，并在诏安县走马溪附近的灵宫澳下湾抛泊。这很快被卢镗、柯乔发现。二月二十日，双方发生武装冲突，葡萄牙人几乎全军覆没。这场闻名中外的“走马溪之战”，在平托的回忆里也

有记载，“我们被迫转往走马溪（Chabaquea）港。抛锚时我们发现那里有 12 只船，他们进攻我们，我们 5 只船中有 3 只被夺走，有 400 名基督徒被打死，其中 82 人是葡萄牙人。至于其他两只船，有 1 只是我所搭乘的，仿佛是由于奇迹而脱逃了”。此后葡萄牙人不得已离开福建沿海，再次回到广东沿海，此后才有葡萄牙人占据澳门，最终建立新的东亚贸易体系的发生。

尽管朱纨看似取得了极大的胜利，但他严厉的海禁举措却侵犯了闽浙沿海乡官大贾以及沿海地区居民的利益，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也正因如此，他遭到了朝中众多官僚，尤其是闽浙籍官员的弹劾。因为朱纨先斩后奏，杀了被俘的葡萄牙人以及以海商头目李光头为首的 96 名中国

人，御史陈九德等人发起弹劾，指其擅自滥杀无辜和谎报战功。陈九德上奏表示：被杀“九十六人者未必尽皆夷寇也，同中国姓名者，非沿海居民乎？又恐未必尽皆谋叛者也”。

最终，朱纨与卢鏜、柯乔等人一同被治罪，朱纨在狱中服毒自尽。这段历史在《明史》中被记载下来，当朱纨得知自己获罪的消息后，他眼泪横流地感慨：“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

在刘婷玉看来，朱纨被治罪，“在同情朱纨的士大夫看来，就是那些支持开海贸易的沿海官员、世家所极力造成的。为什么后来会有‘隆庆开海’？其实就是因为地方上长期呼吁开海贸易的声音，与明代‘祖宗之法’片板不得下海的政策博弈的一个结果”。

经此事后，将朱纨结局引以为戒的朝政人士“摇手不敢言海禁事”，而且朝廷罢免了浙江巡视而不设，沿海一带的海禁逐渐松弛，走私贸易活动更盛，这不仅标志着明朝海禁政策走向破产，并为日后月港的开禁创造了有利条件。

月港开禁与东南亚大商业网络

在生计压迫与厚利诱惑下，漳州月港的走私贸易在明初就非常盛行。至成弘年间，月港已呈现出“风回帆转，宝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鹜争驰”的繁荣景象，并享有“小苏杭”之称，是当时最著名的走私港之一。葡萄牙人的离去，并没有给漳州、泉州一带带来宁静，当地试图越过海禁政策的海商反而以此为据点，开始骚扰九龙江沿线的一些繁华市镇，兼为海寇。张维、谢策、洪迪珍都是其中赫赫有名者。这些海商大多来自漳泉地区，并以漳州地区的沿海港口进行对外贸易，实际晚明的海洋活动，又常被称作“漳州时代”。

“宋朝时期福建沿海最大港口是泉州后渚港，但后渚港在宋元时期淤塞，港口便南移至漳州和泉州交界这一带，也就是现在厦门所处的这个区域，这个区域里有很多从事走私活动的私人海外贸易者，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工作。”刘婷玉进一步解释了闽南地区悠久的商业传统，自郑和下西

叛乱波及的范围非常大，在沿海地区民众中有广泛响应与参与，历时四年才终于被镇压下去。令向来重陆轻海的明朝注意到了这个边陲地带海洋社会的特殊性。

洋开始逐渐形成，“当时他带去的很多水手和随行人员都是从福建地区卫所的官兵以及当地的阿拉伯后裔水手里抽调的。宋元时期，泉州曾聚居了不少阿拉伯商人，所以整个闽南沿海都有很多阿拉伯人居住。这些阿拉伯人在郑和下西洋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并且对闽南地区海洋商业传统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以刘婷玉在采访中所做的讲述线索，宋代开始，许多闽南商人便来到了东南亚，然后前往中亚、东南亚从事贸易，这些闽南商人掌握了多种语言，成为两地商贸的代表人物，并为当时海上开辟新航道做出了贡献，“这批闽南商人在特定的一段历史时期，实际控制了从月港辐射至东南亚区域的一个大商业网络”。

嘉靖三十年（1551）至四十年（1561），中国东南一带频频遭受海寇侵袭。到了嘉靖四十年，月港爆发了著名的“二十四将”叛乱，构成了嘉靖海盗叛乱最后阶段的重要环节。实际上，这些被称为“二十四将”的，是24位海商，都来自月港及附近周边地区，他们同属于一个合资贸易商业团体。张维与洪迪珍是其中的中心人物。

为了避免向乡绅借船，独自获得更高的商业利润，他们集资建造了一两艘大船，出海与沿海岛屿外的外国商人展开贸易活动，这很快引起了明政府的注意，遭到了官兵围剿，在周旋的过程中，张维、洪迪珍等人杀了三个官兵，意味着彻底公开对抗明朝官府。他们开始从海洋转移到陆地上，以土堡为据点，将沿海动荡引向了内陆地区。实际这场叛乱波及的范围非常大，在沿海地区民众中有广泛响应与参与，历时四年才终于被镇压下去。这不但使普通百姓陷入危机之中，更令向来重陆轻海的明朝注意到了这个边陲地带海洋社会的特殊性。

虽然叛乱得以平定，但民众反对海禁的呼声却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消除沿海地区动荡的根源，明朝不得不做出妥协，在第二年



漳州镇海卫，是明代四大卫之一，其南城部分如今保存比较完整

开放海禁。隆庆元年（1567），在巡抚徐泽民的建议下，月港正式开放为民间海外贸易的港口，允许民间商人往来东西二洋，但仍然严禁商人出航日本。月港因此成为中国沿海地区唯一被官方承认的私人贸易港口。

隆庆开海是明代自由贸易与“朝贡”博弈的结果，也是明初以来 200 年海禁政策的重大转折。对于这种转变，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王日根教授告诉本刊：“明朝的海洋政策一直在变化，但主旨是限制。包括月港开禁，也是一种被动的行为，因为很多地方官员觉得去限制其实达不到的目的，还不如把它合法化多少收些税银。海洋活动由于利润高，官方希望能够主导它，但民间有时会想逃脱官方的管制，而事实是官方并没有那么强的力量来控制。实际我认为，福建在王朝的控制中相对被忽略，因为它不是经济和文化的重

心，属于边缘地区。但即便它没有太多经济创造，但可能会捣蛋，实际后来也是因为捣蛋，政府才把眼光聚焦到这里，防备这里生事。”

“明代的海洋，实际官方想要逐渐来控制它，就需要限制民间的海洋活动，但这在福建很难实现，因为福建的特殊性在于它的海岸线非常曲折，可以走的港口其实很多。对于老百姓而言，他也不要求一定是多大的港口，都可以用小船驳到大船上。而我们官方的海防设置经常是点状的，点与点之间留下许多空档，再加上地方官员很容易被腐蚀，政策往往难以兑现。就好比月港，贸易量很大但税收实际并没有很高，因为民间商人跟捉迷藏一样，看到政策收缩就去往别的港口。以前我们通常认为明朝对海洋很熟悉，但其实官方并没有那么熟悉，这种对海洋的熟悉掌握在民间的势力手上。但到了清朝，这方面的治理变得有

效很多，因为他们知道该在哪里发力。比如康熙年间进南洋，有个必经之道在南澳岛附近，所以政府会加强对那里的防卫。所以我想说的是，尽管月港的确是官方承认的唯一私人贸易港口，但并不代表着官方对当时私人海洋贸易的整体形势有多全面的控制。”

明后期月港崛起与郑氏集团

月港打开了漳州通往世界的大门，但如今隶属于漳州市龙海区的月港，早已看不到当时帆船林立的繁华景象，这座小镇静静地等待着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人亲自来感受。曾经供进出商船申报纳饷的饷馆码头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公园，但两米余宽、通往海洋深处的石阶仍可供人凭依想象曾经人来船往的忙碌景象。对于当时海防投入巨大的明朝来说，对私人贸易征税是一个增收的举措，根据文献记载，“征税之规有水饷、陆饷，有加增饷”，规定“就船完饷而后听其转运焉”。

从饷馆码头沿着海滨往溪尾，是月港现在残存的七个古码头。古码头背后是月港曾经繁华的城镇。因为日益增长的商品贸易，促进了月港独特城市面貌的形成，现在的帆巷古街和临江古街还可以依稀窥见其明代建筑风貌。与月港码头平行的临江古街长近千米，这里的房子都是木质狭长结构，背靠码头，可以供人很快担起货物进出，而面对街市的那面则是各色店铺。

漳州市龙海区博物馆馆长郑云介绍，曾经这里店铺林立、首尾相连，有豆饼行、米行、糖冬瓜行、冰糖行、药材行、铸鼎行等，其中又以米店最多。不同码头的功能又不同，比如中股码头主要用来搬运豆饼，路头尾码头是外船在内港的停泊处，阿哥伯码头是船舶接受驻军检验的停泊点。

但王日根教授认为，当时明朝在福建将月港设为合法私人贸易港，实际有点避重就轻的感觉，“当时也有别的选择，比如诏安梅岭港也在朝廷的考虑范围内，但那里海寇势力非常强，官方没有太大把握，而且诏安、漳浦这些地方的海岸线都很长，月港则是一个内海港口，并非深水良港，没有直接出海口，更加便于管理”。

日益增长的商品贸易，促进了月港独特城市面貌的形成，现在的帆巷古街和临江古街还可以依稀窥见其明代建筑风貌。

历史的机缘，令这座不太有先天优势的次等港口在明后期崛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之一。明代地理学家张燮如此描绘了当时月港的商船景象，“多以百计，少亦不下六七十只，列艘云集，且高且深”。据估计，到17世纪初，月港每年来往的商船数至少有300多艘次。这些商船抵达了东南亚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与印度、日本和欧亚商人都进行了广泛交易。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长约翰·萨雷斯（John Saris）曾谈道：“开往马尼拉的帆船成群地从漳州出航，有时是4艘、5艘、10艘或更多在一起。”

根据《东西洋考》所录，当时从月港输出的物品主要有丝绸、布匹、瓷器、茶叶、砂糖、纸张、果品、铁器等，输入的品类则达到了114种，远超历代名港。漳州本地的漳绣、漳州瓷都成为畅销海外的品类，如今欧洲各大博物馆都可以看到漳州瓷的身影。而漳州地区博物馆收藏的大量各色番银也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初开禁时，月港的舶税仅3000多两，万历二十二年（1594）时这个数字翻了10倍。等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时，月港舶税已经占了福建省全省税银大半。

距离浯屿不远的是明代四大卫之一镇海卫，处在东海与南海交汇之处，也是历来海防重镇。正德《大明漳州府志》上记载：“东路至镇海，驿行四日，并行三日，若水行一潮可至月港，月港登岸一日至镇海，其路不甚艰阻。”当欧洲拉开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时，固守陆地的明中国海域边陲地带，也发生了无数海寇商人的故事，他们与明朝反复缠斗，最后也和明朝所建立的卫所一样逐渐为人遗忘。

明晚期漳州地区蓬勃发展的私人海洋贸易，令郑氏集团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此时还是活跃在东南亚海域的大海盗。尽管他的老家在泉州，但真正行动上的大本营此时却也位于漳州地区。虽然明

包括郑芝龙在内的中国海寇商人，与日本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以及明朝海上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争斗，一时之间战火四起，上演着海洋世界的群雄逐鹿。

朝政府将日本列为禁通之国，但海洋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润驱使着闽南商人前往日本，其中便包括了郑芝龙。明万历32年（1604年）出生于泉州南安镇的郑芝龙，因为在五个兄弟里排行老大，也常被称作“郑一”。18岁那年，当他的父亲去世后，郑芝龙到澳门投奔从事海外贸易的舅父黄程，并学会了一些葡萄牙语。翌年，由于帮舅父贩卖货物，郑芝龙来到日本平户，结识了旅居日本的中国商人李旦和颜思齐。李旦来自泉州，颜思齐来自漳州，郑芝龙和他们合作，三人都成为17世纪东南海上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海寇商人，拥有大量商船，积累了巨大的财富。郑芝龙深得李旦信任，甚至被李旦收为义子。

1625年李旦和颜思齐先后去世，郑芝龙继承了两人庞大的商业帝国，很快建立了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到1626年时已经拥有120艘海船，第二年又迅猛激增到700多艘。他不但掌控了当时台湾海峡的制海权，还向外国货船征收税银。“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各国皆飞黄（郑芝龙之字）旗号，沧海大洋如内地矣。”实际上，自隆庆开海以来，多方势力都看中了台湾海峡的贸易航线。随着万历中期荷兰人进入南中国海，明末的海洋形势已经日趋复杂，包括郑芝龙在内的中国海寇商人，与日本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以及明朝海上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争斗，一时之间战火四起，上演着海洋世界的群雄逐鹿。

尽管中国的海洋局势已经如此复杂，但明朝此时已经疲于应对陆地上的众多农民起义，完全无暇顾及海洋的管理，中国海洋的真正统治权事实上由郑芝龙集团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瓜分。因此，朝廷希望招安郑芝龙，采用“以盗制盗”的方式来维护东南沿海地区的局势。对于郑芝龙来说，打着朝廷的名号，也有助于自己名正言顺地剿灭其他海盗团体，扩张郑氏集团的势力范围。崇祯

元年（1628），郑芝龙受抚，正式接受了朝廷的招安，一直困扰中国海上的盗寇问题才终于得以解决。而郑芝龙也以其驻守地安平作为中心，建立起了远跨重洋的庞大贸易网络。

在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藏有一幅珍贵的明朝中叶手工彩绘航海图。因为这件珍贵的藏品1659年由一位名为约翰·雪尔登的律师私人捐赠，因此又被称作《雪尔登中国地图》。这幅中国古代地图或许出自一位福建海商之手，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辗转来到此地，然而却被忽略了350年之久，直到2008年鲍德林图书馆清理馆藏时才又被发现。在宽96厘米，长158厘米的尺幅上，这幅地图绘及的地域北起西伯利亚，南至今印尼爪哇岛和马鲁古群岛（香料群岛），东达北部的日本列岛和南部的菲律宾群岛，西抵缅甸和南印度，并且还清楚地标识了明朝中叶中国帆船经常使用的6条东洋航路和12条西洋航路。根据中国学者的考据，这幅《雪尔登中国地图》集明末东西洋航线之大成，而掌控这些航线的正是郑芝龙的海上帝国，郑氏集团的势力范围与地图里所标识的泉州至东西洋航线完全相符。因此，学界又常称其为《明代东西洋航海图》或《郑芝龙航海图》。

“郑氏集团在明代晚期已经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海商集团，其势力在全球也能名列前茅，它实际控制着中国到东南亚大片海域，所以像荷兰东印度公司等其实都是跟郑氏集团而非明政府做生意。”刘婷玉指出，这种级别的海商集团会出现在福建沿海而非其他地区，实际也离不开漳州逐渐松动的私人贸易环境。

站在镇海角，背靠台湾海峡，当巨浪拍击着悬崖时，我不禁回想起多年前自己在葡萄牙罗卡角的经历。罗卡角距离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大约40公里，位于欧亚大陆的西南端，多年前，从西班牙独立出来的葡萄牙人正是从罗卡角出发，开始了穿越西非博哈多角的海军冒险，并最终抵达了漳州。这次远航，不仅令葡萄牙从弹丸小国变成了“世界性的国家”，也令漳州这个中国边陲小城步入世界海洋贸易的网络中心。■

（此文亦感谢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刘焱、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阮永好的帮助）

2023.03

少年新知

第三期

少年

春天来了，
我们聊聊文学

爱情

ISSN 2096-9740

国内统一刊号：ISSN 2096-9740

CN10-1742/C

邮发代号：82-51 定价：25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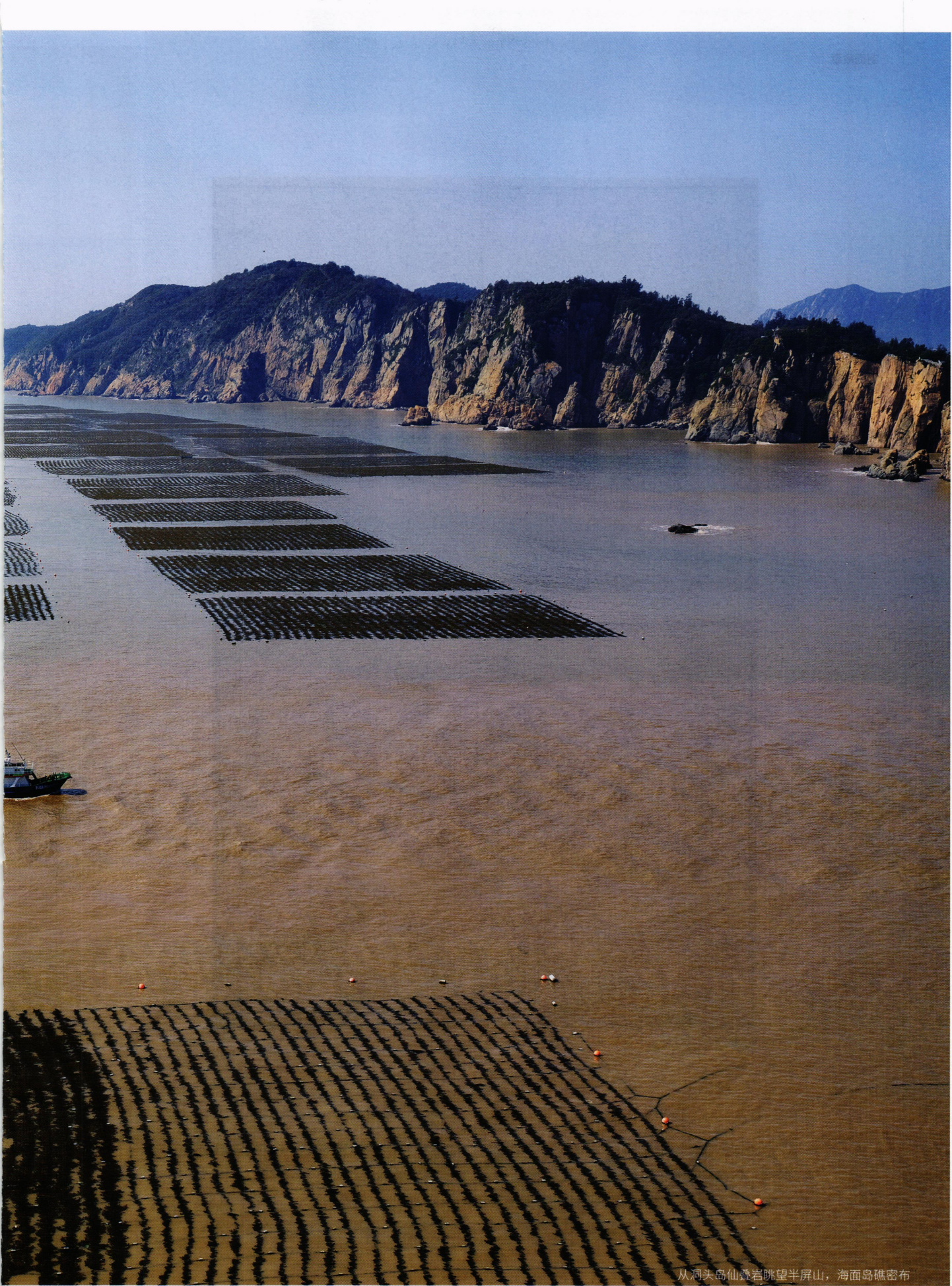
扫码购买

寻找玉环厅

——从洞头岛开始的回溯

记者·肖楚舟 摄影·张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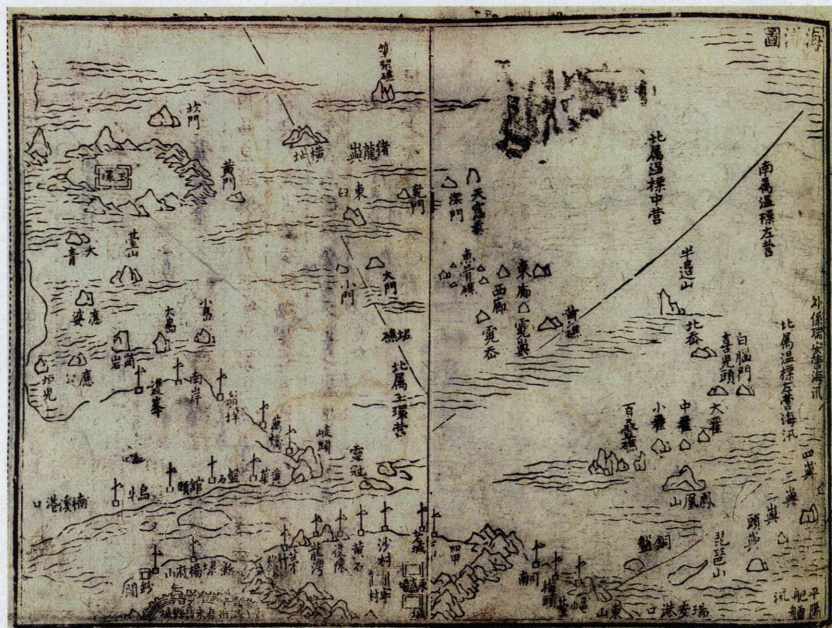




从洞头岛仙叠岩眺望半屏山，海面岛礁密布



雍正年间玉环厅城地图，出自张坦熊编纂的《特开玉环志》



乾隆年间玉环厅的范围及岛礁分布，其中包括今天的洞头列岛

从今天的台州玉环到温州洞头，这片海域上的所有岛屿都曾统一归清朝玉环厅管理。玉环厅的设立是清朝解除海禁后，在海岛进行农业开发的样本，可以理解成一个“玉环海岛经济开发区”。300年过去，岛屿与陆地的关系已经被现代交通改变，玉环不再是一座孤立的海岛，洞头也与陆地桥梁相连。抱着搜寻玉环厅踪影的念头，我就这样来到了洞头岛。



今天的洞头本岛和温州市区有公路连接，交通便利。在洞头本岛的望海楼远望，岛上新建的住宅区一直延伸到海边

视线尽头的土地

从瓯江入海口的温州龙湾机场一路向东，穿过泥沙冲击形成的灵昆岛，导航显示我已经到达一片蓝色水域之中。手机定位依次掠过几个岛屿，海面依然没有出现，举目四望只是一片灰黄色的滩涂。直到开上连接三盘岛和洞头岛的桥梁，夹在海与山峦之间的窄窄水域才提示我，到达海岛了。

站在距离温州市区 33 海里的洞头岛向北望，视野被大大小小的岛礁填塞，完全没有到达海边的开阔感。雍正五年（1726）三月，第一次来到玉环岛的县令张坦熊或许和我有相似的困惑。这一年，他收到了人生中第一张调令，浙江巡抚李卫命他前去开发荒弃多年的玉环及周边海域，主

要工作内容是“垦务”。

中山大学教授谢湜在他撰写的《山海故人：明清浙江的海疆历史与海岛社会》里，关于浙江东南近海岛屿的一章题为“玉环”，里面讲到雍正年间李卫主导的玉环厅复垦，洞头列岛正是这个海岛行政区的一部分。300 年过去，玉环已经和陆地相连，洞头仍然是一片岛屿。抱着搜寻玉环厅历史踪影的念头，我就这样来到洞头岛。

洞头位于玉环厅的什么方位？在光绪年间的《玉环厅志》卷首，有一张玉环厅二十一都示意图，排名第二十的洞头诸岛挤挤挨挨地排在画面中下最边缘处，包括今天洞头区范围内的霓岙（今霓屿）、豆腐岩（位于今大门岛）、沙角（位于今元觉岛）、状元岙（位于今元觉岛）、三盘（今洞头本岛）、黄大岙（今大门岛）等。



左图：在小岛丛生的洞头，移民文化呈现一岛一世界的有趣图景。说闽南话的洞头村，也有温州人信仰的杨府庙

右图：现在的洞头各岛上，依然有许多村庄按照自己的文化渊源，保留着各式各样的庙宇

至于玉环厅的具体管辖范围，出生于湖北汉阳、此前一直在浙江桐庐当县令的张坦熊大概跟我一样毫无概念。研究中国海盗史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平告诉我，美国学者穆黛安（Dian Murray）在《华南海盗》中引用过一句话，大意是清朝的水师管辖范围只到“桅杆落入海平面的地方”为止。站在玉环岛岸边，张坦熊大概还看不到桅杆落入海平面的那一刻，就会被层层岛屿上的山峦阻碍视线。

在古地图上勾画玉环的轮廓，会看到一座孤悬海上的岛屿，与台州南端的楚门半岛之间间隔着一条凶险的水道“漩门”。附近海面岛屿密布，多以“山”“岙”相称，而岛屿之间的水道则称为“门”。在温台东侧的海面上，这种称法非常直观，每座岛屿都陡然从海中升起，山崖紧紧靠着海岸，守望着脚下狭长的洋面。

从史书里去寻找线索，玉环地处浙南门户，自古往来渔商繁多，也因此成为“倭寇海盗纵横之地”。清顺治十八年（1661），因郑成功在福建、

浙江沿海组织抗清复明斗争，清政府下令“迁界”，玉环全境荒弃。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郑氏政权”，沿海迁界之地展复后，常有民众私自前往玉环等岛屿开垦，还有很多渔民在岛上“搭寮打鱼”，从事季节性劳作，但这里仍然处于事实上无人管理的状态。

张坦熊这次奇特的调任，背后的推手是浙江巡抚李卫。李卫善于体察上意，知道雍正有意开垦荒地解决日益突出的人地矛盾，在雍正四年（1726）六月上奏折，提到“玉环山地方周围七百余里，田地十余万亩，山岙平街，土性肥饶，界在温台之间，实为海疆要地”，雍正闻之又喜又疑，批复“如有可垦之地土，甚好事”，又来一句，“也未必，朕未闻有此等地方！”

不要说雍正没有听说过这等地方，李卫自己心里也不一定有底。为了推行自己的海岛开发计划，他曾两次派人前去勘察土地。第一次派去的温州知府芮复传为人刚直，不会看眼色，直言复垦经费开销大，又不知道收益几何，甚至七次上



之归属于沿海的某个县管辖。但是以陆带海的做法面临着严重的管理问题。陆岛之间交通通信不便，且严重受制于气象因素，海岛居民在赋税、司法等方面都会存在很大的不便。”这和李卫在奏折中提到玉环不适合设县的原因相符。“（玉环厅）在台、温两界之间，又须设立营制，知县位卑权轻，与参、游体统不敌，于隔属呼应不灵”“虽志乘尚存两县都图名色，而迁弃既久，界址亦难划分”。

朱波介绍，玉环与内陆厅相比具有地处海岛的特殊性，而与其他海岛政区相比，特别之处在于陆地面积多，开发条件更为优越，管理也更加便利。通过将内陆厅的管理方法套用在玉环，清朝的官员们开始寻找一种解决海岛管理难题的新思路。“如果打一个不太严谨的比喻，玉环厅设置之初就相当于是一个‘玉环海岛经济开发区’，后来才逐渐被认可为正式的行政区。”朱波说。

玉环究竟有多少土地？今天的我们只要拿卫星地图一看便知。但在300年前，张坦熊只能依靠舟楫和双脚去一一丈量。朱波提醒我，所谓的“设厅”是后人回顾时的总结，李卫最初只是建议朝廷设置同知。清朝同知相当于知府的副职，同知的辖区称作“厅”。“厅”在清朝是一种经常用于难治理地带的行政建置，内陆设厅并不少见。相对于设县，其辖区称作“厅”，调派同知管理地方，不额外增加官员数量，程序上也更简捷，也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厅”在清朝是一种经常用于难治理地带的行政建置，内陆设厅并不少见。至于官员管理当地事务的诸多定则，都是逐渐形成的。张坦熊负责的“玉环”，几乎包括温台两府近海地带所有可以开垦的土地，“随垦随报，当年升科”。开垦的推进使“玉环厅”的辖境越来越大，张坦熊的职责范围也随着他的舟楫所至，不断延展。

清雍正五年五月，升任玉环同知两个月后，张坦熊的视线终于到达了洞头。《特开玉环志》提到“三盘、黄大岙等处有田数千，俱肥饶可耕。”“俱属玉环邻近之区，岂可听其荒芜？”上司命张坦熊前去勘察。他发现岛上确实有田地，但耕种条件要谨慎评估，“三盘、黄大岙等处亦多山地涂田，肥饶不一，非内地田亩可比”。好在，比起常受海潮侵蚀、盐碱化严重，土地质量只能算作“下则”

书公开反对垦复玉环。恼怒的李卫另外派员到玉环岛踏勘，探得“玉环岛旧有可垦之田约五六万亩，将来通过围塘开垦等手段，还可增加田地约三四万亩”，加起来有10万亩土地。到雍正五年三月，这份历时将近一年的海岛开发可行性报告终于得到了批准。为了避免再次碰到芮复传这样的硬茬子，李卫派素有正直机敏之名、又无本地利益瓜葛的桐庐知县张坦熊负责实现他在奏折中提到的“十万亩”开垦计划。

单看玉环厅垦复事项启动的时间点，我产生了一种错觉，误以为玉环是清朝第一个海岛厅。后来发现，玉环最终设厅恰好在澎湖厅之后一年，在此之前，附近的舟山群岛也已经设县。如何看玉环在学者的叙述里，却有作为海岛政区的独特性？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朱波对清朝海岛厅的行政管理制度进行过研究。他告诉我，在中国古代，是否开垦海岛、如何管理海岛一直是一个令统治者十分纠结的问题。“明清两朝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这些海岛都采取以陆治海的策略，将



无论是闽南还是温州民居，都在海岛上生出一些共有的特色，屋顶瓦垄压着石块，石墙足有四五十厘米厚，开窗小而深

的楚门半岛，三盘、大门的田地还能分出上中下三等来。

这里所说的“三盘”，指今天的洞头本岛，而黄大岙则指大门岛。现在从本岛去大门岛，除了从陆路绕行 50 多公里自乐清的跨海大桥上岛，还可以从元觉码头出发乘坐渡轮，航程约半小时。在现代交通的助力之下，这段路途尚不容易，难以想象张坦熊花费了多少工夫才抵达。

不难理解张坦熊为何翻山渡海，不断地向南挖掘可耕之地。上司李卫为了促成玉环垦复所报的耕地面积只是个约数，而设厅的关键又正在于这“十万亩”。在勘察洞头诸岛之后，他的视线还不断向北拓展，将太平县所辖的一些岛屿也纳入管辖。直到雍正十年转任台州知府，勤勤恳恳的张坦熊总共在玉环周边滩涂岛屿上开垦出 9.1 万余亩土地，勉强补上了李卫夸下的海口。

那么，这么大面积的荒岛开垦，劳力从何而来？

闽与瓯，移民与定居权

雍正五年，一张玉环招垦的告示改变了福建人刘须鹄的命运。

刘须鹄祖籍福鼎，父辈经商，经常往来于福建浙江之间。他的父亲收养了一位义子刘魁，随着宁波商船的船东做生意，后来刘魁被船东招赘，叫刘须鹄一起去宁波打拼。父亲去世后，刘须鹄收拾行装前往浙江，恰逢李卫发布玉环招垦令，刘家的另一位亲戚刘则闻到玉环报垦荒地，刘须鹄便顺道看望这位堂兄。结果刘则闻向他诉苦垦荒生活艰难，请求刘须鹄留下帮忙。就这样，和他的无数同乡一样，福建人刘须鹄在这一年留在了浙江。

刘须鹄很聪明，尤其擅长算术，正好当时玉环厅需要人才，就在张坦熊管理的厅衙里谋了个会计的差事，专门处理开垦升科的事务。荒地升科，评定的等级直接决定税收多少，刘须鹄把这件难

事处理得公平妥当，颇得人心。暨南大学历史系教师罗诚曾在参与《温州通史》编纂工作时走访过洞头，也在进行玉环厅移民史的研究，刘家人的族谱就是他告诉我的。从刘须鵠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当时福建人常见的人生轨迹：世代经商，海上漂泊，鱼汛也好垦荒也罢，哪里有生计便往哪里去。而浙江沿海岛屿是福建人经常选择的目的地。

李卫发布的招垦令，限定“仰太平、乐清二县军民人等知悉，凡原系土著人民，现在住居内地编入保甲册籍者”，如果无田可耕，可以前往张坦熊处呈报到玉环入籍开垦。按照李卫的想法，为了方便管理，刘须鵠这样的闽广移民并没有“落户资格”。刘须鵠安顿下来不久，当地便有人煽动舆论，说玉环原来属于太平、乐清两县，“闽、广无籍之人匪我族类，势难杂处”，引得官厅也下檄令驱逐闽广人士，“檄下之日，群情汹汹，遵批则尽弃前功，抗命将激成事变”。

实际上，张坦熊在工作中对闽粤两省来的移民采取了灵活变通的方式。随着展复工作的逐渐铺开，仅靠太平、乐清的移民不足以满足所有开垦需求。玉环厅初建时人力有限，其官兵巡视常顾此失彼，部分流民驱而复返，难以根除。刘须鵠利用在厅府当差的便利向上委婉劝说，平息了事态，让自己和族人在玉环有了合法的定居权。

张坦熊到底接纳了多少刘须鵠这样的闽粤移民，自己也未必算得清楚。我们只能在《特开玉环志》里窥得一角，“今所有现在闽省人民六十余口，除搬有家室住居十年以外者，准其入籍，一体编入保甲，不时严行稽察，其无籍之徒概行驱逐，俾玉环山之后路为之一清”。但刘家人是展复之初才来到玉环，显然不够十年之数。谢湜在《山海故人》里提出疑问，“本地居住十年”这个标准是怎么执行的？我们不得而知，这可能更近似一个放松管控的托词。

在玉环的招垦过程中，允许携眷前往是一个重要信号。广东社科院助理研究员王潞提出，明清时代政府招募荒岛垦民，向来主张不允许携带家眷，以免在当地结巢扎根滋生祸患，而玉环厅的做法表明，“政府希望加强垦民的定居，以免民

众涉海奔走引起骚乱”。南方渡海来的福建人、西边沿海的乐清人、北边穿过楚门半岛来的太平人汇集在这片海岛上，逐渐从非法的流民变为固定的合法居民，带着各自祖辈的习俗留在玉环，蔓延到周边岛屿。

在小岛丛生的洞头，移民文化呈现一岛一世界的有趣图景。洞头区文物保护所工作人员柯旭东是土生土长的洞头人，在本岛东南面的中仑村长大，却说一口流利的闽南话。在本岛的渔村间穿梭时，他能通行无阻，但从本岛的老客运码头出发，车程不出10分钟，站在对岸的三盘岛老街脚下，柯旭东立刻和我们这群外乡人一样碰到了沟通障碍。看他略微着急的表情，我立刻判断出，这里是温州话的天下了。

建筑与信仰能直观地表达出一个岛屿的属性。在洞头本岛留存下来的几处清朝宅院，都有明显的闽南特征。如东岙村的卓宅、洞头村的叶宅，内开天井，背带翘脊，面向厝外的两扇窗子带有石雕栏杆装饰，卓宅的二楼阳台还设有木雕的美人靠，天井滴水檐转角处理成“蟹脚”状的排水口。而在鹿西、大门或三盘岛这些讲温州话的岛上，房屋则大多呈乐清风格，不设天井，正厅宽敞，富裕的人家会用杉木板通铺天花板和地板，两侧房间也是用木板隔就，一进门仿佛走进船舱，石墙由下而上微微内收，给人沉稳敦实的感觉。

罗诚告诉我，学者多从当地族谱来探寻玉环及洞头的闽瓯文化分布情况。谢湜、罗欧亚、王潞等学者都讨论过楚门和玉环一带的谱牒，发现其中有许多相似的描述，比如均声明祖上来自温州平阳，强调入垦身份的合法性，这可能是一种权宜的“捏造”。不过在远离陆地的洞头各岛，罗诚也发现亦有许多家族直接声明自己来自闽南。

在海岛生活的人们似乎有种开放的心态。在洞头当地走访，罗诚观察到从瓯江口往东到洞头本岛，温州人口越来越少，闽南移民增多，但本岛上也有个别村庄依然讲温州话。柯旭东在做文物保护工作时走访过许多村落的庙宇，闽南人的村落里供奉的多是妈祖、陈十四娘娘等女性神邸。到了讲温州话的鹿西、大门等岛屿上，普遍供奉温州人信仰的杨府爷。但在讲闽南话的洞头村中

心，也有一座蔚为壮观的杨府爷庙。

张坦熊在《特开玉环志》里谈到玉环民俗，“虽人各异其地，户各异其风，幸而习俗、人情犹存朴茂，他日者渐摩相效，习以成风，不几忘其所自始”。站在各个村庄制高点举目四望，会发现无论是闽南还是温州民居，都在海岛上生出一些共有的特色——高高低低的屋顶瓦垄压着石块，石墙足有四五十厘米厚，开窗小而深，这是几百年来台风海啸造就的营造法则。

“民”与“贼”

跟着柯旭东爬上鹿西西南侧的最高峰，我们试图寻找一座烽火台的遗迹。一路上，我已经听柯旭东讲了许多洞头历史的模糊不清之处。因为各个岛屿的名称历代并不统一，古人又没有精确的制图技术，今天的洞头诸岛究竟曾经属于哪个行政区、在历史上扮演了什么位置，实在难以厘清。

出发前，我向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平请教如何认识海岛历史，他告诉我，要研究中国的海洋史，海盗、走私、偷渡的视角不可或缺。浙江东南沿海曾是明朝抗倭的主战场，洞头各岛由于地处浙南门户的地理位置，自宋元以来就渔商往来频繁，成为大小海盗热衷的目标。翻阅史料，洞头这些海岛的出现，的确总和海盗问题相关。具体到玉环厅初设时的历史，或许也能从海防遗迹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从地图上看，我们正在靠近位于鹿西岛西南侧一个名叫烟墩岗的村庄，与旁边的大门岛相距不远。一条小路往南穿过一片公墓，再走大约十多分钟向上的石板路，最后来到山顶。或许是因为临近外洋，岛礁险峻，站在这里，我第一次在洞头的岛屿上听见海浪的声音。

起初我只看见约摸20米外朝海的一个土墩上立着“鹿西烽火台”的标志牌，不明白到底哪里才是遗迹。柯旭东拨开路边一人多高的蒲草，叫我扒着一棵横生的野树，探头朝一个黑漆漆的洞口里看，我才勉强辨认出一个石屋的轮廓。遗迹在疯长的植物里埋得太深，只能根据柯旭东的描述来想象它本来的样貌，“这个形状莫辨的石堆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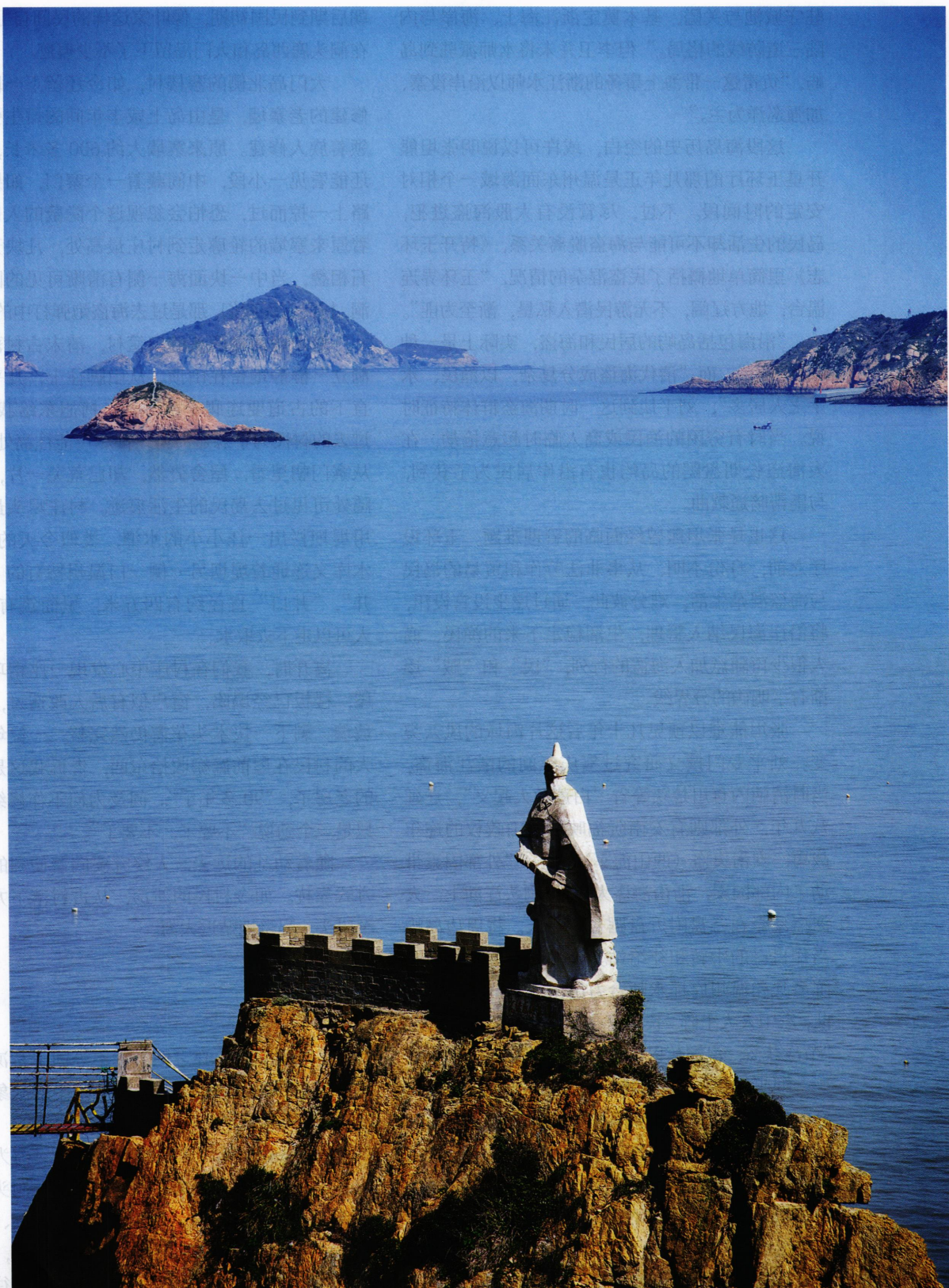
圆锥形垒叠，外径二米左右，内部井状特征明显，内径一米左右，规则严整，似有进风口，应当是宋朝兵寨留下的遗迹”。

今天洞头能看见的烽火台，除了鹿西这一座，还有大门岛（古称青岙）上的三座。站在鹿西烽火台上遥望大门岛最高峰龟岩，可以轻松辨认出前一天我们到过的龟岩烽火台。那里是洞头全区的制高点，东能俯瞰鹿西岛，向北可以远眺玉环，向南则是洞头主岛。大门、鹿西两岛横卧在玉环与洞头中间，在洋面上划分出两条航道，朝玉环那边通往乐清湾，与洞头之间这条直通瓯江口，曾经是温州到上海的主要航道。据《宋史·兵志》“乡兵三”记载：“建炎后寨兵，温州十三寨。城下、管界、馆头、青岙、梅岙、鹿西……”明朝抗倭时期，这片海域曾经是戚继光的主战场，从1369年到1559年100多年间，洞头各岛就被倭寇侵犯过四次。

在宋、明的烽烟熄灭以后，似乎再也没有人造访过这些烽火台。光绪年间重修的《玉环厅志》中单独列出了“寇警”一章，从顺治十八年陈文达等海盗来袭，到嘉庆元年吴弗四在披山岛外洋被瑞安水师击败之间，玉环厅官方档案中没有任何大型海盗骚扰事件的记载。玉环厅开设以后，为何没有在前朝兵寨的基础上恢复岛上驻防？洞头诸岛的海防史为何在这里出现了一段空白期？

“清代海防，因时因地，可以分为多个时期，每个时期防备的对象也各有不同。”刘平告诉我，康熙年间收复台湾以后，清朝统治进入所谓“盛世”时期，社会矛盾相对和缓，“东南地区的海盗一般都是零星小股，组织松散，难成气候。”在康熙宣布开海至李卫任浙江巡抚之前，这一时期的海防以追剿海盗、严防偷渡、防备海外汉人为内容。“康雍乾盛世的‘经济繁荣’使得一般百姓生活安定，不会随意下海为盗、结成匪股。”刘平说。

李卫是雍正三年新设的浙江巡抚，雍正五年又升任总督，对海防十分上心。刘平告诉我：“李卫督浙时，延续相关举措，同时奏请严防日本，加强水师巡洋会哨、缉盗缉私等职责。浙海关负责进出海口之船只人员的管理。沿海陆地有绿营水师官兵设置城寨、炮台，内陆则有八旗、绿营



由于地处浙南门户，洞头各岛自宋元以来就渔商往来频繁，也常受海盗侵扰

驻守城池与关隘，基本奠定浙江海上、海岸与内陆三道防线的格局。”但李卫并未将水师派驻到岛屿，“负责这一带海上事务的浙江水师以沿岸设寨、加强巡洋为主。”

这段海岛历史的空白，或许可以说明张坦熊开垦玉环厅的那几年正是温州东面海域一个相对安定的时间段。不过，尽管没有大股海盗进犯，岛民的生活却不可能与海盗脱离关系，《特开玉环志》里简单地概括了民盗混杂的情况，“玉环界连温台，地方辽阔，不无游民潜入私垦，渐至为匪”。

“沿海包括岛屿的居民和海盗，实际上是一种共生关系”，而“清代海盗成分复杂，以渔民、水手之人居多”，刘平谈到这一时期海盗群体特征时说。当时有穷困的渔民或商人临时起意抢劫，在大海盗长期盘踞的岛屿也有沿岸居民为了获利，与匪帮暗通款曲。

这也是张坦熊曾经面临的管理难题。玉环设厅之前，身份不明、从事非法劳作和贸易的岛民与海盗混杂生活，难分彼此。通过逐步设官设汛，将沿岸海民纳入管理，生活稳定下来的渔民、商人很少再随意加入海盗的行列，“民”和“贼”逐渐有了明确的分界线。

张坦熊难以预见几十年后这片海域的风云突变。刘平专门撰文研究过嘉庆年间的浙江海盗，当时清朝内有川楚陕等省“白莲教大起义”，迁延八九年，外部则有安南阮福映与西山政权的连年战事，安南夷盗（西山海军）突入，“外部因素带动了内部因素，浙南海盗大兴”。洞头洋面上，大海盗蔡牵在三盘附近盘踞七年之久，将周边岛屿当作自己的中转和补给站。岛民叶德吉曾率领团练乡兵和温州府标水师合力出击，对抗蔡牵的舰队，家中人人上阵，长子筹办军粮，次子管驾船只，“节次获盗，沿海藉以稍稳”。

刘平指出，民间团练的出现是与政府权威的衰弱相联系的，“到了清朝中后期，甚至到了民国时期，当地依然存在海盗滋扰，村民便可能自己铸造武器、修建炮台，购买枪支弹药，建立联防组织来防卫海盗”。应对大型匪股，巡游海面的水师会组织出战。但对于日日在海上讨生活的岛民，小股海盗的骚扰多半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清

朝后期到民国初期，像叶家这样的民间自卫武装，在洞头鹿西岛和大门岛留下了不少痕迹。

大门岛北侧的寨楼村，如今还留下一段清朝修建的老寨墙，是由岛上咸丰年间的贡生张瑞谷领着族人修建。原来寨墙大约600多米长，现在还能看见一小段，中间藏着一个寨门，如果从公路上一掠而过，恐怕会忽视这个隐蔽的入口。沿着原来寨墙的轮廓走到村庄最高处，几块天然巨石相叠，当中一块面海一侧有清晰可见的圆形坑洞，村民告诉我们，那是过去海盗炮弹打中的痕迹。

对岸鹿西岛西头的口筐村，清末古村落“溪洞立”静静地留在山顶。从山脚往上，几乎直上直下的古道要连爬十多分钟。柯旭东给我解释，过去的村民为了躲避海盗，都尽可能往高处居住。从寨门朝里看，屋舍俨然，却已荒芜一片，沿路随处可见过去岛民的生活痕迹。村庄尽头最高处用堤坝拦出一汪小小的水潭，类似今天的水库。水库又连通着堤坝另一侧一口温州特有的“琵琶井”，“井口”直径约有四五米，里面筑有台阶，人可以走下去取水。

离开时，我们在村庄中心发现一座精巧的木屋，楼板已经塌陷，窗户似有后人改造过，安了玻璃。剩下一块木头花窗仍然完整。一位年纪不大的村民在屋前廊檐收拾东西，告诉我这是她家的老房子，“90多年了”。问及为何不作修缮，她只是一个劲说“不要了，不要了”。

随着动乱的远去，人终究要向着便利的生活方式靠拢。如今村民的新房，从古村落下方延伸至码头，尽量地贴近大海。

慷慨的海

官方眼中的荒弃之地，并不等同于荒凉。如果不考虑治理者的苦恼，张坦熊眼中的乱象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繁华。

当时，在岛屿沿岸搭寮者众多，讨海为生的人追逐风向和鱼群往来不断，在玉环至洞头这片海域找到了生存空间。“查黄坎门……东臼、三盘等处，搭有棚厂百余，采捕鱼虾做鳔晒屁，舢板船只市卖贸易者，不下千余人”，渔船更是往来无



上图：新修复的玉环厅东段城墙

下图：在玉环市西青街，还留有最后一段真正的玉环厅老城墙

数，“闽浙两省之人船只数百，往来错杂，春夏网鱼打鳅，秋冬捉蛇钩带，其初不过挟网罟微货冀其厚利，一遇风潮吹散鱼汛，遂有不可问者。其中闽省之钓艘船为尤甚”。

清代展界之后，闽浙两省的解禁进程并不同步，直接导致大量福建渔船追随鱼汛来到江浙海域。雍正四年（1726）福建总督高其倬便发现：“查三四月间，福建泉、漳一带及福兴等处渔船并潮州一带船只趁南风向浙江、山东一带北上之际，船只最多”。同年，浙江定海总兵张溥也统计得出：“定海洋汛，有闽省渔船来浙捕鱼……共计约有一千二百余只，自四月初旬起自六月方回。”张坦熊很快发现海上的渔民所获之利不菲，渔船的关税能大大补充玉环厅的经费。

棘手的是洋面管辖问题。“玉环同知所管之洋面与玉环参将所管之洋面不同”，玉环和周边八县共享海域，本地船只多在总港停靠纳税，却在玉环洋面恣意捕鱼。武官巡视的洋面虽然包括乐



清和太平的一部分，文官却收不到这片区域内港渔船的税，张坦熊反问：“（玉环）所分乐太二县三分之一洋面原无船只，税从何出？”雍正五年上报情况以后，原来八县洋面的渔船，只要进入玉环范围就要缴纳关税。虽然加重了渔民的负担，但的确支撑玉环厅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期。可能是舟山渔场的光芒太盛，很少有人注意

到浙江第二大渔场洞头的富饶。洞头的鱼汛分为春夏汛和冬汛，几乎一年四季都能有所斩获。据1993年的《洞头县志》记载，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洞头渔场春产大黄鱼，谷雨起发墨鱼，秋汛捕海蜇，立秋开始可以捕带鱼，直到次年惊蛰为止。

海蜇是洞头人叙事中的一个重要主角。清朝后期的玉环同知王步霄写过一首诗：“美利东南甲玉川，贩夫坐贾各争先。南商云集帆樯满，泊遍秋江海蜇船。”岛上五六十岁的人，多半还记得海面上漂满海蜇的画面，老码头长大的客栈老板阿天记得小时候三盘老街的面貌，“路面全部青石板铺就，一条街都是商铺，沿路好几家海蜇行”。

下了三盘大桥，穿过一片居民区，沿着老街拾级而上，如今已被改建新房的三四栋房屋原本都是海蜇行的所在。柯旭东依据唯一保留下来的“协兴行”遗址给我们描述海蜇行的经营状况，一楼摆满木桶，渔家将海蜇捞上来，放在海蜇行用明矾炮制加工，再从这里售往各地。洞头洋的海蜇个大质佳，肉质厚实，入口爽脆，尤其是元觉、三盘一带的海蜇最佳。上世纪30年代，洞头同春渔行主叶美玉从日本购进“中南号”商轮，直接将三盘海蜇和其他水产品销往日本。到70年代，三盘海蜇加工质量甚至成为海蜇出口的检验标准。

海洋的慷慨容易纵容人的贪欲。阿天的父亲过去是船老大，渔业集体化以后，给村集体捕鱼，常常要开着大船，旁边再带一条七八米长的小木船。因为大船舶舷太高，一网下去鱼重得拖不动，便只有先拖到小船再分批卸到大船上。某天夜里出海，渔获颇丰，父亲一时得意忘形，打了一网又一网，回家的路上，借着雪白的月色，只见满船鲜鱼泛出粼粼蓝光，船舷几乎要被压进水面。“他吓坏了，从那以后很久都没有打鱼。”阿天说。

根据1993年的《洞头县志》数据，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以前，洞头海蜇产量虽然每年不等，多的有9000余吨，少也有六七百吨，到1976年忽然跌落到90吨，此后再无统计。阿天家的客栈在本岛老码头旁，从房间窗户望出去，可以俯瞰三盘岛与洞头岛之间那片曾经盛产海蜇的海域。老码头正在扩建，水面上少有船只路过，浑黄的海水显得有些寂寥，洋面浮满海蜇的图景只能依靠

想象了。

对于岛上的居民来说，海总是慷慨的。无论渔获、商机还是土地，都可以向大海索取。柯旭东带我们走过一条他儿时常走的老路，从洞头村的杨府爷庙往下，首先看见一座鱼行遗址，楼檐上保留着海鱼造型的滴水兽，透过坍塌的大门往里望，高大的主结构还可以辨认。过去这条荒弃的老街，沿路除了鱼行、粮站，还有打铁铺、修船厂，海上居民的生活所需可以在这条街上得到全方位的满足。如今码头已经离老街很远，面前是一片巨大的工地，听说那片新盖的住宅楼，是用来安置交通不便的岛屿上迁回的岛民的。

一段城墙

在大规模垦务基本完成的那两年之后，张坦熊有没有再去过洞头列岛？玉环同知究竟是如何管辖这些零星分布的岛屿的？在洞头，几乎难以找到玉环厅行政管理留下的痕迹。我们决定抽出一天，驱车前往今天已经划归台州的玉环市，看看张坦熊所建的玉环厅城究竟在怎样一个地方。

或许是因为地处台州边缘，与直接连通温州市区的洞头相比，玉环老城反而显得陈旧，仿佛停留在了20年前，难以看出当年厅城的中心地位。我们只能从《特开玉环志》收录的地图里，想象一座巍峨的城池曾经立于北面的山坡之上，俯瞰这片汪洋与山峦包围中的小小盆地。那座曾经存在的城池，周长961丈有余，有靖海、永清、镇远、宁涛四个城门，“其屹然巍然驾青山而临沧海者，岂独温台之屏障矣”，理应是每一个到达玉环的人最先看到的标志性建筑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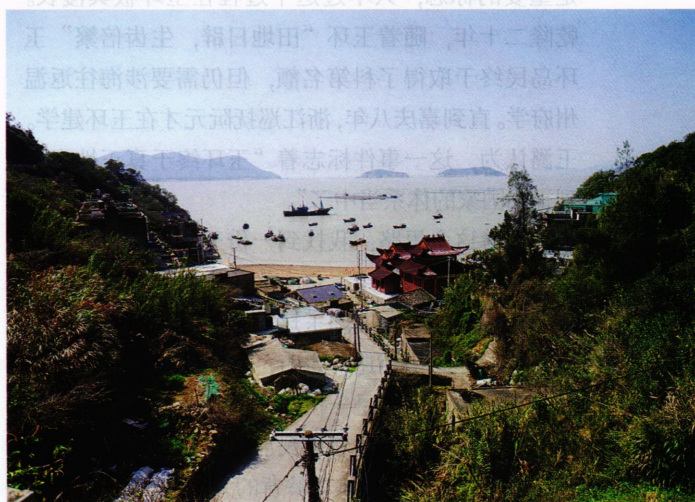
设厅初期的大规模垦务基本结束之后，张坦熊开始考虑在玉环岛上修筑厅城。玉环虽在清初也设过行政机构，但早已荒废。最初几年张坦熊的办公条件称得上寒酸，“卑职奉委来山，惟以开田播种为先务。始则栖身布帐，继则搭盖茅棚”。随着玉环初具规模，“田畴渐广，居民云集，其文武衙门，观瞻所系”，没有一座自己的厅城实在说不过去。从雍正八年（1730）到雍正十年（1732），张坦熊的工作重心就扑在这座海岛城池之上。

张坦熊过世后，久闻其为官之名的袁枚曾作过一篇《张郎湖臬使逸事》，戏剧化地描述了玉环厅的建城始末。当时玉环的地理条件其实不适宜大兴土木，“原议本山造城内用土墙，不意观风整俗使某条议必用方石大砖”，迁界之后堤塘荒废，台风海啸不断侵扰，四面高山还造成了额外的困难，“山石粗脆，外洋石又不能运来，当事者忧心如焚”。正在张坦熊一筹莫展之际，一场台风来袭，“忽起飓风，白日天黑，大雨如注；但闻风声、水声、水声并龙吼声，如洪钟鸣，屋瓦皆飞，官民相见啼泣”，张坦熊开仓赈济百姓，前往各村庄查看灾情，忽见“洋吞陡门前开小河一道，直通大洋”，石材就此运入城中，那条河被命名为“天开河”。

听说老城的东门社区有一截玉环厅城东段城墙遗址，我们顺着地图来到一条逼仄的老街上。向街边路人、商铺小贩询问，最后一直问到居委会，才弄清这段城墙在山上新建的孔庙背后。山看起来不高，坡度极陡。新修的城墙沿线随处可见坟墓，看来厅城废弃以后，这里已经被山脚的居民当作了坟山。站在半山腰，我和同事兵分两路，我向上经烽火台往北门去找老城墙，他往下看看有没有东门的遗迹，结果一无所获。山脚下，大抵是原来东门靖海门的位置，一棵开得正欢的桃花树下面堆着碎砖烂瓦，周围已经成了小村的垃圾场。我们在那里拦下一位过路的村民询问，他不大分得清我们说的“老城墙”是什么意思，还朝我们背后的新城墙指了指，最后告诉我们，“老的都拆光了”。

几百年下来，玉环厅城饱受海风侵蚀，崩塌脱落不断。上世纪40年代，年久失修的老城墙开始拆除，筑城的石块有的被用于当地公共设施建设，有的被村民搬走自用。保留到最后的西门到70年代也彻底消失。

我们在刚改建成特色商业街的西青街，



上图：很少有人注意到，洞头是浙江第二大渔场，曾经盛产海蜇

下图：原来的老街已经离码头很远，岛民的生活也发生了许多改变

即原来西门的所在地找到了唯一一段真正的老城墙。从立整热闹的街面拐进一条宽约两米的小巷，一段20来米长的石墙明显分成上下两部分，下半截由形状不大规则的石块垒成，上半截间或可见刻有文字的墙砖，以同治十年的最多。我们蹲在小巷里面端详城墙，旁边院子里走出来一位打灰的老人，告诉我们他小时候还见过西城门，这段城墙就是唯一的真迹了，“下面那段是真宝贝，上面的是后来的皇帝修修补补的”。

有了厅城，张坦熊终于有了正式办公地点，也得以在厅城周边建起相应的配套设施。今天的玉环仍借用了一些张坦熊的城市规划，市政府大楼就是在原来的同知衙门地基上盖起来的，原来的城隍庙改成了招待所，现在的“童童幼儿园”则是张坦熊办的义学原址。经过幼儿园门口，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岛民的构成中似乎很少谈到读书入仕之人。海岛上的人是怎么读书的？

玉环建厅之初，大多数岛民是来自周边及闽粤两省的贫苦民众，不大考虑读书的事情。虽然张坦熊设了义学，玉环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自己的厅学，来开垦土地的移民要求学必须每年回原籍应试，万一考中秀才也要在原籍的学宫就读。一个行政区要想正式进入王朝国家的体系，加入科举体系是重要的标志，只不过这个过程在玉环极其漫长。乾隆二十年，随着玉环“田地日辟，生齿倍繁”玉环岛民终于取得了科第名额，但仍需要涉海往返温州府学。直到嘉庆八年，浙江巡抚阮元才在玉环建学。王澐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玉环终于真正地走入到王朝国家的体系当中了”。

顺着这个思路，我找到一份玉环厅关于洞头税收纠纷的记录。光绪三年，三盘庄绅耆洪潜、林凤鸣、陈建章等十余人向玉环厅理民府呈上控书，要求对粮书叶周华等违背定章、勒索赋税之事予以禁止，其中林凤鸣就是一位贡生。几方调停之后，时任玉环同知杜冠英签署理民府告示，刊刻立碑，这块石碑今天还留在洞头岛岭背的太阳宫。

离开玉环前，我们依据一些零星资料来到城区东南的塘垟村。据说当时的“天开河”就是从海边一直冲到塘垟，那里还有一座张坦熊曾经题过匾的古庙。顺着导航，我们直接开进了一片废墟，不要

说河道，整座村子都荡然无存，倒是那座塘垟堂还挺立在废墟之中。庙堂里黑漆漆的，一对木门上镂刻的陈十四娘娘眉目清晰，栩栩如生。庙门口的小卖部里坐着几位闲聊的老人，我问他们这座庙在这里多少年了，老人伸出两只手指，“200年了”。

“200年”，我在洞头各处年代不明的旧址也偶尔听到这个数字。它在这片海域意味着“清朝”或“很早以前”，大概指代着张坦熊开辟玉环厅，海上诸岛被逐渐纳入帝国行政管理系统的那段时间，也是现在大多数人的记忆能追溯到的最深处。

今天再从玉环到洞头，已经很难体会到张坦熊当年“渡海难于刻日”的艰险。岛民与陆地的关系被现代交通方式重塑。一条长达几十公里的灵霓大堤将洞头与温州市区连接起来，经过主岛，最远能到达半屏山尽头。从洞头到玉环，原本自雍正六年到上世纪90年代一直有轮渡相通，如今航线已经取消，必须驾车从陆上绕行100多公里。往返两地之间，很难分清桥下究竟是海水还是泥地。海堤建成之后改变了海水流向，堤坝逐年变宽，延展成广阔的滩涂。玉环岛也不再“孤悬海外”，曾经遍布旋涡的“漩门”40年前建坝填港，让玉环和楚门半岛连成一体。

离开前，我们特地一路开到玉环南端的鲜迭村眺望洞头。站在岸边，鹿西和大门两座岛屿近在眼前，比起跟洞头本岛的距离，它们离玉环的海岸线要近得多。村庄尽头的修船码头上，我在弥漫着柴油味的空气里站了一会儿，看见岸边泊着两条渔船。根据船号判断，一条来自大门岛，一条来自福建。

（感谢复旦大学历史系刘平教授、暨南大学历史系罗诚老师，及邱国鹰、柯旭东先生的帮助。参考文献：[清]张坦熊编纂《特开玉环志》；[清]杜冠英、胥寿荣主修《玉环厅志》；谢湜《山海故人：明清浙江的海疆历史与海岛社会》；刘平《嘉庆时期的浙江海盗与政府对策》；朱波《聚岛为厅：清代海岛厅的设置及其意义》；王澐《从封禁之岛到设官设汛——雍正年间政府对浙江玉环的管理》；邓琳《文人安邦：管窥张坦熊与玉环地方展复构建》；柯旭东《洞头遗风调查初探》；王邦敏《洞头三盘近代海蜃行的历史和现状》；陈辰立《明清传统时代大东海渔业活动对岛屿的利用》；1993年版《洞头县志》）

Philharmonic

爱乐



归来吧！黑胶 唱机 工厂 收藏 探店

前奏 不可思议的竖笛 —— 华彩 黑胶唱机的绚烂暮光 —— 变奏 微观
荷兰哈勒姆工厂的黑胶世界 —— 再现 有趣的黑胶收藏 —— 追光
黑胶、威士忌与空间 —— 即兴 一位黑胶爱好者和他的“乐园” ——
幕间 美国民谣摇滚二重唱组合靛蓝女孩乐队 —— 注音 化山为水：
潘多拉世界的音乐语汇 —— 回旋 史太君音事杂缀 —— 宴可 复调



爱乐公众号



扫码购买纸刊



订阅电子刊

古海图，中心、边缘与“海洋空间表现”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孙靖国

主笔·薛梵

地图的中心与边缘始终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我们该如何从地图的演变上来理解全球历史的进程？

明代：古海图的绘制高峰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明代出现了中国古代海图的绘制高峰？

孙靖国：首先要明确一点，怎么界定“海图”这个概念，因为包括的内容太广泛了，所以我现在也会广泛地称之为“海洋空间表现”。简单来讲，中国古代海图，按照绘制目的、使用场景和表现内容，主要可以分为海域图、沿海图、海防图、航海图这几大类。

比如，清代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这部书里面有一幅《沿海全图》，从今天的辽宁一直到广西的钦州，它总体表现的是沿海一带的综合情况，这就属于沿海图，这幅图影响非常大，据我看到的就有几十种后世摹绘版本。而海防图则是针对较大规模的军事威胁而绘制，其中最重要、最典型的的就是明代嘉靖朝郑若曾《筹海图编》中的《沿海山沙图》，是为应对当时严重的倭患，针对整个沿海的军事形势，敌人会从哪里来，我方在哪儿布防、怎么防，这些问题都会在地图中显示出来。当然无论是海防图还是沿海图，抑或是大的海域图，都可用作航海示意图，这些地图大多是长卷，它要呈现给读者海上航行的视角。而我们狭义上讲的航海图，应该是有航线或者用参照物形成航线的，但很多海图中，航线只是示意性的，不具备在真正的航海过程中的指导价值。

中国海图绘制历史悠久，唐、宋、元的文献中都提到了绘制海图的事迹，但这些海图都没有保存下来。明代距离今天较近，保存下来的资料更多。同时，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等航海活动，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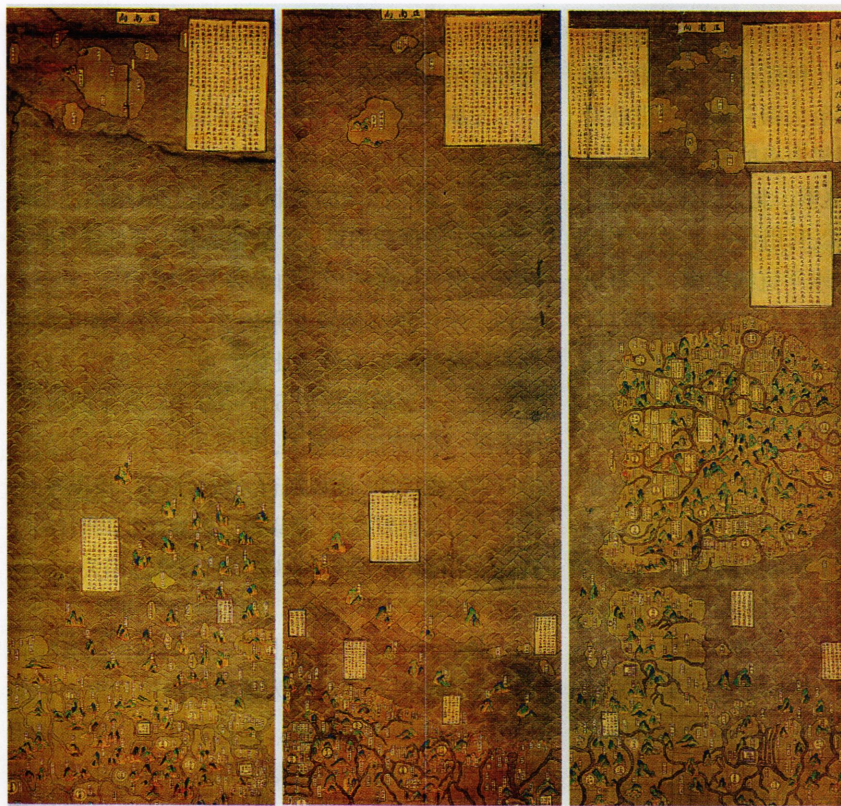
廷上下对漕粮海运的讨论，都推动了海图的绘制。来自海上的倭寇的侵扰和威胁，也促使诸多有志之士绘制海图，来加强沿海地区的防御，更好地对海疆进行治理。

三联生活周刊：由于绘制者与用途不同，同一时期的舆图（地图古称）也往往会出现地理信息差异。在明代的海图中，有没有相对重要，或是使用率较高的舆图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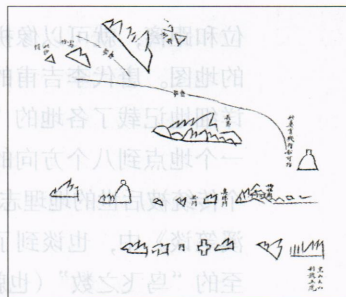
孙靖国：明代最重要的航海图，当数收录于茅元仪《武备志》中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学术界一般认为这幅地图的绘制与宣德五年（1430）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航行相关，所以简称它为《郑和航海图》。

《郑和航海图》原为长卷，后收入《武备志》后，为符合书籍格式，才改为图册。该图描绘了郑和航行的航路，以及沿途的海岸、岛礁、港湾、河口、城邑等内容。《郑和航海图》以“针路”（指使用罗盘针校正的海上航路）为主要表现内容和组织形式，采用参照物来确定航行位置与方向。为航海方便，采取了灵活的方向处理，这幅地图并未采用上北下南方位，甚至没有采用固定的方位体系，而是根据船队航行的方向，自右向左展开，同时出于定位需要，保持陆地在上方位，使得大陆海岸被变形伸直成为大体平直的一道参照线。这样随着航路所经地区的不同，方向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样对方位的灵活处理，正是出于航海时使用的方便，也凸显了中国传统舆图实用性的绘制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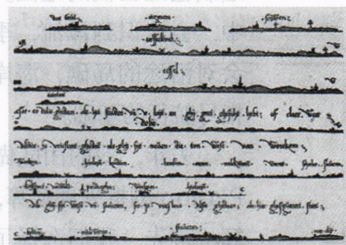
在海防图方面，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嘉靖时期主持抗倭战事的胡宗宪委派手下幕僚郑若曾等人编绘了海防军事图籍《筹海图编》，其中的《沿海山沙图》采用册页形式，以海岸线为中心线，将中国海岸线画成“一”字形，海总在上方，大陆总在下方，表现沿海地区的山川、岛屿、地形和城堡、烽燧等。



1



2



3

- 1.《乾坤一统海防全图》，出自《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曹婉如等编，文物出版社，1995年
- 2.章巽古航海图第七幅，出自章巽《古航海图考释》，海洋出版社，1980年

3.在欧洲大陆附近的海域中，沿岸的侧面图(profile)对水手来说更加实用，图为科内利斯·安东尼松《东方海洋地图》(1558年)中的木刻板侧面图，出自《地图学史》第三卷《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学史》第二分册，戴维·伍德沃德主编，孙靖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郑若曾的地图影响很大，除了他的《筹海图编》翻刻版本众多之外，还有很多地图是以它为蓝本进行摹绘、改绘为长卷或者屏风，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乾坤一统海防全图》。

古代地图是如何绘制出来的？

三联生活周刊：古代绘制地图主要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如何确保地理信息的准确性？

孙靖国：中国古代受“天圆地方”观念的影响，把地表看作一个平面，所以没有形成绝对的投影坐标系。但在长期地理实践和国土管理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数据，中国人摸索出利用地理景物相对位置关系建立相对坐标系，进而绘制地图的方法。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知道北京、天津、廊坊、高碑店、涿州这几个地方彼此的方

中国古地图数量众多，国内外很多家单位都有收藏。中国收藏古地图比较丰富的机构有：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目前中国古地图最重要的收藏单位，主要收藏原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的舆图、军机处奏折录副地图；
2. 中国国家图书馆，根据该馆1997年编写的《舆图要录》，著录了6827种中外古旧地图；
3.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相当数量的原清内阁大库明清旧本舆图。另外，辽宁省大连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也收藏有较多的古地图。海外各国也有许多图书馆、档案馆以及私人收藏，以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英国国家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德国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等为代表。

位和距离，就可以像拼图一样拼出一幅相对准确的地图。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中，就详细地记载了各地的“四至八到”数据，也就是一个地点到八个方向的相邻地点的路程数字，这个传统被后世的地理志所继承。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谈到了可以利用保存下来二十四至的“鸟飞之数”（也就是水平直线距离）来重新绘制已经亡佚的地图。中国古代人在海域航行过程中，会认识到洋流、季风、水深等海洋知识，也会对沿途的岛礁、海岸逐渐熟悉，这些知识都是指导航行的基础。

去年，我的团队做了一个工作，利用 GIS 和 Python 的批处理计算，对古地图的方位进行了测算。首先，我们选择了一个区域（今天山西西北部，明清的大同左卫道），选出几幅描绘这个区域的城堡的明清地图，算出图上每两个城堡之间的方位角，然后算出今天这些城堡之间的实际方位角。我们对这些方位角进行对比，最后发现符合

度非常高。这说明中国古代人对自己国土的地理情况有着精准的了解。

三联生活周刊：绘制海洋地图和绘制陆地地图相比，各自的难点是什么？

孙靖国：海图的绘制和使用与陆地地图有不同之处。前面我们说过，陆地地图主要依靠控制点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由于海上一望无际，缺乏参照物，所以距离测算非常困难，一般会使用时间作为计量航程的单位，比如“更”，一般以一昼夜为十更，一更的航程约 50 ~ 60 里。海上的航行，受季风、洋流的影响更大，更要利用这些自然条件，所以会根据洋流、季风航行一段时间后，校正方向，使用的工具是罗盘针，所以海上的航路也叫“针路”。航行所使用的手册的名称也与航海息息相关，独具特色，比如“顺风相送”“海道针经”等等。

由于海上不像陆地上可以作为地标的参照物那么多，所以对可以作为地标的岛屿和海岸上的山峰、塔楼等非常重视。渔民、水手、海商使用的航海图，往往是绘出这些地标的侧面形态，这是因为在海上航行时，只能看到这些景观的侧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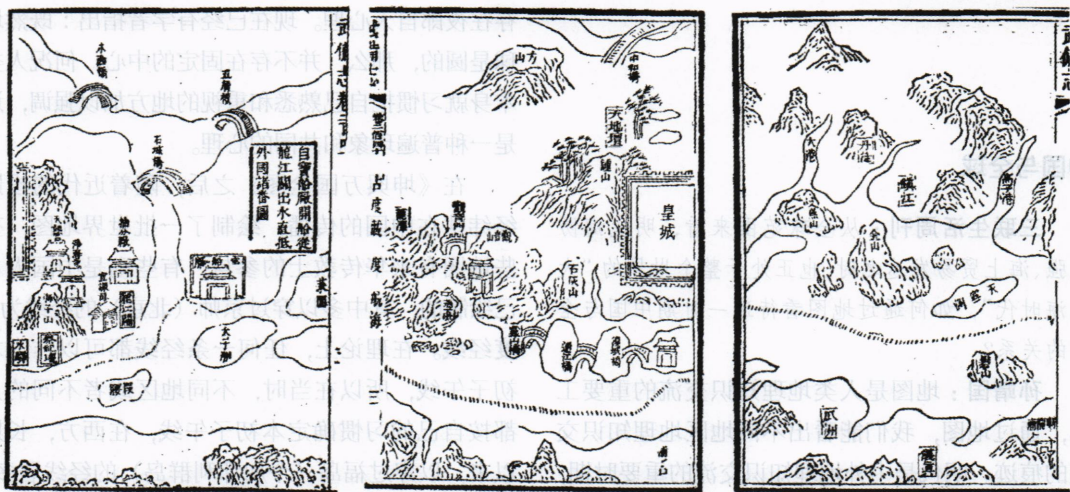
尤其是岛屿，对于航行辨认方向和位置、避风、补给淡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水手使用的手册中，是重要的描绘对象。而中国古地图上的岛屿，大多画成山峦的形象（堆积而成的沙洲除外），这更说明是实际航海观测的结果和需要。把岛画成山的样子，是因为航海时，在海面上看岛就是一座山，如果画成我们今天熟悉的俯瞰平面轮廓，对水手来说，是无法判断自己与岛屿的实际位置关系的，也很难在实际航海中直观地观测与校正。水手实际使用的地图往往画得很稚拙有趣，甚至有错别字，但却是在航海中真正应用的。

1956 年春，历史地理学家章巽在上海旧书堆中买到一套古代抄本地图。图册的绘制手法比较简单，主要是用线条勾勒海岸、山脉与岛礁的轮廓，用文字标注地名与有关水文、针位和航路的内容，注记的文字相当口语化，很多地名是用谐音字来代替，而且多有白字错字，如辽东的“旅顺口”读成“里顺口”，写为“黑顺口”；山东的“芝



孙靖国

（于俊文摄）



《郑和航海图》(部分), 向达整理, 中华书局, 1981年

果岛”写作“子午岛”。这套航海图很有可能是清代从事渔业、航运与海上贸易的普通百姓日常使用的。清朝人黄叔璥说“舟子各洋皆有秘本”，我们可以推测，这就是水手所使用的航海图。比如，章巽《古航海图》第七幅就是这样一幅地图，画的是山东半岛登州以北的庙岛群岛的海路，标出了航线的轨迹。这幅地图中有很多明代地名与语言习惯，学者推测此图是由明代的底本传抄而来。

这种基于航行实际视角的地图，在其他地区也有，比如欧洲就有一种叫作“侧面图”(profile)的地图，也是画出海岸上景物的侧面，帮助水手确定航线。1558年尼德兰制图室科内利斯·安东尼松的《东方海洋地图》中有一幅侧面图，其视角与章巽《古航海图》是一致的。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与民间对海洋的观念和态度是否会有所冲突？如果有，会体现在不同版本的地图上吗？

孙靖国：我不太认为地图一定有彼此排斥冲突的门类、派别，一幅图的绘制，其绘制目的、资料来源可能都是多重的，也完全可能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当然，不同的人在使用需求上肯定有所区别，有所侧重。

“老于操舟者，仅知针盘风信，叩以形势则茫然”。

总体来说，作为航海实际使用的地图，渔民、水手用的可能就是前面谈到的《章巽古航海图》那类利用描绘参照物的侧面形态来确定航向航程的“山形水势地图”，因为他们关心的是航行顺利，不出危险，所以能满足自己使用就好，自己看得懂就好。而作为官员，考虑得更多的则是如何统筹管辖地区，甚至更大区域的海域。比如前面提到过的陈伦炯，他是福建同安人，一生都在做沿海各地的武官，切实地感受到了了解沿海形势的重要性，他在《海国闻见录》的序言中提到“老于操舟者，仅知针盘风信，叩以形势则茫然”，也就是说，资深的水手，只知道航海，对于整体地理情况茫然不知。作为做到浙江提督官职的陈伦炯，肯定不会止步于此。他编绘这部图籍，目的是“使任海疆者知防御搜捕之扼塞，经商者知备风潮、警寇掠”。不只是自己航海使用，而且希望对整个海疆的管理起到作用，所以会比较详细地画出沿海全图。

地图不仅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史料，还是一种思维方式和思维工具。

中国与全球

三联生活周刊：从全球范围来看，明代海防加强、海上贸易发达之时，也正处于整个世界的“大航海时代”，如何通过地图看待这一时期中国与全球的关系？

孙靖国：地图是人类地理知识交流的重要工具，通过地图，我们能看出不同地区地理知识交流的痕迹。明代是中外地理知识交流的重要时期，明代洪武时期绘制的《大明混一图》上就画出了非洲和欧洲，这是元代中西地理知识交流的成果。明代后期，西方传教士带来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地理知识，并根据中国绘制得比较精确的全国总图进行测算，将其转化为投影法的经纬度坐标，绘制在用近代测绘方法绘制的世界地图上。大航海时代带来的世界地理知识，被一些中国士人所了解，也绘制出一些世界地图。这些都促进了中外地理知识的传播与交流。

三联生活周刊：地图的中心与边缘始终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纵观全球的古地图，在文艺复兴之前，独立的欧洲地图或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地图并不算多，而随着文艺复兴的发展，以欧洲为中心的版图逐渐形成。我们该如何从地图的演变上来理解全球历史的进程？

孙靖国：古代西方的经济文化主要是围绕地中海进行的，所以地中海是西方世界的中心，中世纪的“T-O”地图也是以三大洲环绕的地中海为中心。

关于地图中心问题，有这样一个故事：利玛窦在中国绘制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其蓝本是16世纪尼德兰地图学家亚伯拉罕·奥特柳斯绘制的《寰宇概观》中的世界地图，是以欧洲和大西洋为中心，中国所在的东亚被放置在边缘。这样的地图不容易被中国知识阶层所接受。为了更好地传教，利玛窦重新绘制，把中国放在世界地图的中心位置。对此，他在自己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

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不懂地球是圆的，存在夜郎自大心理。现在已经有学者指出：既然地球是圆的，那么，并不存在固定的中心，何况人类本身就习惯把自己熟悉和重视的地方加以强调，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和共同的心理。

在《坤舆万国全图》之后，随着近代的投影经纬法在中国的传播，绘制了一批世界地图，有些地图有来华传教士的参与，有些则是中国人自己绘制的，其中多以穿过京师（北京）的经线为0度经线。在理论上，任何一条经线都可以作为本初子午线，所以在当时，不同地区或者不同的人按自己的习惯确定本初子午线，在西方，长期以来，以穿过福岛（今加那利群岛）的经线居多，但很多国家同时也以穿过本国某地的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以首都为多，中国也是这种情况。直到1884年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国际本初子午线会议，最终确定了以穿过英国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所以，以本国本地区为中心，并不只是中国人自己的做法。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欧洲乃至世界地图发展的历程，这个问题既庞大又复杂。去年，你参与翻译了《地图学史》中译本项目，这是目前国际上最全面最权威的地图学史论著。从地图学来考察全球历史，与其他视角或方法相比，有哪些特殊的意义？

孙靖国：地图不仅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史料，还是一种思维方式和思维工具。地图作为图像，具有具象性和现场感，它的绘制有追求精细和科学的一面，但也渗透着绘制者的情感和诉求，绘制者希望能够通过地图打动阅读者。

从全球历史角度来看，地图的发展能够看出人类对所生活的地理空间认识的深化和扩展，能够看出人类如何认识并重组、再现地理空间。地图是理解世界的核心方法之一，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人类地理知识的交流与融合是如何推动地图绘制进步的，也能真切地感受到不同群体对地理知识的了解和需求。《地图学史》是世界范围内几十位最为优秀的地图史家积30年之功的成果，范围涉及欧洲、亚洲、大洋洲、非洲、美洲、北极圈等广大地区，探讨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地图本身。■

欧洲航海扩张的动力和速度

主笔·薛巍

相对落后、封闭的西欧在大航海时代之后急速扩张，一个全球经纬的交流网络第一次在世界上形成。

如果一个现代的成年人穿越到1500年的西欧，他要是喜欢冒险，可以率领一支船队去找黄金，如果喜欢稳定的生活，可以成立一家股份公司，或者搞印刷，因为“关于重要航海发现的消息随印刷出版物广泛传播。没有去过海外的人急于了解远方的奇闻逸事，探险书大卖”。

但总体上说，那时刚出生的孩子的预期寿命一般只有30岁（不过很多人都能活到60岁以上，因为大量人口在一岁前就死去了），如果他登上一艘横渡大西洋的船，船上吃的都是热量非常高的食物，而且只有启航后的头几天有水果和蔬菜，船上的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在途中可能会患上痢疾、斑疹伤寒（也叫“船热症”）以及坏血病，还要面临暴风雨、触礁、搁浅、超载、火灾、遭受敌舰的攻击、海盗的袭击，掉到海里就会成为鲨鱼的猎物，死亡率大概是五分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仍有很多西欧人义无反顾地远航，这既有物质也有精神上的追求。美国历史学家史蒂文·西瑞说：“西方人向世界远航的动力源自3G理念，即God、Gold和Glory（上帝、黄金和荣誉）。在3G理念的鞭策下，欧洲人发起了向欧洲以外世界的冲锋。最初的基督教是一种富有入侵特质的宗教，总是疯狂地寻求把人们改宗至基督教门下。欧洲人对利益的渴望程度甚至超过了改宗异教徒的热情。很多人希望能挖到黄金，另一些更精明的人则想着通过商业贸易的方式获取利益。他们非常清楚欧洲人对于从中国进口商品的疯狂热情，希望找到一个获得中国商品的新渠道。对荣誉的追求也为欧洲探险者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在文艺复兴时期，海外探险者大受赞美，人们认为他们勇敢且崇

尚个人主义。文艺复兴把好奇心视为美德，鼓励人们尽可能知道更多的事情。”结果就是，在大航海时代，西欧迅速控制了西半球、南亚及非洲沿岸国家和地区，在全球扩张，促进了世界文化的融合和世界历史的形成。

跟西欧相比，世界其他地区都没有持续开展大航海活动的强烈动机和地理条件。芝加哥大学教授威廉·麦克尼尔在《5000年文明启示录》中说：“1400年时的世界，数十个社会和文明各自封闭，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和交流。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人群，与其他大陆毫无往来，中国和印度通过贸易建立了广泛的对外联系，但外来影响不足以改变它们自成一体文化和自给自足的经济。阿拉伯和印度的穆斯林商人，在印度洋海域有一套错综复杂的贸易运作体系，却满足于将其活动局限于那些已知的、有利可图的、能安全航行的海域。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受到了地理条件的限制：几道海峡成为它的天然边界，而它控制的红海则扼住了连接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和印度的交通要道。向印度洋东部和南部航行时，一旦偏离那几条已知的借助季风航行的季节性航路，航海就会变得艰难而危险。”

美国社会史学者杰克·戈德斯通在《为什么是欧洲》一书中着重描述了欧洲人对贸易路线的需求如何迫使他们突出重围。西欧被西边的外海和东边的奥斯曼帝国夹在中间，封闭了起来。当时中东和亚洲各国却没有受到这样的限制。在1400年以前，欧洲的船只基本上都只是围绕着欧洲的海岸线航行，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事业兴盛起来之前，欧洲最伟大的航海家是北部的维京人和地中海的意大利人。意大利人的足迹遍布了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甚至越过君士坦丁堡附近的海峡，到达了黑海东海岸，把亚洲的丝绸、香料、玉石和珠宝运回欧洲。但是意大利人的航行范围很少超过黑海或是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地中海沿岸。阿拉伯商人不仅能够穿越北非，到达西班牙，还沿着红海航行，顺着



1497年，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带领多名水手踏上探索通往印度的海上航路

非洲东部海岸线一直到达桑给巴尔，绕过阿拉伯半岛，驶出波斯湾，穿越印度洋，来到盛产胡椒、宝石和其他财物的国度。印度的商人则向西沿着印度洋航行，到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或者向东绕过孟加拉湾到达东南亚。几乎在哥伦布航行之前100年，中国人就已经建造出了巨型远洋舰船，从本土出发，到达印度，又穿过印度洋到达非洲。“简言之，当欧洲人还被伊斯兰国家挡在身后时，别国的贸易商就已经能够自由地穿梭于整个亚洲地区进行贸易活动了。所以欧洲人要寻找一条直接通向东方的路线，以便突破奥斯曼帝国的屏障，参与到繁荣的贸易活动中去。”

戈德斯通说，欧洲人要历尽艰辛开发航线，是因为当时印度和中国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要胜过欧洲。印度和中国的土地更加肥沃、高产，生产技术也更领先，中国最早生产纸张、火药、指南针、三角帆船、精美的瓷器等，印度有棉织品。中国和波斯还有丝绸。“当印度人和中国人穿着柔软舒适的棉织衣物时，欧洲人还裹在粗糙的亚麻和羊毛衣物里。与新大陆建立联系（找到金银）前，欧洲可用于国际贸易交换的商品很少。”

随着欧洲自身丝绸生产的发展，丝绸贸易的重要性下降了。但亚洲的香料，在欧洲却没有替代品。

这些香料有来自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丁香、肉豆蔻、胡椒，或来自锡兰（斯里兰卡）的桂皮和印度西南部的胡椒。如今胡椒只是日常生活中一种价格低廉的消费品，可是在15和16世纪，欧洲对香料有极大需求，欧洲冬季没有足够的饲料喂养牲口，也没有丰富的蔬菜、水果和饮料，香料的主要用途是为那些不新鲜的肉类或腌制肉类添加风味。

大航海既需要船只、人员，也需要武力保障。威廉·麦克尼尔说：“达·伽马来之前，就有穆斯林商人采集香料，从印度南部或阿拉伯半岛南部，经红海船运到埃及。从埃及出发，这些香料又被转运至威尼斯等意大利城市，最后卖到西欧各地。这一贸易路线包含多次交易，层层加码后，价格大幅上涨。除了交易费用之外，红海各港口还要收取税费。为规避这些费用，达·伽马在印度南部收集香料，直达里斯本。所以，里斯本取代威尼斯成为欧洲香料集散大港。达·伽马成功后，葡萄牙很快跟进，葡萄牙人设计的绕非洲去印度的新航线对穆斯林商人造成了威胁。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穆斯林没有能力抵挡葡萄牙人。葡萄牙船装有火炮，能在90米开外击沉敌船。”

在大航海时代以前，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还有许多空白和错误。英国学者戴维·阿诺德在《地理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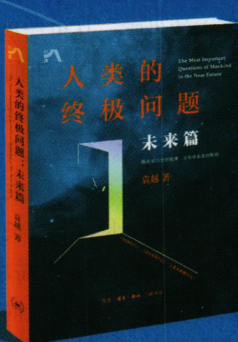
发现》一书中说：“欧洲人对于外界的认识，其中神话般的幻想多于真实的认知。为了弥补欧洲世界对于亚非地域的无知，绘图人会在地图上描绘出一些假想虚构的河流和山川，配上一些肆意杜撰或早已消逝的君王。欧洲人普遍相信，远航船只一旦冒险驶入未知的海域，就会偏离航线消失在世界尽头，或者无缘无故地丧命于热带波涛汹涌的大海。当时曾有人认为，地球是平的，船如果走得太远，就会从地球边缘掉下去，永远回不来。1400年，欧洲人对于所处地域以外的想象，不仅含糊不清，而且往往是舛误的，但此后200年内，各大块陆地渐渐演变成今日我们所熟稔而清晰可见的模样。许多非常重要的地理发现都是在令人惊愕的短暂时期内产生的。世界各大海洋形成了一个单一的航海体系，欧洲人控制海洋，将影响力扩展到所有大陆。”

欧洲人的远洋探险和征服行动之所以迅速展开，是由于一些君主和航海家个人的魄力，更离不开11世纪到12世纪以来欧洲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发展。公元1000年到1400年，欧洲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科学技术领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黑死病带来的严重灾难之前，欧洲人口一直有显著的增长。北欧的耕作技术改良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海上贸易与陆路贸易得到发展。随着贸易与航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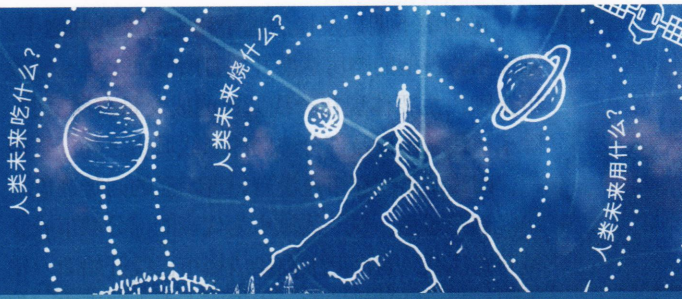
发展，银行和金融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600年后，股份公司制形式完善起来。股份制企业能会聚储蓄、分担风险、充分利用专业技能。“即便是哥伦布没有在1492年横越大西洋，即便是科尔特斯没有在1521年占领墨西哥，总有一天，会有其他欧洲的航海人和冒险家来完成。”

欧洲人通过一次次海上和陆上的冒险活动，将全球连成一个整体，在这一过程中西欧人获得大量财富，给新世界的人造成了冲击。威廉·麦克尼尔说：“世界海洋通航带来的一个变化是，粮食作物从美洲到世界各地的传播增加了人类食物供给。美洲把烟草、玉米、土豆、甘薯、木薯、花生、西红柿传到世界各地，玉米和土豆变成欧洲和非洲的重要作物。在中国南部和西非，甘薯成为主粮……欧洲地理大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文明关系。世界各海岸成为最重要的区域，不同文明在此相遇。欧洲海船停泊的港口成为文明会合的关键区域。在这些港口，欧洲人有机会了解到其他民族的奇风异俗，而其他民族有机会学到欧洲的技艺和思想。商品、思想、殖民者、疾病、技术和艺术风格在海上迅速传播，速度超过内陆……此前，欧亚大陆远西地区处于文明世界的另一端，而现在却变成所有历史的中心。自此之后，现代史开篇。”

行
读



《人类的终极问题：未来篇》
袁超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年8月




人类的终极问题 未来篇

农业、材料、能源，直面关系人类未来生存质量的三大关键问题

既有对历史的梳理
又有对未来的展望

2019年“中国好书”
《人类的终极问题》之续篇



扫码探索
人类未来的终极问题

房地产复苏了吗？

主笔·谢九

去年四季度以来，房地产迎来一轮史诗级救市，在经过了一半的高强度救市之后，房地产行业出现了止跌回稳的迹象。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房地产行业已经开始真正复苏了呢？

房地产行业是否已经开始复苏，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判断：一是从购房者角度，看楼市的成交量是否开始大幅增加，甚至价格也出现反弹；二是从开发商角度，看开发商拿地的积极性是否上升，以及投资规模是否反弹。

从购房者的角度来看，这一轮楼市刺激最大的利好在于房贷利率大幅下调，很多城市的房贷利率已经低于4%，创下历史最低纪录。房贷利率下降一方面降低了购房者的成本，同时，银行以更低的利率评估购房者的还款能力，能够给购房者发放更多的贷款，相当于提升了购房者的购房能力。所以，对于刚需和改善型购房者而言，利率下调的确能够起到非常直接的刺激作用。

在利率下调以及换房退税等政策的刺激下，刚需和改善型的购房意愿开始有所回升。这一轮楼市止跌，主要体现在一线城市的成交量有所反弹，除了一线城市以及部分热门的二线城市之外，其他三、四线城市的楼市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回暖迹象。

春节过后，以一线城市为代表的部分城市成交量开始活跃，也因此被渲染成楼市已经开始新一轮大幅反弹，这种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事实。作为楼市大幅反弹的一个重要证据，是北京在春节后的成交数据，今年2月1日至23日，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同比上涨96%，环比上涨74%，这一组数据被很多人拿来作为北京楼市暴涨、全国楼市复苏的重要证据。

但事实上，今年2月份北京楼市成交量大涨，主要在于对比的基数不同。从同比来看，去年2月份北京还处在春节长假，而从环比来看，今年1月也是春节长假，所以，以今年2月份的数据和两个

春节长假做对比，成交量自然就会出现暴涨。除北京外，其他很多城市的成交量反弹，也基本上是和春节的数据做同比和环比，由此得出成交量暴涨的结论。

春节过后，北京的二手房一般都会出现一个小高峰，如果同样按照春节后的一个月来做对比，今年2月份，北京二手房成交量为15315万套，去年3月份，也就是春节过后的一个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为15771套。而2021年3月份，北京市在春节后的第一个月成交量更是高达22172套。所以，如果同样以春节后的数据来做对比，今年北京的成交量和往年相比甚至还有所下降。

今年北京2月份的楼市成交情况，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相对去年四季度以来的低迷出现了反弹。去年10月份以来，北京的月度成交额平均不到1万套，今年2月份的成交量达到1.5万套，开始恢复到一个相对正常的水平，这样的成交量，远远算不上报复性反弹。

虽然部分城市的成交量上升，但暂时还没有带动价格明显反弹，说明当前楼市买卖双方的博弈都还比较谨慎，远没有进入到卖方市场，重新回到卖家随意涨价的时代。

楼市近期的成交量反弹主要受益于贷款利率下降等刺激政策，从更长期来看，房价能否上涨，最终还是取决于楼市的供需。从供给层面来看，中国住房已经告别了短缺时代，20年前户均不到一套住房到现在户均1.1套住房，虽然还算不上严重过剩，但至少已经不再短缺。最近几年，国内楼市的库存面积也在逐年增长，去年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为5.63亿平方米，比上年增长10.5%，其中住宅待售面积增长18.4%。而从需求层面来看，由于中国经济逐渐告别曾经的高增长时代，而民众收入基本和经济增速同步，这就意味着民众收入的增速也会随经济大盘而放缓，对楼市而言，也就意味着购买力不如以往旺盛。而从更长期来看，人口负增长，对中国楼市的未来是更深层次的制约。

对中国楼市而言，短期之内或许还会出现成交量活跃，但想要像以前一样带动价格大幅上涨，可能性越来越小。当然，从中国经济的角度来看，也并不希望看到房价再一次暴涨，这将给经济带来更多麻烦和风险。

从开发商的角度来看，房地产市场是否开始复苏，主要体现在开发商是否积极拿地，以及增加房地产投资规模。

从去年来看，由于楼市持续低迷，很多开发商都不再拿地，去年的土地出让金同比下降了23%，房地产投资规模也大幅萎缩，去年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同比下降了10%。

那么，这一轮楼市成交量止跌，是否将回暖传导给了开发商呢？至少从目前来看，开发商层面还没有太明显的反应。按照中指研究院的数据，今年1月份，全国300个城市各类用地出让金为809亿元，同比下降40.99%；成交楼面均价为1036元/平方米，同比下跌15.91%；平均溢价率为2.73%，较去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全国主要地级市供应土地254宗，供应规划建筑面积为1692.8万平

方米，同比下降48.24%，环比下降10.07%。

至少从前两个月来看，开发商的心态还是比较谨慎的，还不敢像以前那样大手笔囤地，这也说明，对于当前楼市的回暖迹象，很多开发商抱着观望的态度，并不敢轻易认为楼市的新一轮行情已经到来，所以，对很多开发商而言，想要重新开始积极拿地，以及大规模投资，还需要看到楼市回暖的更多证据。

从历史上来看，我国的房地产市场经历过两次大规模刺激，第一次是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国内房价大幅下跌，有关方面对房地产救市；第二次是2014年，楼市有两年多时间持续低迷，有关方面再度对房地产救市。这两次救市的结果，均引发了房地产价格大涨，也在2016年引发了房住不炒政策的出台。

去年四季度，我国对房地产启动了第三次大规模救市，并且将房地产重新视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一轮救市最终会给房地产行业以及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春节的楼市止跌只是一个开始，真正全面的影响可能会在若干年之后才能慢慢显露出来。■

生活需要读书，
《读书》丰富生活



读书
DU SHU
3
2023
March

总编辑：李洪福
副总编辑：李洪福
主编：李洪福
副主编：李洪福
执行主编：李洪福
编辑：李洪福
校对：李洪福
设计：李洪福
印刷：李洪福
发行：李洪福
地址：李洪福
电话：李洪福
网址：李洪福

《读书》2023年第三期目录

强世功 全球化与世界帝国

刘思达 法律帝国主义的末日之歌

傅瑾 练功比「学文化」重要

张振涛 罗姆人对小提琴音乐的贡献

黄博 肖像何以政治？

魏斌 「慕容」的歌谣

杨稚梓 兄弟之哉

短长书 疫情期间的研究与思考（钱理群）·学术批评中的个人感情（丁波）·蝶恋花：探花及弟及其他（朱万章）·「本科」与宋代科名的品位化（黄承炳）

王丁 李鸿章与李希霍芬

陈彩虹 经济世界和经济学的世界

陆薇薇 女性能够思想吗？

李钧鹏、张志强 成为前任：作为社会过程的分手

品书录 当我们谈和纸时，我们谈些什么（周菲菲）·以文叙事，见微知著（马汝军）·亦真亦幻的近代中国家庭革命（张雯欢）

罗志田 携手那朵孤独的荷花

王路 王树先生与「象思维」

陈晋 一个人文学者的田野断章

李旻 山川之间的三星堆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视觉中国 供图)

绥中货车司机涉疫案再审进行中

记者·魏倩

距离递交再审申请已经过去两个月，本刊在绥中县人民法院得到的回应是“正在走程序”。

元凶

见到贺宏国的时候，他刚从屋外捡柴回来。3月中旬，辽西平原上远山近树仍是光秃秃的模样，午后阳光稀疏地照进来，还不足以温暖在炕上午睡的女儿和狸花猫，见他回来，妻子揭开大锅，开始烧柴做饭。

他的一身打扮就算放在捡柴的人里也称得上

简陋：蓝色劳动服袖子上的补丁崩了线，裤子上都是土，拉链是坏的。贺宏国满脸髭须，短发花白，看见有人来，一张阔脸上露出谦卑的笑：“来啦？屋里坐吧。”热情里带着尴尬——说是捡柴，刚刚过去的三个小时，他其实是躲记者去了。

在辽宁省绥中县，贺宏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2022年1月25日中午，他和姐夫韩东开着货车返回绥中过年。返乡后的第二天，他们回乡途经的绥芬河市暴发疫情，十天后，韩东的表弟被发现为绥中县的第一例新冠患者。因为返乡后没有报备途经绥芬河市的行程，贺宏国和韩东被确认为引发绥中新冠疫情防控的“元凶”，半年后法院



左图：货车司机在高速路口疲惫等待

右图：新冠疫情期间，对大货车的消杀成为常态

开庭，他们被判定“拒绝执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引起依法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传播，后果特别严重”，分别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这是迄今可查的个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公开案例中刑期最久的一例。

判决书和相关新闻通报里，还提到了此次疫情传播“后果特别严重”的具体细节：感染183人，隔离7865人。全县判定34个风险区、管控区和密切接触者区，绥中县财政支出各项疫情应急处置费用1.55亿元。

“真的太重了。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提起判决结果，贺宏国仍然眼里泛泪。他2022年2月8日作为“密接”被拉入隔离点，结束隔离后即被公安局“监视居住”，半年后开庭判决，看到刑期，“当时就眼前一黑”，觉得人生就此结束。更让他意难平的是，就在拿到判决书一个多月后，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发布针对新冠疫情的“新十条”。一个月后，国家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正式实施“乙类乙管”，最高人民法院等五部门联合出台《关于适应新阶段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依法妥善办理相关刑事案件的通

知》，规定对违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预防、控制措施和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的行为，不再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定罪处罚。全国不少正处于侦办阶段的案件都撤案处理，这给了他希望。

“我们就是看放开了，就想是不是可以申诉看看。”贺宏国语气带怯，不敢直视来人，说话时不知从哪儿找到一截卫生纸，捏在手里搓成条，纸屑簌簌落在地上。2023年1月3日，元旦假期结束，他和韩东托了一个曾经在法院工作过的熟人，到绥中县人民法院提交了再审申请书。拍了拍身上的卫生纸屑，他站起身来问我：“你觉得能改（判）吗？”

“拴车”

从贺宏国所在的加碑岩乡往东行70公里，就能抵达绥中县城。在城北的六股河大桥上，你必须十分小心那些“大车”——大红色的解放“勾六”“悍V”、银色福田“欧曼”、亮绿色的一汽“凌河”，带着十余米的车挂隆隆驶过，扬起灰尘、煤烟和柴油味——这座始建于1979年的六车道跨河



（蔡小川摄）

狭窄的车头是司机在旅程中唯一的活动空间

大桥是国道京抚线的一部分，也是绥中县接入全国高速路网的最主要通道。2021年之前，每天平均有19460辆车从这座桥上驶过，其中近四成是重型卡车。

如果不是因为那场风波，贺宏国的那辆咖啡色车头的“解放”仍会是其中一员。2019年，他凑钱和一位同行合伙买下这台连车带挂13.5米长的“大家伙”，产权一人一半，挂靠在后者所在的车队。2021年起，姐夫韩东受车队雇佣成为这辆车的司机，两人开始搭伙。

在绥中，像他们这样的人被称为“拴车的”。地处山海关入口，绥中交通路网发达，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是联通华北和东北的物流中心，2010年行业达到繁盛期，营运货车总量占葫芦岛全市货车总量的50%以上，市区一半以上人口从事货运行业。“那时候听说你是开车的，给你介绍对象的人都排长队。”不止一位司机用这句话佐证他们彼时的荣耀地位。

加碑岩乡村民贺宏国和韩东的驾驶史都是从

那个时候开始的。此前，这对姻兄弟一直拥有类似的命运。和村里大多数男丁一样，他们十五六岁还没读完初中就出门打工。贺宏国身材高大，为人腼腆，被招入市里的铁路公司，主要是铺轨、背沙，工资30元，日结。四五月工期结束后，再在工地上另外找活儿；韩东为人要更机敏些，他在沈阳附近的一家私人铁厂里学到了炼铁的手艺，从此辗转在东北、河北和山西的各个小铁厂，炼制“除了硅、碳、锰外没有一项合格”的粗制钢。2010年前后，二人都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日子过得紧张起来。污染严重的小型钢厂陆续被取缔，沙土工赚得实在太少，回家找不到活儿干的韩东听朋友讲起“拴车”的经历，决定自己也去考个驾照。

刚学会的时候都是给别人的车当司机，一年到头跑下来，车主按月发工资，开始是五六千，慢慢涨到八九千，收入不像行业里其他人那么高，但“靠技术吃饭”，胜在省心。贺宏国有时候一年只跑10个月，剩下的时间继续打零工。加碑岩

乡地处县里西北角的山区，是离县城最远的乡镇，为了给孩子找个好地方上学，他俩把父母留在乡里，陆续在城里租了房子。孩子上学，女人顾家，男人跑车——贺宏国的妻子韩迎春告诉我，直到现在，这仍是当地最基本的家庭分工模式。

但在那个滚动在车轮上的“男人世界”，还有一个隐秘的上升阶梯：当司机一攒钱买车一出车赚钱一雇人开车。阶梯的末端指向尚不明确，不过大家都知道，绥中城里那些大汽贸城和大车队的老板，开始都是靠“拴车”发家的。在车队司机口中，还流传着更精彩的阶层跨越故事：当地有能人通过开车、养车赚来的钱进入商界、政界，最终彻底摆脱了司机身份，成了“人上人”。

两兄弟里，还是机敏的韩东先迈出这一步。2016年，他和朋友凑了37万元买了一辆二手“前四后八”，准备自己当老板，两人合伙开车，不用给司机开工资。朋友联系好固定货源渠道，专门从东北往成都拉“冻货”，载着成吨的鸡腿鸭腿，一个月跑两趟半，反复斜穿整个中国。但车刚开没几个月，2016年9月，“史上最严限载令”施行，中国使用了12年的货车超载超限标准吨位全线降低，“治超”前，韩东开的这种9.6米货车原来能拉25吨货，之后只能拉18~19吨，去掉车贷、油费、保险费，跑一趟的纯收入还不到原来的1/3，只能勉强把账目平掉。一年后见不赚钱，他俩就把车卖了，韩东回到车队继续做司机，好在折抵车损后，没有亏本。

沉默寡言的贺宏国则在三年后才实现了自己“拴车”的梦想。2019年年中，他拿出自己的多年积蓄，和城里车队的一位朋友凑钱买了辆新车。此时，韩东曾经拥有过的那种“九米六”已经基本退出长途货运的历史舞台，停在县里各大汽贸城门口的畅销货成了3米多高、4吨重的大型牵引车头，再配一个十余米长的半挂车斗，办完车险等手续，一套下来需要60万元。贺宏国出了30万元，拥有一半所有权。他的计划很简单：自己出车，不用付司机工资，这辆车每个月大概能给自己赚两三万元。刨除生活开支，如果一年结余10万块，三年下来就能收回成本。

也是那一年，韩东把十年来开车攒下的钱拿

出来，贷款在城北买了一套80平方米的二手房，离两个孩子上学的城郊九年一贯制学校不到一公里。“运费行情不行了，买车太担风险。”他已经放弃了养车的念头，安于辗转在不同的车队、驾驶着不同的车、与不同的搭档走南闯北的日子，只要每个月能拿回9000元工资，还上房贷，养活孩子就行。

噩梦

他俩谁都没想到，迎面撞上的会是新冠疫情。

2020年4月底，贺宏国刚开上不到一年的新车被封在了高速公路的服务区里。韩东则在一趟去新疆拉橘子的途中被堵在卡口排了整整5小时的队。整排大巴把路口封实，一一检查司机手机里的健康码和核酸证明，车流缓缓移动，他全程没有下车，也没有休息。

他们的绥中同行，为另一家大车队开车的司机刘波遇上过更烦心的情形。2021年，他去河北拉一车玉米到福建，30吨货出库消杀就用了两个半小时，“消毒水把苫布都喷花了”，可一路辗转两天三夜到了站，交警在高速路口一看是河北来的货车，就让他们马上折返，原来他们离开的地方已经封城，他只好乖乖接受检测、隔离，一趟下来，车主还亏了2000块。

尽管经常遇上疫区路口封堵延误行程，到了取货地点不能下高速，每到一个地方都得出具核酸证明等种种麻烦，好在直到2020年底，运费还没有大受影响。贺宏国过完年算账，发现养车收入虽然不像当初预期的那样理想，但好歹“没亏钱”。2021年初，韩东受车队雇佣，成了他的新搭档。两人合伙开车，最大的好处是省出休息时间，可以多装水果、蔬菜等减免高速费的新鲜货物，一上路就不再停车，一个人困了就换另一个人开。因为实在太累，在车上，这对姻兄弟基本不说话，不聊天。

2022年1月25日，正是北方的农历小年，也是韩东和贺宏国出门跑车4个月后首次返乡。二人特意从武汉接了一单往东三省跑的货单，先到牡丹江，再到绥芬河，然后是东宁、锦州，四天三夜的行程。车里先是包心菜，后来变成胡萝卜、

玉米，到绥中才终于空下来。两人掰着指数到家的日子，车速也比往常快了些。前一天晚上还没到最后的送货地点锦州港，韩东就提醒妹夫记得做“返乡报备”。填写返回地时，俩人没多想就都写了最后的返回地是“锦州”，略过了途中经过的其他4个城市，“我们没多想，都觉得从哪儿回来就从哪儿报备吧”。

进城、还车，二人各自返家，约定过完春节再继续出车。谁料情况陡转，两天后，也就是27日，韩东看短视频时得知绥芬河市暴发疫情：26日，当地报告新增本土病例15例，27日关闭全市营业场所，启动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韩东把消息转给贺宏国，两人心怀侥幸，“是我们到家后那儿才有的疫情，应该没什么事”。2月2日，大年初二，韩东在县医院查了核酸，见是阴性，也就放心地去同乡的妻弟家“回门”，直到3天后，他的妻弟王某被查出核酸阳性，成为绥中县首例被发现的新冠病毒感染者。

庭审中，他们返乡后的种种举动成为案件争议的焦点之一。究竟是不是故意隐瞒行程？庭上，韩东和贺宏国都说自己不是故意的。上报“锦州”是真的觉得那是“返绥地点”，到家后得知绥芬河有疫情而不上报，两人都承认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时还没有经历过什么‘封城’，不像后来弄得那么严格，我是真的没有那个防范意识！”

另一个说不清的问题是溯源过程。庭审现场，韩东的辩护律师张盛光提出，韩东1月25日返回绥中县，2月10日才检出病毒阳性，距离他从绥芬河疫区返回已经17天，并不能合理排除其返回绥中县后感染的可能。韩东记得，自己在法庭自辩时也曾提出这一疑问，请求“把我体内的病毒抽出来鉴定一下，看看到底是在哪儿染上的”，“但他们说做不了这种鉴定，我之前没得是我体质好”。

贺宏国则对“西安”耿耿于怀。他说，2022年春节前，县里曾用大巴车从高速公路出口接回一批在陕西西安铁路上干活的工友，其中也有不少加碑岩乡的村民，过年前，他和妻子在街上见到过他们，大家都没做防护措施。他发现，除了自己的亲属，后来确诊病例中还有很多是这些人。

尽管心存疑惑，两人最终决定认罪。“没办法，

谁让摊上这个事了。”韩东说，起诉阶段，他们曾被叫到检察院去签认罪认罚具结书。“检察官问我，认罪不？我说认。又问我，认罚不？我问怎么罚？检察官说量刑3年。我问，实刑还是缓刑？检察官说实刑。我感觉有点多，就没签字。”法庭认罪时，法官也问了贺宏国同样的问题，他记得自己的回答是：你们说我有罪我就有罪，“然后人家说我不能这么答”。

法庭外，绥中县城已经“冻结”了整整半年。一位当地的辅警告诉本刊，2月5日出现疫情当晚，绥中县就启动了“一级警戒”，六股河大桥和进出高速全部关闭，立即开始全员核酸检测。韩东和贺宏国所在的加碑岩乡王家店屯，全屯90%的村民都被分批运送到葫芦岛市的隔离点进行集中隔离。作为感染“元凶”，韩东的隔离流程也称得上万无一失，他先是在锦州的传染病医院治疗了14天，又被转运到葫芦岛的康复中心待了8天，出院前又被检出“指标不正常”，于是在葫芦岛市的传染病医院隔离18天，最后是在东戴河的康复中心待15天。等隔离全部结束回到绥中，已经是春天了。这期间，绥中县官方发布疫情问责通报，对包括上至县卫健局领导、下至村网格员的21人，给予诫勉谈话、党内警告、党内严重警告等处分。4月23日，公安局上门，给韩东送来一份监视居住通知单。

接下来的日子，韩东想不起是怎么过的。心里装着事，他整夜整夜睡不好，总是突然就开始发呆，10月开庭前再见到妹夫贺宏国，见对方和自己一样已经白了一半头发。听妹妹说，贺宏国和他一样，也是整天在炕上躺着发呆，村里有人叫也不出门。城里已是一片萧条，他们偶尔出去一趟，见人多的地方就自觉躲开，“怕见人，跟得了什么病似的”。

没有请律师，庭审时来的两位是“法院指派的”，前后只见过两面，其中一次是签委托书。开庭那天，两家人都去了，但还是因为“疫情管控”，谁都没被准许进入法庭，韩迎春和嫂子只好陪父母在门外坐着等。

拿到判决书已经临近10月底，两人都还抱着一线“坦白从宽”的希望，想着顶多一年半载也



如今，“下车吃饭”已经成为司机货运旅程中的奢侈

就回来了，但在大门口翻开最后一页，眼见判决书上写的刑期是“四年”。我当时就把判决书合上了，不知道自己是

滑落

2023年3月4日下午，我接通韩东的电话，那头儿气喘吁吁：“我正背着沙呢，一会儿说啊！”后来，他告诉我正在做自己过去一年里的第一份“工作”：朋友的工地缺人，让他去顶两天班，上午一个人灌了五车沙子，下午用水泥和好砂浆，砌了个三室一厅的水暖地面，铺完红地砖，两天赚了400块。

父母都已年近七旬，大儿子正在读高三，小女儿刚上初一。知道家里出了事，两个孩子回来都静悄悄的。身份证和驾驶证都上交了，没法出门跑车，每个月还有2000元房贷，家里的日子一下子紧张起来。儿子甚至提出不想继续上学，要出门打工给妹妹挣学费，被韩东给劝了回去。妻子过去偶尔在县城做家政，给装修完的房子打扫卫生，现在成了全职工作。两口子当着对方的面，谁也不提“那件事”，韩东几次见她偷偷抹泪，也没出声。

贺宏国的情况更糟糕。车跑不了了，但车贷还没还完，摆在那儿每天折损近1000元。儿子在邻县读大学，县城里的房子要交房租，实在负担不了开支，他们一家人搬回了加碑岩乡的老房子，女儿的学籍也转回了村里。2022年年中，合伙人提出把车卖掉。贺宏国没再去城里看那辆曾经承载自己生活希望的车，他说自己拿回车钱一算，前两年约等于白跑，最后还是亏了。

2023年3月一个有风的下午，贺宏国的妻子韩迎春坐在炕头向我讲起这所房子的历史。两人结婚时住的瓦房十多年前就塌了，他们和另外一家人盘下村口这间供销社的空房，改成民居。房前就是村口的小河，屋后是一块地，养了狗和鸡。如今，除了出门上学的儿子，全家三口挤在左边一间厢房里，走廊那边的一间则住着贺宏国的父母。2022年那次疫情导致的全乡隔离，他的母亲住在隔离点单间里没人照顾，不慎摔伤了股骨，做手术又花了三四万块。

这个动作麻利、声音洪亮的女人自嫁进门来就是家里的主心骨。丈夫离家打工的二十多年，一直是她在料理着家里的一切，照顾他们的孩子、父母、玉米地，出事后，那些贺宏国不敢接的电话，都要由她来回。村里乡里上门训诫，也是她出面应对。在她眼里，丈夫老实勤恳，沉默寡言，一门心思只知道开车，每年在家的日子不超过20天，两人平时只能通过微信发定位报平安，有时候路过绥中，来不及说两句话，拿上换洗衣服就得走。她想不通，为什么折腾了几年，家里的日子反而越过越倒退了呢？

她的丈夫贺宏国知道，滑落并不是从2022年才开始的。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开车上路的情形，那是2014年，他40岁，拉一车砂糖橘从绥中去哈尔滨，一路上看什么都新鲜，在高速上开到100公里/小时，觉得整个人都“打开了”。偶尔和韩东聊到车，两人都挺兴奋，比起他们之前做过的活计，开车干净、赚钱不少，还能到处走走，“就当旅游了”。那时，他们能整整开24小时，从不觉得累。

但疲惫感很快找上来，最先出问题的是胃，因为饮食不规律，他们都患上了胃病，出车得随身带药；接下来是腰，贺宏国到第二年就不能继续“长”在车上了，他得了颈椎病。

疲劳驾驶是潜伏在旅程中的野兽，最累的时候“用冷水拍、毛衣针扎都不管用”。刘波所在的大车队里，流传着司机开着车把脏衣服臭袜子放在驾驶台前醒神的笑话，他还记得自己有一次困极了，滑进服务区就睡，车没停好，保安伸手到车里打耳光都没把他叫醒。他说，在这样疲惫的状态下行车，“每年绥中司机都要在外面‘送掉’

两三百人”。

比起开车犯困，更让车队里这群十年以上驾龄的司机们困扰的反倒是那个实时监控疲劳驾驶的机器。上车后，司机要把实名制的行车卡插进“北斗”，驾驶4小时，车卡会提示司机应立即休息，否则就要扣分，经常疲劳驾驶，车辆保费也会随之上涨。“谁不想休息，可是你到服务区看看，不用说大车，就是小轿车，我问你，你能进得去吗？”刘波说。无法进入服务区，就意味着必须下高速停车休息，可这样一来，运输时效就无法保证，像韩东曾经开过的那种专门运输快递的货车，每迟到1分钟，就要扣掉运费5元。

就算没日没夜赶着把货运到，在站点也要有些技巧才能顺利过关。有时候对方要求司机帮忙装卸，不及时就要扣运费。还得打点好进场保安和卸货工，买瓶饮料、塞包烟，否则对方找点借口使绊子都是常有的事。有一次韩东开着货车往武汉拉冻肉，因为没给装卸工买早餐，对方故意卸货延迟，天气炎热，货化得快，他急得跳脚。到了库房，对方非说他们的货缺数，一箱三百五百，整车算下来一趟活儿等于白干。他那天天气急了，还报了警。

对于货车司机们来说，忍受疲惫、风险、管制的动力只有一样：超出一般打工的高回报。以前，在“没什么产业”的绥中县，很少有工作能像货车司机一样，每月固定有至少七八千元的收入。但现在天平倾斜了，那些靠超出旁人的勤勉挣一口饭的司机们发现，自己的努力再也得不到原先的报偿。

在韩东的记忆里，在他买下二手车的2016年，大部分货车车主都雇得起两个司机，很少有“夫妻车”，更没有人随车带锅碗瓢盆，但近几年，司机们慢慢舍不得吃服务区的快餐，改在车上自带电饭锅和小冰箱。一人开车一人做饭，全程不用下高速。“拴车”的车主们也越来越倾向于自己开车上路，亲自支付车贷、油费、保险费。

运费一直在降——多的时候每年能降10%——对此，每个司机都有自己的归因方式。刘波的一位同事认为问题出在近年来涌现出的互联网货运平台，他怀念过去各地仍有信息站的年

代,“那时顶多单给一笔信息费,可现在这个手机软件一出来,它把你算计到骨头里了,比如你去的路上感觉能赚个5000块钱,再回来拉货的运费就只让你保个本”。旁边一直在抽烟的司机还提到政府建设的物流园,认为这是规划问题,市里的周边行业过于零散,很少有真正符合标准的配套和维修公司进驻其中,整个行业都是各赚各的钱,“谁也不关心拴车人的死活”。

“有本事的人”都早早脱身。2010年,绥中县还有3万余人从事汽车运输业,到2022年只剩下1.5万人。“现在在绥中,干什么都比‘拴车’强,干维修的、卖二手车的、弄贷款的、做保险的,连挂苫布的都发了财,都围着车转,可就是车不赚钱。你说奇不奇怪?当然,有了疫情,大家都拉倒。”刘波总结。2022年,他工作的店面关了半年多,车队里的司机都被封在高速上,没有货可拉,还得给司机开工资,每辆车每天损失近1000元。车队的一位司机掏出手机展示了那年6月流传在绥中“司机圈”里的一条短视频。画面里,一位司机把车停在锦州的高速路口,跪在地上哭诉:“我爸的病危通知书下来了,我核酸做了,我伤到谁了,我回不去啊……”

我问,那他最后及时回家了吗?在场的司机谁都不知道。

等待

到3月28日,韩东和贺宏国的第二份“监视居住”通知单就该到期了。去年10月收到判决书后,“因为疫情原因”,他俩并未被立刻收监。对韩东来说,这既是幸运,也是一种不幸。幸运的是他们还能在家里和一家老小过个春节,甚至可以出门背几趟沙补贴家用。不幸的是,他依然无法确定四年刑期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是否还会开始。

为什么当时不上诉?我问。贺宏国说听别人讲上诉会判得更重,他并不知道上诉不会加刑。韩东的理由更多是一种被生活反复锤击后的无奈。他告诉我,2015年他曾因为“过失损坏军事通信罪”被判刑8个月。这个拗口罪名的来由却很简单:他开着一辆老板的车去哈尔滨拉货,不知道车上

装了专为逃避公路管制的信号屏蔽仪,同时也屏蔽了当地部队的军事信号。“你说上诉有用吗?”他觉得自己已经习惯了,也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一切。他拒绝接受律师的帮助,只反复固执地说一句:“相信国家,相信法律。”

不过,2022年12月7日,优化落实疫情防控“新十条”发布后,绥中县的解封还是给了他们希望。贺宏国的家里终于恢复了以往的喧闹,女儿在老房子的玻璃上贴了张“年年有余”的剪纸,韩东正在读高三的儿子也终于恢复了学习状态。在整整一年的等待和不甘后,他们终于决定递交再审申请,尽管依然没有请律师。

2020年2月,“两高两部”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后,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海军和检察官高爽在《检察日报》上撰文,认为涉疫情犯罪的因果关系比一般刑事案件的因果关系更难认定。因为“一般刑事案件中,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而病毒传播过程无法感知”,疫学因果关系理论仅根据流行病学原理作出高度盖然性的推定,尚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与疑罪从无原则不符,可能导致扩大处罚范围。

2023年1月8日,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罗翔在自己的公众号“罗翔说刑法”上提到该案时评论,鉴于一审判决已经生效,《关于适应新阶段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依法妥善办理相关刑事案件的通知》的出罪规定(把有罪判为无罪或重罪判为轻罪)就和他们没有关系了,但司法机关可以为他们积极寻找减刑和假释的机会,因为“有温度的司法应该在法律变更之后,积极地进行补救,而不是无动于衷”。

距离递交再审申请已经过去两个月,本刊在绥中县人民法院得到的回应是“正在走程序”。截至发稿前,韩东和贺宏国还没有等到法院的回应。3月7日深夜,韩东去帮朋友的货车卸货,躺在车头铺位上,他和我在电话里谈起再审后的计划,儿子马上就要考大学了,他想继续跑车供他到毕业,之后他就去工地打工,再也不瞎折腾了。贺宏国却再也不想碰车了,那天送我离开前,他轻声嘀咕了一句:“开车伤心了。”



当地的地形、植被情况极其复杂，搜救人数超过千人

云南双胞胎失联身亡

记者·吴淑斌 陈银霞

再回想整件事情，村民们很难说清楚有哪个环节出错了，最后都不免落到一种“无法避免的意外”的叹息上。生活在大山里，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更艰苦和危险的命运，即便是孩子，或者说，尤其是孩子。

孩子失踪之后

在新塘村红栗坡组，很难只靠房屋的外形找到杨霜的家。这是四五年前政府统一修建的一片小楼，当时，红栗坡组的村民们依山而居，有水土流失的风险，政府启动了搬迁工作，将四五十户村民统一迁居。崭新的小楼粉刷着白墙，屋顶用青瓦做成了人字顶的斜坡式，还有飞檐翘角。每套房屋有上下两层，带一个小院子，使用面积在120平方米左右。从高处往下看，四四方



搜救人员用无人机、搜救犬、皮划艇等开展地毯式搜寻，整个搜救区域达30余平方公里。

方的院子边上嵌着另一个一层高的小屋，按照白族人的习惯，厨房兼餐厅是独立于起居室之外的。

村子里，大多数人习惯开着门，上了年纪的老人会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抽烟、晒太阳。从门口路过时，能看到厨房的外墙上挂着好几只自家腌制的大火腿，走近了还有一股咸香味。这是节日味道的残留。在新塘村，家家户户都养了猪，冬季杀猪、腌火腿以迎接春节和元宵节早已是惯例，连七八十岁的老人也说不清已经流传了多少年，但一种共识是，“挂起火腿就是要热闹起来了”。

但杨霜家一片冷清，丝毫没有热闹过的痕迹。院子里停着一辆溅满泥点的旧摩托车，墙角随意地倚靠着一把锄头、一把镰刀和一个农药喷壶。唯一有些生气的是地上的两小盆多肉，其中一盆不知何时滚倒在地上，洒落出少量的黑土。和其他人家不同的是，厨房外墙空荡荡的，没有悬挂火腿。

村里人都清楚地知道降临到这个可怜家庭的厄运：2月4日，杨霜一对12岁的双胞胎儿子在山上放羊时走失。一场大搜救很快铺开，包括周边村庄的村民和消防队、救援队在内的1000多人整整搜救了13天，不幸的是，2月17日，人们在村庄附近的水库溢洪道消力池内发现两具男尸，

经家属辨认，正是失联的双胞胎。

42岁的村民李宣磊就住在附近，在他的记忆里，从孩子遗体被发现的那天起，杨霜家的大门就时常紧闭，他们也很少再见到一家人露面。唯一能和他们碰面的机会，就是夫妻俩骑着摩托车出门和回家的片刻。“应该是去公安局打听进展。”李宣磊猜测。官方通报中提到，公安机关还在进一步调查两个孩子的死因。孩子的死亡是意外还是刑事案件，目前尚没有定论。但和不少村民一样，李宣磊相信，事情没有网上猜测的那么复杂，大概率就是一桩意外。夫妻俩整日忙碌地出门往返于村庄与公安局之间，更像是为了填补生活里突如其来的一片空白，“留点盼头和念想，想多给娃娃做点事情，好像他们还在一样。要是这个调查也结束了，两个娃娃就彻底没了”。

李宣磊清楚地记得孩子丢失的日子：2月4日，立春，元宵节的前一天。春节的气氛还没完全散去，年轻人尚未外出打工，孩子们吵闹着，偶尔会放几挂鞭炮。下午5点多，李宣磊家正在做饭时，杨霜匆匆走到门口，探头询问家里的两个男孩子是否在他家。李宣磊回答“没有”，杨霜又匆匆地去了下一家。在村子里，孩子们贪玩、晚回家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李宣磊没有太放在心上，况且，

“两个孩子平时挺听话，想来不会太晚回去的”。

晚上7点，天色完全暗下来之后，村里的干部给李宣磊打电话，让他带着手电筒到村委会门口集合，帮忙一起找孩子。“坏了！”他心里想，“这么晚，不可能是贪玩，小孩肯定出点什么事了。”路过杨霜家时，李宣磊特地进去看了一眼，只有杨霜15岁的大女儿在家，厨房里“冷锅冷灶摆着”。他后来才知道，姐弟三人在山里放羊，姐姐要照顾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羊羔吃奶，嘱咐弟弟们看着其他的羊，不要吃了别人家的庄稼。但两个弟弟顾着玩耍，被姐姐批评了几句，赌气跑开了。姐姐放羊回家后，才发现两个弟弟还没回来。

村里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那天晚上，上山山下的几个村都出了人帮忙寻找。李宣磊搜索的主要区域是孩子们放羊的那片山，与杨霜家只隔着水库。山的低矮处是裸露的黄土和零星几棵树，还有几间村民用作羊圈的小木屋。一片漆黑中，他们打着手电筒，一路大声呼喊双胞胎的名字，又挨个儿检查了小木屋，都没有踪影。山区夜晚的气温骤降，不到零度，路上还堆着积雪和冰碴子，越往海拔高的地方走，树林越茂盛，林子里几乎没有明显的“路”。即使是在村里生活了几十年的山民，也不敢再贸然往上走了。

搜救

两个孩子忽然丢了，这是村里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就像是往平静水面投入了一颗石子，整个村庄都被搅动起来。那晚的搜救路上，有人猜测孩子在山里迷了路，越走越深；有人担心是不小心跌落到了山下的水库里，“要去水里找人”。还有人根据网上看过的新闻，提出可能是被人贩子拐走了。但这个想法很快被其他人否定了，“从我们这么偏远的地方拐卖小孩，要带出去本身就是件难事了”。

准确来说，新塘村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下辖的云龙县长新乡。这是一段漫漫长路，从大理州到云龙县将近140公里，没有铁路交通，公共汽车要开上两个多小时。云龙县城建在群山之间的一小块平地上，接近县城时，会有连续11公里的

下坡路。一下汽车，就能看到县城的马路两旁停着许多三轮摩托车，皮肤黝黑的司机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招呼，“20块钱！诺邓诺邓！”这个小县城里，更有名的是距离城区6公里远的古村诺邓，2017年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拍摄了诺邓火腿之后，古村成为一个热门旅游景点。

不过，这种热闹和新塘村的关系不大。从县城去往村庄，每接近一步，偏远感就会加深一分。长新乡距离云龙县城35公里，小型城乡客车沿着蜿蜒的公路行驶一个小时到达乡上后，才是真正艰难的一段路。长新乡的山地面积占95%，村寨主要分布在几个东西走向的大峡谷中，最高的地方海拔有3000多米。从长新乡到新塘村，还有18公里路程，乡上不再有公共交通去往村庄，上下山的村民只能联系顺路的私家车。许多山路没有做硬化，坑坑洼洼，下雨时一片泥泞，晴天时尘土飞扬。一趟行程后，用湿纸巾擦脸，能抹下一层黄土。

这场寻找双胞胎的搜救，是许多人没有见过的“大阵仗”。2月5日元宵节，两个孩子失联后的第二天，长新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对媒体表示，乡政府里除了值班人员外，全部都参与了搜寻，“应急民兵、生态护林员和很多群众都参与了进来，邻县的公安也在协助一起寻找”。随后，省、州、县的消防救援队和其他民间救援队纷纷加入，最终组成了一支1146人的搜寻救援队伍，分成24个小组，在走失地周边利用无人机、搜救犬、皮划艇等开展地毯式搜寻，整个搜救区域达30余平方公里。

那几天，乡镇的旅馆全都住满了外地过来救援的人，每天一早，长长的车队就上山了。一位开小面包车的司机说，自己曾经从乡上的商店里拉了一车老板捐赠的物资，作为干粮分给山上的救援队，有10袋大米、200箱核桃乳、200箱方便面和若干火腿肠。“好几个村都杀了猪和羊，把肉剔好送下来，做大锅饭吃。”一位年过六十的村民告诉本刊，熟悉大山的本地村民充当了救援队的向导，每天早上8点出头，大家在水库边的指挥部集合后进山，一直到晚上7点多才结束行动，“一走就是一天，腿疼，休息时间就是中午吃饭那时候”。

大理市山地救援队的郭晓伟带着7名队员参



(插图：老干)

增加了搜救，和20名消防救援队员一起搜索一片山区，从海拔2000米左右一直搜到了3000米高的地方。虽然经常在大理苍山开展野外救援，郭晓伟依然很少见到如此复杂的地况。“这是一整个大山群，一望无际。满山遍野到处都是羊肠小道，四通八达，四五个路口在一个地方交会，哪个方向都可以走人，队伍只能分开去找，越到后面人就越少，这对救援队自身也是不安全的。”郭晓伟说，救援队的最低限度是两个人结伴，不允许单人行动，而且必须在对讲机信号覆盖的范围内。山上植被茂密，许多地方被长满刺的荆棘丛阻断了去路，“连野生动物都很难过得去”，他们就用扩音器呼喊。天黑之后，救援队伍下撤，由无人机监测，经验丰富的护林员还会站在一片区域的制高点上，观测是否有生火的亮光。

一开始，人们期待着这些呼喊能得到回音。但找的时间越长，希望的火苗越是暗淡。“这种专业救援队都不敢走的地方，小孩子进去了可不就糟了。”李宣磊心里偷偷想。山里有许多悬崖，最

高处落差能达到四五十米，郭晓伟和队员无法下到悬崖下方，只能想办法迂回绕道，找到能肉眼观察到悬崖底部的点位，确认孩子有没有摔落、附近有没有遗失物品。有时候为了核实一个地点，就要花上两个小时。

另一个难点是，与城市里的搜救不同，救援人员能拿到的信息太少了。“两个孩子没有手机，没有信号可以定位，这里也不像城市里有监控，可以提供很多的辅助。我们只有家属提供的一些零碎信息，只知道他们最后出现在哪里，其他的全靠人力一遍遍去搜寻。”

人们怀疑的另一个重点区域是包罗水库。包罗水库修在两座大山之间的“大达河”上，大坝高69.5米，总库容1188万立方米，平时用作农田灌溉和乡镇供水。自2014年水库建成以来，村民们只听说过一起意外事件，是一位精神失常的女子在夜里不小心跌落水中溺亡。一位村民回忆，2月4日傍晚，就有人划着简易竹筏上了水面，但“水太深了，没用，什么都捞不到”。2月5日开始，

救援队划着皮划艇，用各种探测器在水库里反复搜寻，郭晓伟还曾带队沿着水库下方的溪流向下找，一路走到了长新乡。

家庭

孩子的遗体是在17号上午被发现的，就在水库下方用来减少泄洪压力的消力池里。住在水库边的村民李建军告诉本刊记者，一位村民最早发现了遗体，“浮起来时，两个孩子的手臂还是相互挽着的”。警察很快封锁了现场，李建军看到，“孩子妈妈踉踉跄跄来了，好几个人陪着，哭得可惨，搀着回去的”。李建军的妻子在一旁叹了口气，用白族话表达了对这个可怜女人的同情。

他们知道，杨霜已经是第二次承受失去亲人的打击了。提起这一家人时，村民们常常习惯用“孩子妈妈”作为主语来述说。这是个重组家庭，杨霜今年36岁，十几年前从一山之隔的洱源县嫁到了新塘村，和当时的丈夫先后生育了女儿和一对双胞胎，大女儿今年已经15岁。大概两年前，孩子们的父亲因病去世，继父从山下的村子过来上门，成为这个家庭的新成员。

这样的家庭组合，在小山村里并不稀奇。“我们这里，离婚或者死了丈夫的女人，哪怕带着孩子，也能很容易找到对象。”李建军说。而丧偶后招一个上门女婿，也是件必需的事情。这个深山里的传统村庄依然以农业为主，种地、放羊、养猪是人们的重要营生，都是些费人力的活儿。山区土地不如平原肥沃，大型机械也施展不开，只能常常靠人力翻土。玉米是最容易种的作物，但收购价只有每斤1块钱左右；单价最高的农作物是烤烟，种植和加工极其繁琐，村民们开玩笑，“家里没有五六个劳动力都不敢种”。每斤收购价在5块钱左右的白芸豆是个不错的选择，但也比玉米复杂得多，每年4、5月份松土后，得在地里按间距插上两米高的棍子，让芸豆苗沿着棍子往上蹿。10月份收成时，再一颗颗采摘下来。李建军估摸着，杨霜家还有三四十只黑山羊，“得赶到山上吃草，还要看着，不能掉到崖下，也不能吃了别人家的地”。

虽然经历了丧失和重组，但在当地人眼里，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都是个普通的家庭。唯一特殊的地方，大概就是拥有村子里唯一一对双胞胎孩子。双胞胎是12年前的国庆节出生的，“在当时是件大喜事，谁听了都高兴”。李宣磊还吃过他们隆重的满月宴。两个孩子如今上小学五年级，个子不到一米五，有点偏瘦，理着平头，露出饱满的大额头。一位嫁到外村的表姑赵茗则记得，两个男孩子有些调皮。她曾见过杨霜带他们步行下山，“一路上磨磨蹭蹭，走着走着就停在路边玩石头，他妈妈就停下来催一遍”。但这只是小男孩的通病，大部分时候，孩子是乖巧听话的，“帮着家里放羊、喂猪，有时还在别人家玩，一喊他们干活，就去了”。

但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寻人行动铺开，这家人不仅成了整个乡镇的焦点，也成为网络热议的话题。舆论试图为这对死亡的双胞胎找到一个确凿的“责任人”。15岁的姐姐最早被推上风口浪尖。由于继父对媒体提到过，双胞胎是被姐姐“打了一棍子”后离开，网上有了“三姐弟不是亲生的”“姐姐故意赶走弟弟”这类传言。李宣磊对此愤愤不平。双胞胎失踪那天晚上，他路过杨霜家时，记得15岁的小姑娘忍着哭声问：“叔，你看到我弟了吗？”后来，她甚至提出，要找到外婆家去，或许能沿路遇见弟弟——这几乎是一种绝望中的提议。外婆家与新塘村隔着一座山的距离，当时的山路还有积雪，两个12岁的孩子不可能独自翻越一整座大山走到外婆家。“小姑娘太自责了，急着想找到弟弟。”李宣磊和妻子担心，姐姐会“想不开”。幸好，寻人的那段时间，每天都有三个学校里的老师从早到晚在家陪着她。

继姐姐之后，继父很快成了下一个被猜忌的对象。虽然说法都没有根据，但这个家庭显然还处在死亡事件和传言的双重压力下。整个新塘村修建在山上，紧挨着水库，杨霜家在半山腰的公路拐弯处。屋外墙脚下零星散落着几个食品包装袋，是寻找孩子那几天，来来往往的人们遗留下的，至今还没有清理。敲门过后，杨霜疲惫的脸出现在门后。她的脸晒得黝黑，眼睛浮肿充血，头发随意地在脑后绾着。她用有些沙哑的声音温和地

拒绝再次回忆这场悲剧，但只是多说了两句回绝的话，就开始带上哭腔。她的丈夫穿着一件沾着枯黄杂草根的毛呢上衣，坐在厨房门口，双手撑在膝盖上捂住脸，始终一言不发。

无法回避的危险

再回想整个事件，村民们很难说清楚有哪个环节出错了，最后都不免回到一种“难以避免的意外”的叹息上。生活在大山里，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更艰苦和危险的命运，即便是孩子，或者说，尤其是孩子。

在山村里，十几岁的孩子已经算是半个劳动力，能帮着家里做不少事情。上山放羊、扯草，调皮时被父母和哥哥姐姐训斥，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赵茗记得，从八九岁起，父母下地干活，自己就在家帮着姐姐烧饭；年纪再大一些，她就需要独自放羊了。父亲带她上了两次山，给她比画一片避开庄稼地的小山坡，叮嘱“记着路”，遇到路窄坡陡的地方要绕着走。相比于在山里迷路，她更怕的是丢羊，“弄丢了羊的小孩连家都不敢回，肯定会被一顿教训”。

不过，和以前不同的是，教育如今被摆在了比劳动更重要的位置，这也是孩子离开大山最可能的途径。赵茗说，杨霜曾经提起，自己从没有外出打工，就是不想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孩子就长大一次，要是没有教好，多挣那点钱也补不回来”。采访中，一位村民骄傲地反复说到，女儿正在昆明一所本科学校学医，她当年是从长新乡的中学考上了大理的一所公办高中——近200人的年级里，只有30多人能拿到这张入场券。“有的人只差了一两分，父母还是想让孩子到大理去念书，就得多出几万块钱赞助费读私立学校。父母能拉一把，总是想多拉一把。”

但上学之路也是危险的。在长新乡，不少山上的村小因为人数太少，只开一年级至三年级的班，高年级的孩子需要到乡上的小学寄宿。身亡的双胞胎兄弟生前也在乡上上小学五年级，周末才能回一次家。水泥路终止于半山腰，越往山上走，手机信号越弱，到山顶树林时，几乎收不到任何

信号了。一位村民说，大约10年前，这还是一片荒山，树林里时不时有黑熊出没，从乡上翻山回家的人们需要结伴而行。

采访的那一天正是周五下午，傍晚5点多钟，本刊记者在下山路上遇到了一辆正在上行的面包车。车窗降下来一半，车里坐满穿着校服的孩子，正探头向外张望。这是一段坑坑洼洼的狭窄土路，一侧是山，另一侧是落差十几米的山崖，只能容一辆车经过。为了错车，面包车只能先挪到山边的一小块空地上。

六年级的学生刘志是这种面包车的常客。他的家在山背面，单程要25元。刘志说，许多人家里没有小汽车，私人运营的面包车是他们每周上学、放学最方便的选择，只要提前打电话预约，司机就会到家里来接送。不过，他也遇到过麻烦事，去年夏天的一场暴雨后，砖红色的土混着石子“从山上冲了下来”，把路截断了，学生们只能下车，艰难地徒步绕过这片泥泞的土堆，等着家长们骑摩托车来接人。摩托车行驶在泥泞的路上，坐在后座的刘志觉得“轮子在‘喇喇喇’滑来滑去”。他的双手背在身后，紧紧抓着后架子，到家门口时才松开，“掌心通红，手都软了”。

为了让孩子免于奔波在危险的山路上，一位年轻的妈妈特地在乡上租了房子，开了一家小吃店，做简单的盖饭、饵丝等餐食。食客不多时，四年级的儿子就在小店里最角落的一张桌子上写作业，作业本下垫着一个厚厚的笔记本电脑，是她从县城里特地买来给孩子用的。即便这样有些局促的条件，也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山上的庄稼、牲畜，是许多人无法抛下的生计。

一块竖立在乡上中学门口的安全告示牌，或多或少地提醒着，生活在山里的孩子们身边充斥着更多隐秘的风险：“不得攀爬可能会危及人身安全的大树、电杆、山崖、建筑物；暑期旱季，不准在河沟、水库、水窖中游泳，雨季汛期，不能强行过桥渡河；女生往返应尽量结伴而行；不随意采食野果、野生菌类，防止食物中毒；走村过寨、穿山入林时，要注意自我防护，不能故意逗惹恶犬、马蜂、毒蛇等具有一定攻击能力的动物。”

（文中李宣磊、李建军、赵茗、杨霜为化名）

守护成长 陪伴远航

中信银行发行“少年行主题信用卡”为海外学子保驾护航

文·李申佳 朱冠寅

随着海外留学市场逐渐回暖，新一年的莘莘学子将远赴重洋，出国求学。3月9日，中信银行携手 Visa 全新升级中信银行 Visa 逍遥白金卡，面向私人银行客户首发“少年行主题信用卡”，依托中信银行出国金融业务优势，打造覆盖留学生从出国到归国全旅程的一站式金融服务体验，陪伴广大学子获享有温度的留学生活。

根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22）》，2019年中国在海外高等教育机构留学的学生共 1061511 人，稳居全球首位。另《2023 中国学生留学备考白皮书》显示，随着留学相关考试的恢复、各大院校恢复线下课堂以及出入境政策放开，中国留学趋势正逐步回暖。

作为国内最早提供出国金融服务的银行，中信银行自 1998 年起深耕出国场景 25 年，不断拓展服务边界。此次中信银行深度洞察留学回暖趋势，针对留学家庭的金融服务需求，首次发行“中信银行 Visa 逍遥白金信用卡——少年行版”。该款产品面向私人银行客户推出，同时为持卡客户的出国留学子女提供“少年行版”附属信用卡，按照新模式、新路径整合海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和力量，通过温馨陪伴、海外守护、未来规划、特色金融四大板块，为私人银行客户家庭提供全教育生命周期的一站式服务。

据介绍，中信银行“少年行”子女教育服务体系覆盖出国留学家庭的全程服务需求。在温馨陪伴方面，提供包括教育全路径咨询规划、海外课程培训资源、探校访校陪同支持、留学申请定制服务等；在海外守护方面，涵盖租房用车等生

活服务、海外安全信息服务、医疗救援及旅行医生等健康守护服务、全球机场高铁及通关出行服务；在未来规划方面，覆盖子女的专业选择、职业规划、实习就业、回国发展；在特色金融方面，囊括了私人银行专属财富产品、资信、签证、汇款权益等。该服务体系结合本次推出的“少年行版”主题信用卡，通过精心遴选的优势资源，为用户提供全教育生命周期的海外留学规划和服务。

与此同时，本次新发行的“少年行版”主题信用卡围绕出国留学子女的实际需求，提供了丰厚的返现权益和贴心的海外保障。首先，针对留学缴费刚性需求，符合条件的持卡用户可报名参加境外教育类商户交易返现，月累计满 1000 美元即有机会获 8% 返现，最高可返 200 美元。其次，围绕海外学子日常消费场景，持卡用户可享全球消费免 1.5% 货币转换费，在出行、购物、外卖、餐饮等指定商户消费，成功参与活动即有机会获享笔笔返现 2% 权益，每月最高返现 50 美元。此外，在每个留学家庭最关心的海外保障方面，持卡人可获享“100 万美元国际救援服务”，包含紧急医疗、转运、亲属探病及住宿、子女回国、医疗信息支持、旅行信息协助等系列服务支持，为留学生活保驾护航。

未来，中信银行将持续发挥自身优势，赋予“要出国 找中信”新概念、新内涵、新特色，让用户获享“不止于金融”的增值服务，以有温度、有价值的产品体验为广大海外学子的生活、学习、安全、健康等方面全方位保驾护航，传递“让财富富有温度”的品牌主张，助力中国少年的奋斗梦想，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中信银行
CHINA CITIC BANK

私人银行
PRIVATE BANKING

陪您守护成长 伴他无忧远航

少年行主题信用卡，和您一起托起家族的未来



中信银行Visa逍遥白金卡-少年行版

1 产品权益

- CAG美国地区法律咨询
- 盛诺一家美英日海外医疗
- 100万美元国际救援权益
- 留学缴费8%返现
- 全球全币种免货币转换费用
- 留学生活类消费2%返现

2 产品交易达标活动

- 活动期间交易满额5000美元，送境内接送机1次（每期50份，先到先得）
- 活动期间交易满额10000美元，送境外接送机1次（每期20份，先到先得）

*具体权益内容请见活动细则



全国统一贵宾服务专线

10105558

<http://bank.ecitic.com>

让财富有温度



(Ute Zschamnt/戴卫·奇普菲尔德建筑事务所供图)

詹姆斯·西蒙美术馆



2023 普利兹克奖得主大卫·奇普菲尔德 关心建筑的生成过程

特约撰稿·唐克扬

如何才能持续创新而又不冒犯过去？

英国建筑师大卫·奇普菲尔德爵士（Sir David Chipperfield）获得 2023 年普利兹克建筑奖之后，建筑师圈子里有两种典型的反应：

一种，是认为普利兹克建筑奖又回归“建筑本位”了。前几年的奖项均颁给了不那么有名的建筑师，而且，对这些建筑师的选择似乎并不完全着重于设计本身，比如，去年的得主是来自布基纳法索的迪埃贝多·F. 凯雷，颁奖词中着重提到了他的作品具备“对社区的意识和记述的价值”。在这方面，专业圈今年的反应是：得主终于又是那个“大名单”里的建筑师了。

另外一种，则是对于奇普菲尔德个人设计形象的激赏。今年的得主在国内落成作品颇多，最

常听到的一个赞美词是“优雅”——为此，我所熟识的一位建筑学老师还特地表示，这位建筑师的作品怎是“优雅”一个词了得。那就是如同普奖委员会在颁奖词中所提到的，建筑设计是要在“纪念性设计与社会性思考之间”寻找平衡，奇普菲尔德以自己的方式践行着他的平衡之道。他心目中建筑的“永恒性”，是逐渐远离只是不停“建成”的物体，转向“维持”（keep）建筑，关心它们生成的过程。

从模型到现实世界

从某张照片里望去，奇普菲尔德的设计像个



(Noshe 供图)



(Joerg von Bruchhausen/ 戴卫·奇普菲尔德建筑事务所 供图)



(Simon Menges 供图)

1. 爱茉莉太平洋集团总部，竹林般的立面
2. 柏林新博物馆，中庭里的白色混凝土大台阶处理得既有继承，又不属于 19 世纪
3. 上海西岸美术馆，大露台

白模型，极简，素朴，在一些置身都市场景的作品鸟瞰中，你甚至不太找得到他设计的存在。据说，他的工作室酷爱制作如同工艺品一般的物理建筑模型，然而，这位 1953 年出生的英国人，有着贵族称号的奇普菲尔德，却清醒地意识到建筑师是在现实世界里创作的。他的谦卑，或许出自把模型转化为现实的难度。用他自己的说法，这是一种必要的对话：“和一个场所的对话”，“和现存建筑的对话”；或者，对于一个极为多产的建筑师，有着多达近百项建成项目（据普奖官方资料），这种对话，也可能是他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项目类型之间的对话。

修复“二战”之中遭到破坏的柏林新博物

馆，为奇普菲尔德在专业界带来了广泛的关注。2003～2009 年期间进行的这个项目，对施蒂勒（Friedrich A. Stüler, 1800～1865）的原作既有忠实的继承又有不小的改动。建筑师的介入极为克制，所有的新形式都经过了严格的历史考据，与此同时，中庭里的白色混凝土大台阶，剔除了原先的铁艺栏杆和扶手，单纯、抽象，显然又不属于 19 世纪。如同普奖委员会所称许的那样，奇普菲尔德不认为只应保护“最好的建筑”，他意欲保护的，是那些反映城市演变丰富性的特点和特质，也就是绝不掩饰“变化”的痕迹。“模型”之酷，不仅因为它是白色的，而且是源于和历史的反差。一旦赋予时间的维度和社会的含义，建筑便有了生命。

如何才能持续创新而又不致冒犯过去？奇普菲尔德不只做历史修复的建筑师。正值建筑师成长的年代，新理性主义（又名 Tendenza，字面意思是“趋势”）是对上述问题最惹眼的回应，这种思潮兴起的地方，有着千百年来形成的、绵密紧致的城市肌理，加上丰富的本地传统，让它的代表人物并不情愿一边倒地接受现代主义。当然，身为现代主义的受惠者，他们也不拒绝功能上的革新，这样，便有了打着传统旗号变革的奇观：“与古为新”。保留现代建筑在功能上的进取心，同时修正它枯燥无味的纯抽象一面，让建筑“有形象，有记忆或者有历史”，介于抽象和形象之间，在其中，找到有温度有感知的物质特征（physicality）。

这种建筑不能是一个大号的模型，它必须在各个尺度上都和人发生关系。早年为三宅一生做过专卖店设计的奇普菲尔德，在巴黎和纽约的大街上，展现了从抽象到具象的转换能力：从罗马帝国时代就出现了的“水磨石”（terrazzo），是颗粒很细的小石子，混入水泥混凝土和其他添加剂的掺和料中，然后找平、抛光。走近来看，它们可以形成非常具体的形象，因为每一处的颗粒排布不可能完全一样。远看，它们如同一层雾，让简洁的空间形体有了一种生气。奇普菲尔德一直受到商业业主的追捧，是因为他的建筑无需理论就成立，即使在小尺度的室内，微观材料拼图也极富时尚感。

变和不变的平衡

奇普菲尔德和日本人交往已久，深受他们对于日常生活看法的影响：建筑可以是普通的，但又必须很特别。普通，是因为它们融入了地方、历史、工艺传统……这些早已存在的东西，与此同时要吸引人，它又不能是平庸的，得是具体事物的精心组合。这些表述难免会让人略感自相矛盾：一个持续大量产出作品的建筑师，在我们的谈话中，却反复提到世界对建筑“物”关注太多，往往忽视建筑创生的“过程”。奇普菲尔德对于人类生存环境、资源危机和社会问题的关注，显然是“过程”的意义。

比如古典形式的转化。奇普菲尔德初期的作品中，立面上狭长的垂直元素，翻译自希腊人和埃及人也有的柱廊（colonnade）。可是它们并无古典柱式的细节——这些纤长的线条，仅仅是“表现性”的，在雅典的国家考古博物馆改造项目中，它们是现状的“旧”，在现代文学博物馆（德国内卡河畔马尔巴赫市）或柏林的詹姆斯·西蒙画廊设计中，它们又是设计的“新”。这些“柱子”传达的，既不是严格的力学法则也非一成不变的语法，肃穆整体和干净的气息与想象中的古典一致，材质和结构则推陈出新，这种“新”可以是法国兰斯美术馆方案里吊住室内空中步行道的悬索，或首尔爱茉莉太平洋总部的竹林般的立面。

现代主义建筑师密斯·范·德·罗的建筑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一个硕大、仿佛飘浮在空中的屋顶，而奇普菲尔德自得的地方，是“密斯有屋顶，我有柱廊”——不仅如此，通过一个应景切题的展览，在德国新国家美术馆中，他还植入了真正的柱子的森林。从柱廊发展来的竖直线条，在不同的语境中，又变身为建筑锌皮上的分缝线、铝肋板、金属鳍（fin），翼缘突出，或者暗缝消隐，和粗大的水平楼板显示出复杂的立体关系……虽然同一项目中总是保持一致，但在不同项目里，这些细节各有各的讲究——通过自己明显的物质存在。这些容易沦为纯装饰元素的抽象线条，竭力转化为空间的一部分，是建筑的“骨骼”——拿建筑师举到的两位艺术家为例，你可以把这些“骨骼”看成一个简笔画的人形（葛姆雷），也可以试着在几何图案里读出古典的秩序来（贾德）。由此，具象和抽象达到了某种平衡。

奇普菲尔德多变而复杂。他既酷爱纪念性的建筑类型，也不会拒绝在世俗的百货商店和办公楼上使用这些类型。包括上海在内的五个城市他都设了事务所办公室，项目如此繁多，不管建筑的文化语境他熟悉或不太熟悉，建筑师应对的变化之道，就是在人们心目中求得不变的印象——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原因，莫尼欧（Rafael Moneo，1996年普利兹克奖得主）把奇普菲尔德称作一个“建筑策略家”（Architectural Strategist）。莫尼欧说，这是一种褒奖的说法。

奇普菲尔德：建筑师不同于艺术家。艺术家多少有独立的思想。一位艺术家，或一位作家，运用他们对于人性的理解独立创作，为了产生意义，创作必须触及某些我们也理解的东西。我读一本书，假如书要打动我，它必须有点意义，我能理解的一部分情感和人类的状态。这就是好作家正在做的事情。而建筑师必须合作才能创作作品，他不是夜里在自家桌前就把活干了的。这是一个格外需要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调动(engage)创意并且沟通创意。它得有意义。

在柏林新博物馆的项目里我们修复建筑的方式说起来非常有争议，因此我得解释我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修复，你得让每一个人都理解这个事情。这不大是责任的问题。你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会从不同的角度看一个项目，所以建筑师得向每个人解释清楚……建筑师不能是个天才，只是说“你必须相信我，听我的”，建筑师得说，“我认为这才是项目应该的样子，应有的价值。我们都能理解这些价值。我们可以一起干吗？”……你必须得合作。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过“密斯有屋顶，而我有柱廊”。我们怎么看待这些现代建筑的功能问题？柱廊那样的样式是纪念碑式的，而对你的项目来说，它们可能是百货商店和办公大楼。

奇普菲尔德：有两种方式回应。一种是就元素和材质而言。这些建筑都有表皮，是工业化制造的。这里面没有多少建造(tectonic)的问题。建筑装上表皮之前，开着车在城市里经过，你看到的是一幢正在建设的公司大楼，你想，“哦真棒”；然后过了两星期你来，看到表皮已经装上了，你想“哦没那么有意思了”。(建筑的)骨骼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到的是混凝土，看到的是结构。然后就装上了表皮，表皮就是形象。我们为何比喜欢表皮更喜欢骨骼？是因为骨骼传递出重量感和物质感。可能混凝土没有那么漂亮，但在我看来，当代施工里的表皮总有一点弱，因为它是经济性、施工杂务和设备。由此，这些柱廊不仅仅和希腊神庙有关，它们是我感兴趣的(建筑的)骨骼……我喜欢密斯，因为密斯用八根柱子和一个大屋顶就盖出了这幢建筑。它们是(建筑的)骨骼，而

且是可见的。

我们要做的一点不起眼的工作大概就是展示骨骼，它们是建筑身份的一部分……建筑的表皮没那么重要了。骨骼创造出了内外更重要的空间连接方式。这是对上述问题的简单的回答。

三联生活周刊：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和维也纳，你分别做了两座百货商店，大众可能觉得它们很相似。但你说，前者更形象，而后者抽象一些。这让我想起我小时看过的保罗·克里(Paul Klee)的作品，它对我而言既形象又抽象。你会用什么样的艺术作品解释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奇普菲尔德：首先我得说，你说得没错。现代建筑 and 现代建筑运动只对抽象之物感兴趣。早期现代建筑是非常抽象的。某种意义上这不讨人喜欢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我当学生的时候，典型地……讨厌这种现代建筑，因为它没有任何形象化的特点。后来，有了我们所讨论的后现代主义，它要试着让建筑重新有影(silhouette)，有形象，有记忆或者有历史，而不是单单依赖抽象。所以，我那一代是那种更喜欢建筑形象的现代建筑师。(建筑)语言是什么？建筑怎么才能有种语言，避免纯然抽象呢？抽象已经不够了。你说得对，我的建筑介于现代主义的抽象和某种历史建筑的形象性之间，在其中找到物质性(physicality)，这一直是个话题。

至于什么样艺术家的例子我不确定，很显然贾德(Donald Judd)代表典型的极少主义艺术家，是现代的，形式的理念是抽象的。葛姆雷(Antony Gormley)代表的形象性就要强多了，但还是很现代主义的路子。

三联生活周刊：我下面一个问题还是关于施工的，不过这次更偏向如何看待建筑细节的本质。在我看来，建筑细节有可能是特别抽象的一种东西，因为它不能有错，不容多余的意义，但又可能很具体，因为我们要实现它就得诉诸现实。这两种视角是否存在某种冲突？

奇普菲尔德：如果我们看传统建筑，我们对它很有感觉，因为我们对它的建造方式有感觉，我们甚至能感受到建造它的那只手。(建筑细节)是有意义的。你扭动窗上的一个把手你能感受到

这些东西。经过成规模的工业化之后，建筑变成了离我们而去的東西。我感兴趣如何将建筑再次拉近我们，通过你如何建造它的方式，经由尺度，以及依靠你感受空间的方式。我感兴趣把建筑变得单纯。我们在建筑中一直都拥有这些品质。当你步入一幢老建筑，你感受得到它的地板，地板很漂亮，上好的地板。现在我们为什么不做些漂亮的地板呢？地板现在通常都是机制的了……没人想这些事。

太多建筑正在离我们而去，它们是物体、图像，但不是感受。

三联生活周刊：假如你的客户不按你的方式使用你设计的建筑怎么办？

奇普菲尔德：当然，就各项议题都取得共识不总是那么容易。但是我想，大致说来，如果你做出了好东西，它有种明明白白的单纯感——我想假如建筑搞得太繁复了，客户不会十分喜欢它的——如果你在一幢房子里做了一块漂亮的地板，没有人会把它拆掉。他们不会改变一幢好的房子，他们会改变糟糕的房子。我想未来可持续性主要是关于如何维持房子，我们得想象建筑是卓越的，我们应该让它们容易搞定，可以利用，不要浪费。

三联生活周刊：建筑的功能和形式都在随时间而发展。

奇普菲尔德：是的，那意味着我们……得理解（建筑）的功能和它具备的形式……什么是功能？……一间起居室的的功能是什么？是和你的家庭相处，喝咖啡，看电视。所以你需要上好的空间。但是现实中你需要上好的街道吗？我们（从现实状况来看）不那么需要。目前城市开发的方式里，优选项不是关于我们如何生活，而是投资是否有效。建筑工业，投资行业……而其实，我们每个人如何生活才是最终改变城市的东西。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知道我们想生活在什么样的城市里：我们想生活在不那么巨型的建筑中，要有上好的街道，上好的购物区域，还得有树，有小汽车，上好的学校。但是事实上我们却在建造没有人性的大城市。它们不是关于我们如何生活的，而是我们如何投资以及投资是否有效。环境危机、气候改变和可持续必须触及这些问题。我们的建

筑必须更多地关注为个体带来更好的生活品质，必须更多关注保护资源，在使用资源和能源的时候更睿智。

三联生活周刊：我听说你最近在雅典改造的国家考古博物馆项目引起了一些争议。

奇普菲尔德：我认为这个项目在向雅典市、向公众、向媒体展示时反响很好。所有人都很喜欢这个考古博物馆，它是世界最伟大的博物馆之一。拥有卓绝的收藏。我们完成的项目是扩展这个博物馆……我们改善了博物馆的现状，带来更多空间、设施和更富余的展览空间。我不觉得它有什么争议的地方。唯一有争议的，在是否有钱完成这个项目。看起来（我们的）施工很有信心，我们已经完成的项目也考虑了城市的一部分……每个项目都应该以它能回报的东西作为衡量方式。每次建造的时候一定会拿走一些东西，资源、空间，这以后就不得不说，建筑以什么回报城市？建筑的哪一点让城市变得更好了？我们的项目慷慨地回报了城市。博物馆（在这方面）比办公楼好办多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要不要给数字时代的建筑学学生说几句？我知道你很喜欢实物模型，而现在的学生们却更喜欢数字模型。

奇普菲尔德：运用物理模型或数字模型可以变得更富于发明精神，更专业。但我并不坚持要做模型。我给建筑学生们带的话是，现在，他们得思考建筑往后怎么才能有用。他们不应该过多受到我这一代的影响，因为我们……在另一个时代里。过去30年，建筑“物”，或说一种建筑产品过头了。作为一个行业我们得对过程多感兴趣。我们建筑师如何才能参与到改善环境的过程中，不是建造更多建筑物，而是建造更好的城市，建设更多资源？我们建筑师如何才能更有用，而不是总作为个体彼此竞争？

我们得思考实践中建筑师新的工作方式。环境议题，社会不公平，将成为下一代人的压倒性议题。他们必须换一种方式思考建筑实践，更富于合作精神。我们不得不思考饥荒的问题。我会建议学生对这些议题感兴趣，对环境的和社区的议题感兴趣。建筑学必须更多地关注如何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而不仅仅是更好的房子和更好的物体。■

组织特异性免疫

主笔：袁越

通常情况下，治疗性药物应该追求特异性，因为疗效越专一就越能减少副作用，比如抗癌的靶向药就是如此。相反，预防性疫苗则应该追求普适性，因为适应症越广就越能提高保护效力，比如正在研发中的广谱流感疫苗就是如此。

但是，这个规律也有例外，比如新冠病毒已经出现了好几个不同的变种，导致第一代疫苗的保护力下降，此时就应该加速研发针对新变种的特异性疫苗，提高保护力。同理，如果疫苗的特异性不够强，就有可能诱使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的组织或器官，导致严重的副作用。这个结果不但妨碍了全民接种计划的实施，甚至有可能引发自身免疫疾病，让接种者忍受不必要的痛苦。

那么，如何才能提高疫苗的特异性呢？这就要从疫苗的作用机理说起了。从原理上讲，疫苗相当于一次无毒性或者弱毒性的感染，免疫系统由此而“认识”了病原体，从而为下一次类似的感染准备好了两套预案。第一套预案指的是免疫B细胞做好准备，迅速生产出相应的抗体，将入侵之敌“中和”掉。第二套预案指的是免疫T细胞做好准备，随时对来犯之敌发起正面攻击。

第二套方案中的T细胞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T细胞会随着血液循环系统遍布全身，另一类T细胞则会选择性地驻扎在特定的组织或器官之中，在那里等待来犯之敌。比如，呼吸系统传染病主要是通过鼻腔和肺部入侵人体的，只要在这两个地方布下重兵就可以了。再比如，消化系统传染病主要是通过肠道入侵人体的，分布在肠道表面黏膜内的T细胞是对付这类入侵者的最有效的武器。

传统理论认为，这两类T细胞本质上都是差不多的，只是位置不同而已。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医学院的几位科学家在2022年12月28日出版的《免疫学》（*Immunit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颠覆了此前的常识。

研究人员用小鼠做实验，研究了小肠和结肠这两个部位的免疫T细胞。实验结果显示，这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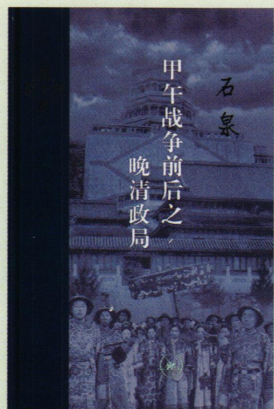
个地方的T细胞在细胞因子（Cytokine）和颗粒酶（Granzyme）这两项重要指标上有着显著的不同。众所周知，细胞因子是调节免疫系统活性的关键信号分子，而颗粒酶的主要功能就是诱导靶细胞的程序性死亡，以此来清除被病原体感染的体细胞。这两种蛋白组分是T细胞最常用的杀敌武器，说明分布在小肠和结肠这两个地方的T细胞在装备上存在很大差别。

不但如此，这两个部位的T细胞还在转录因子和基因修饰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比如一个名为Emoes的转录因子在其他组织当中可以阻止免疫T细胞的聚集，但在小肠当中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这说明我们有可能通过增强或者削弱Emoes因子的活性来调节T细胞的数量，从而影响免疫系统在不同组织中的活性。

这篇论文的作者认为，不同组织内的免疫T细胞之所以存在很大差异，是因为它们需要对付的敌人是不同的。比如结肠内存在大量肠道菌群，如果T细胞不分青红皂白一阵乱杀，很有可能殃及无辜，所以驻扎在这里的T细胞必须和位于其他组织内的T细胞不一样。

这篇论文非常重要，为今后科学家研制出组织特异性免疫疗法提供了基础。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想办法让新冠疫苗只作用于鼻腔和呼吸道，就能极大地降低疫苗的副作用，让更多的人不再为疫苗的安全性担心。☑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石泉 著 定价: 8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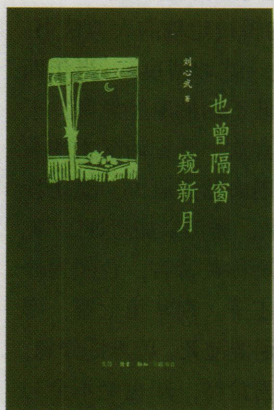
脱胎自石泉教授受业于陈寅恪先生时撰写的硕士论文, 通过对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内部政治情势演变的考察, 阐明甲午战争实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以求与远东国际局势的演变相表里。作者辛勤探索之所得, 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为我们了解民国学人如何看待晚清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



20世纪的教训：一部哲学对话

[德] 伽达默尔 [意] 里卡尔多·多托利 著 王志宏 译 定价: 6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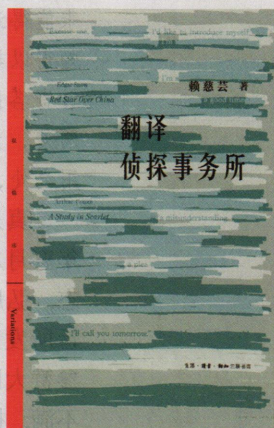
20 世纪最著名的西方哲学家及解释学奠基人之一伽达默尔, 在年近期颐时与意大利哲学家多托利展开了一场颇具丰富意涵和哲学意味的对话, 回顾了他全部哲学思想重要方面的发展历程。



也曾隔窗窥新月

刘心武 著 定价 6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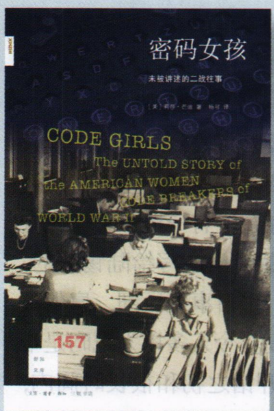
刘心武关于当代文人群像的一次集中书写。他以亲身经历讲述了时代激荡与文坛变迁中 55 位文坛名宿的沉浮故事, 刻画出这些温润智者历经岁月尘烟与人生风雨之后素心不移、凝视新月的境界。



翻译侦探事务所

赖慈芸 著 定价: 45.00元

还原名著翻译的前世今生, 考索译人的生涯往事, 回望共同的翻译记忆。幽默风趣的文字呈现严峻荒诞的史实, 搭配上下求索得来的珍贵图片、经年爬梳的详尽图表, 拼凑出大时代下的翻译史拼图。



密码女孩：未被讲述的二战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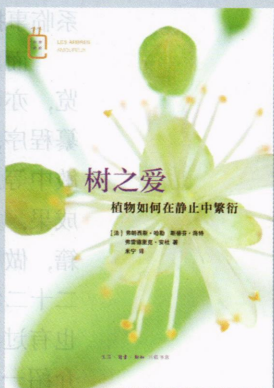
[美] 莉莎·芒迪 著 杨可 译 定价: 59.00元

揭露了二战最后的秘密, 一群年轻的女性通过破译德军和日军密码让战争早日结束、拯救千万人性命。同时, 本书也是一部基于扎实研究的社会史, 以富有冲击力的人物故事展现了女性争取权力的历史。

树之爱：植物如何在静止中繁衍

[法] 弗朗西斯·哈勒 斯蒂芬·海特 弗雷德里克·安杜 著 米宁 译 定价: 79.00元

一部关于植物的繁衍生息的科普书。树的繁殖延续及其性的存在与否, 一直是植物学家关注研究的焦点。本书探索了树木之间优雅又多样的“性爱”关系, 科学解释中穿插了趣闻轶事, 辅以致精美图片, 让人在宁静中体味树的百态。



四库全书纪事之辑佚(6)

校勘与修订

文·卜键

前面的两节写到大典辑佚的程序,本节要说的是校勘与修订,在辑书流程中属于排在后面的两个环节。而若认为编纂事务就是这么一板一眼,顺序推进,可就过分呆板了。请先看乾隆帝的这份谕旨:

再,近因办理四库全书,所阅《永乐大典》,见其中有宋陈规《守城录》一书,备载守御机宜,所言御捍炮石之法甚详。虽攻守不同,而御捍则一。但彼施之于城上,故可用大木,我兵步行捍蔽,自以轻便为宜。从前该省原有挡牌一项,或制造未能得法,今此书所载以麻绳横编,如荆竹笆相似,颇得以柔御刚之法,或可酌仿为之。着将书载各条,钞寄各路将军等阅看。将来攻至噶拉依及勒乌围两处,尤为贼巢要隘,其守拒必更加严,或可需用之处,不妨存此法以便缓急。

真是现发现卖、活学活用啊!那是在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金川之役正处于胶着与危急状态,弘历在热河备感牵挂和焦虑,常加遥控,谕旨所发对象,乃正在前线督兵进剿的右副将军、参赞大臣阿桂。他先对阿桂奏报的用兵思路表达不满,接着就说到宋朝人写的《守城录》,认为可资在攻城时借鉴,命抄录副本飞递与军前带兵的将领。而因该书涉及宋金交兵,弘历在题诗时大发议论,“陈规屡御应之暇,汤璫深知纪以精。小县傍州或可赖,通都大邑转难行”,又借夹注指出“宋靖康汴京之失,则由于平时政事之乖违,岂尽系临事捍御之疏略”,阅读很细,亦堪称目力深透。

而由此谕,可知大典辑书那时已陆续上呈御览,亦可知兴修四库虽有严密的、前后衔接的编纂程序,同时也存在一个快车道。这里能见出于敏中等总裁官的良苦用心,为了让皇上早日看到成果,尤其是可能感兴趣、对前线作战有用的书籍,做了特别的安排。其实纪昀和邹孝孚(乾隆二十二年探花,时以翰林院侍讲兼四库馆纂修官)也有过类似发现,见大典中载宋代《神臂弓图》,介绍一种强弩,弓身三尺二寸,弦长二尺五寸,

箭木羽长数寸,射二百四十余步,能入榆木。他俩大感兴趣,琢磨了半天,还是整不太明白,便想照图钩摹下来,请传教士研究和仿造。刘统勋以为不可,曰:“西洋人用意至深……此弩既相传利器,安知不阴图以去,而以不解谢我?《永乐大典》贮在翰苑,未必后来无解者,何必求之于异国?”瞧这份戒备心,纪昀必自愧弗如。

《守城录》并非最早的辑校定稿的大典佚书,御览并题诗的第一种应是《乾坤凿度》,当年四月即蒙钦题。军机大臣有谁不知揣摩圣意呢?于敏中尤所擅长,知道皇上喜欢一些玄而又玄的东西,加上此书篇幅甚小,遂命馆臣赶办。弘历读后果然很感兴趣,因无署名,居然亲加考证:“乾坤两凿度,撰不知谁氏。矫称黄帝言,仓颉为修饰。以余观作者,盖后于庄子。南华第七篇,率已揭其旨。倏忽凿七窍,窍通混沌死。乾坤即倏忽,混沌实太始……”纪昀素喜论辩,却也绝不会与皇上掰饬,在提要中写道:“伏读《御制题乾坤凿度》诗,定作者为后于庄子,而举应帝王篇所云‘倏忽混沌,分配乾坤太始’,以推求凿字所以命名之义。援据审核,折衷至当。”呜呜呜大吹法螺。

呈送御前的辑书应是定本,又称正本,参考张升和史广超的研究,此前要有草本、初稿本、二稿本,甚至三稿本,那些优先送呈的古本应会极大简化。而不管是在快道慢道,都不敢忽视文稿质量,不光纂修官、总纂官等会反复核校,总裁大人也很上心,接到后先要仔细翻阅一遍,方才呈上。即便如此,仍会有错讹和瑕疵存在。有一批珍贵信札侥幸流传至今,乃于敏中在避暑山庄写给陆锡熊的,也证明他的总裁绝非挂名,平日事无巨细,扈驾离京后则信函往复,频率很高。今人多以为纪昀是唯一的四库总纂,孰不知在开馆之初和很长时间内,“主要负责人”是锡熊,是以于敏中有事就写给他,仅在末尾加一句问候晓岚先生之类的话。

那个夏天,乾隆帝于五月初八日奉母起驾,



乾隆颁赐的战图，《平定金川战图册·攻克勒乌围》

十四日到避暑山庄。仅数日内，于敏中就收到京中送来的大典辑书五种，也应有陆锡熊汇报办理情况的信函，遂复信曰：

《永乐大典》五种已经进呈，所办下次缮进之书可称富有，但不知报箱能携带如许？并细阅所开书单，如《竹品谱》之列于史部、《少仪外传》之列于子部，皆未解其故，便希示及。顷奉还书谕旨并议定印记章程，已录稿寄馆，如此办理，日可无遗失讹舛，但为提调诸公多添一忙耳。

根据徐庆丰的考证，该信写于三十八年五月十八日，所称“还书谕旨”，系弘历前一天所颁必须妥善归还各省汇送书籍之旨；“印记章程”，则指刘统勋领衔上奏的落实措施。此时统勋在京留守，操办者只能是于敏中，仍按总裁排名为序。敏中勤谨精细，不光及时将送到的辑本上呈，还关心下一次送哪些，并对分类提出质疑。

报箱，通作“折匣”，指京中留守大臣飞递文报的匣子，由兵部职方司负责安排，朝发夕至。四库馆臣借以发送文稿，大约要另行包装捆扎，不会装入折匣。馆臣张坝有诗专记此事：“五花习健儿，三日发折匣。兼驮四库书，不止十行札。惭愧事校讎，匆忙共检押。岂无一字错，素餐汗衣衲。”张坝以举人授内阁中书，与一时名公巨卿多有交往，时兼武英殿缮书处分校官，可知发送避暑山庄者并非大典本一种，也有选定的各省采

进书誊录本。那些书不再需要辑佚，可也有一个誊抄、核校、撰写提要的过程，承办者也是生怕出错，为之惴惴不安。

的确，进呈皇上的书稿，最怕的就是被指出讹误。其实在明人修辑《永乐大典》时，对所收书籍主要是分入各韵部，一般不作修改，好处是保留原貌，但也会有错漏延续下来。通过于敏中的手札，可见出校勘有全书顺序的问题，而以力求减少错讹为重点，并细心修订。收到稿本后，于敏中先为把关，看到错处即为改补，存疑处在信中列单询问，并叮嘱：“愚不过偶尔抽看，即有错字如许，恐舛误尚未能免。应切致原纂及校对诸公，嗣后务须加意。”

的确有些稿本错讹，于敏中未能看出，呈进后被皇上挑了出来，有些难堪。他在手札中写道：

此次进呈各书，一日之间，奉上指出两错。书签之错，尤其显而易见者，此后务须留心。至《折狱龟鉴》内错处，当切告承办《永乐大典》诸公各宜加意，若再经指斥，即削色矣。

校书如扫落叶，于敏中在信札也说过这样的话，目的却是为了提示警醒。好在那时的乾隆帝较为宽容，批评嘲笑一两句，也就算了。■

（参考书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四库全书总目》《高宗御制诗四集》《清代诗文集汇编》《永乐大典辑佚述稿》《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研究》等）

足球 1 比 0 胜 BBC

文·张斌

周六午后，莱因克尔身着正装走出在伦敦巴恩斯的家门。守在街道两旁的记者们紧随几步，摄像机取景框中，足球名宿、BBC 当今酬劳最高的主持人一脸轻松。冬日暖阳中，莱因克尔享受着难得的闲适时光，奔向自己职业球员生涯中首个俱乐部莱斯特城队的主场，为老东家与切尔西一战助威。

若是往日，看完球之后，莱因克尔要赶到 BBC 制作总部，当晚 22 点 15 分，英伦三岛近 300 万电视观众会在直播的《比赛日》节目里听他以及一众嘉宾评球。过往 25 年，这便是莱因克尔在每个比赛日里的钟摆式节律，现身屏幕或现场，休闲的装扮，洒脱的坐姿，日渐花白的鬓发，塑造着犹如家人般亲切的足球主持人形象。但是，在刚刚过去的周六，莱因克尔看完球直接回家了，东家 BBC 暂时中止了他的工作，直到双方就 BBC 雇员社交媒体表达行为规范达成共识的那一天。

在莱斯特城队主场，镜头特意给到了莱因克尔，他身边站着俱乐部吉祥物的扮演者和球票销售人员，聊着球队家常，一道目睹不敌蓝军的全过程。看台上，有球迷打出横幅——“加里·莱因克尔当首相吧！”。过往几天，莱斯特城旧将在他拥有 800 万粉丝的推特账号上向保守党政府发出了强力挑战，指责首相苏纳克推行的移民政策仿佛就是上世纪 30 年代德国当权者的翻版，虽没有“纳粹”字眼，但尽人皆知，小小推文力道巨大。

压力在层层传导，BBC 在周五下午宣布莱因克尔言论违规，暂停其出境工作。莱因克尔不服，声言绝不道歉，他的儿子则在推特上宣布，62 岁的老爸已经决定 2025 年与 BBC 合同到期后离开这一平台。莱斯特城球场外，见证过 18 岁的莱因克尔在此首秀的同龄人球迷很是激动，高擎言论自由的旗帜，认为名宿道出了很多人的难言心声，错在政府，BBC 举措适当。如果仅是球迷鼓噪也就罢了，未曾想到莱因克尔赢得了同盟军的强力支

持，长期的节目搭档、同为名宿的阿兰·希勒和伊恩·赖特迅疾宣布退出《比赛日》节目，不少英超球队也以拒绝接受《比赛日》采访来对抗 BBC 的强权，以示捍卫言论自由。随着更多的主持人和嘉宾相继退出，周六版《比赛日》节目只得压缩为 20 分钟的英超进球集锦，相关的电台足球节目也告停播。周日版《比赛日》缩水到 15 分钟，依旧没有主持人出境，甚至女子超级联赛曼联与切尔西的关键一战直播，因为解说员与莱因克尔共进退，BBC 只得选用了全球普发的解说版本，慌乱不堪，不得不就此向观众道歉。

明年即将庆祝开播 60 周年的《比赛日》掀起巨浪，BBC 陷入空前危机之中，公众认定苏纳克政府直接对其施压，以此种方式打压有着工党色彩的发声者莱因克尔，肆意戕害言论自由，而支持暂时停止莱因克尔出境的 BBC 主席理查德·夏普瞬间也遭受暴击，他当年为前保守党首相约翰逊牵线获得 80 万英镑贷款的事情被再次曝光，反对派认为他获得 BBC 高位皆因保守党投桃报李。

一条推文引发的波澜其实不过是保守党与工党长期纷争对抗的结果，支持莱因克尔一派指出，BBC 当为公器，属于国家，而非政府，保持端正姿态最为重要。反对莱因克尔一派则认为，莱因克尔作为年薪达到 125 万英镑的 BBC 主持人，其酬劳完全源自公众付费和政府拨款，因此理应认真履行 BBC 雇员社交媒体规范，不在“有争议”的议题上随意发言，造成社会困扰。

何为“有争议”？谁来定义？这些都会持续争议下去，这位家喻户晓的主持人时常会对国家大事和社会风尚发表自己的独特观点，世界杯期间也会不停歇地对东道主进行评点，快人快语。这两天，记者们会继续聚集在莱因克尔家门口，主人出来遛狗时耳边都是快门雷动。最新消息说，BBC 有些扛不住了，做出让步，莱因克尔下周六会回到《比赛日》。这么看，足球这一轮 1 比 0 小胜了 BBC。■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假装上班的日子

文·咖啡椰子猫 图·陈曦



清早，送完孩子后，我像往常一样，涂好粉底和口红，又冲老妈大声喊道：“我去上班了！”我拿起小挎包和车钥匙，扭头重重地关上了家门。但是，出门后，我走的并不是平常去公司的那条路，而是直接去了图书馆。

半年前，接到公司通知，我所在的部门被撤销，拿了一笔赔偿金后，我成了一名无业游民，而且还是35岁以上的“大龄”失业者。想到求职前景，我的心里一片黯淡。

起初，我并没有过多的情绪波动，第一反应竟然是，以后有大把时间发展兴趣爱好好了。然而我只敢把失业的事情与先生分享，却不知该以何种方式告知父母。在他们看来，辛苦培养的大学生，应该努力工作、回馈社会，而不是做无所事事的“家里蹲”。为了防止父母絮叨和催促，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假装上班。

多亏平时“低消费、高储蓄”的好习惯，目前家庭存款的利息能覆盖掉大部分生活开支，这也让我能从容不迫地执行“先休息，再上班”的计划。我终于不用“摸鱼”偷看股票账户了，但正大光明地看指数起伏，这件事反而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一个人在体育中心跑步健身，看阳光把影子拉得时短时长，我仿佛浑身散发着“被抛弃”的可怜气息。我也会去街边公园里呆坐，没找到一大群要喂食的白鸽，倒是有不少老人带着孩子遛弯，好奇地跑来问我：“年纪轻轻的，怎么没去上班？”

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地奔赴目标，我就像只逆行的时钟，做着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要是累了，我就走进附近的咖啡店，挑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默默地打开一本书，一直读到手脚发麻。

以前上班时，老是幻想可以没人打扰地看小

说，可一旦变成现实，我却常常瞪着书页，一个字都不能飘进大脑，心里不停地盘算着男女主人公到底靠什么谋生。

在店里待久了，服务员就会投来关切的目光，殷切地询问是否需要点单。我只好点上一杯咖啡，仔细一算，成本远超原来的上班生活。

有个同样失业的朋友经验丰富，建议我去图书馆，那里不仅有免费的图书和饮用水，而且大家都在埋头做自己的事情，看书、做笔记或使用电脑，失业者很容易隐藏于人群之中，不会与周围松散安逸的气氛格格不入。

于是，图书馆就成了我的临时办公室，一周三天，就像学生一样准时打卡。但是，在确定厌恶这种百无聊赖的生活后，在对利息是否能保障未来生活的担忧中，我开始心慌、失眠，对镜自照的时候甚至拔掉了好几根白发。万般无奈下，我决定提前结束休憩时间，赶紧寻觅新工作。

我认真制作了简历，用加粗的字体反复强调了工作阅历，也努力美化了个人特长。我一边向朋友打听空缺职位，一边在招聘网站上投递简历。最开心的是能去面试，最忧愁的是简历“已读不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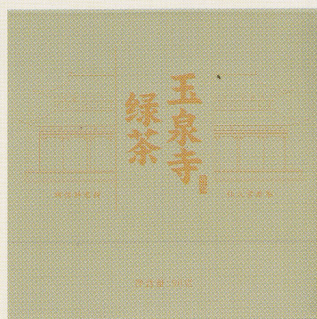
据说，失业最怕的就是与社会脱节，“哪里都不被需要”的迷惘和孤独如影随形，甚至会放大本身的焦虑。在没找到合适工作的情况下，也为了摆脱负面情绪，我尝试了“咖啡师”兼职。“有事可做”让我不再过度关注失业，然而每次咖啡“拉花”失败时，我都会默默许愿，赶紧找到一份全职稳定的工作。■

本栏目投稿邮箱为：yourproblem@lifeweek.com.cn

三联生活 | 漆 出品

春茶上新

二〇二三新绿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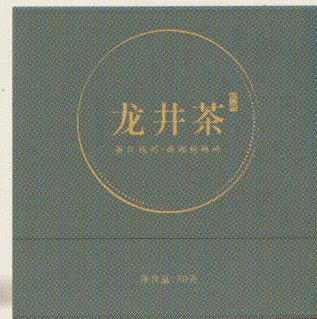
玉泉寺绿茶

群体种老树 | 仙人掌原茶



洞庭(山)碧螺春茶

传统柴火锅 | 手工制茶



西湖杨梅岭龙井茶

狮峰龙井产区之一



三联生活市集 | 微信扫一扫

「太平猴魁茶」四月新茶，同期预售
柿大叶种老树 | 自然农法种植 | 手工制作



玛莎拉蒂全新Grecale GT 日见新生

玛莎拉蒂全新Grecale GT
绽放每一日的优雅时刻

敬请莅临玛莎拉蒂当地授权经销商，
或致电 400 688 5111

